

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歷史學系

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f History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社會主義的城市課：

大躍進時期上海市編教材與教學活動

The Courses in a Socialist City:

The Teaching Materials and Educational Activities of Municipal Education
in Shanghai duri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

楊可倫

Ke-Lun Yang

指導教授：王遠義 博士

Advisor: Yuan-Yi Wang, Ph.D.

中華民國 102 年 7 月

July, 2013

本著作內容除另有註明外，悉採取「創用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3.0 台灣授權條款」(CC-BY-SA) 釋出，詳細授權內容的契約法律條款請參見本文附錄



本研究接受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補助，在此致謝





本文原欲採 Copyleft 授權，但考慮典藏單位之相關規定，本著作內容除另有註明外，悉採取「創用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3.0 台灣授權條款」(CC-BY-SA) 釋出，詳細授權內容的契約法律條款請參見本文附錄，知識生產即為分享，向一生致力於此的 Aaron Swartz 致上最高的敬意



國立臺灣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社會主義的城市課：

大躍進時期上海市編教材與教學活動

The Courses in a Socialist City:

Teaching Materials and Educational Activities of Municipal Education
in Shanghai duri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

本論文係楊可倫君（學號 R00123015）在國立臺灣大學
歷史學系完成之碩士學位論文，於民國 102 年 7 月 26 日承
下列考試委員審查通過及口試及格，特此證明

口試委員：

王遠義

（指導教授）

余敏玲

吳啓詒

謝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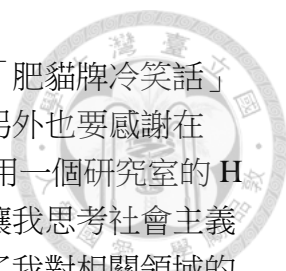


本文能夠完成，首先要感謝王遠義老師的指導，本文雖試圖以新文化史和都市研究的取徑梳理大躍進時期的社會變遷，並不集中篇幅於思想變化，但教育活動即是透過與學生的互動，以各種方式將當代思想化為實踐，若非王老師在課堂與課後的諄諄教誨，筆者也無法得以窺視隱於檔案與教材中的現代性脈絡。另外，在本文寫作的兩年間，筆者也有幸擔任王遠義老師「現代中國與世界」的課程助理，在備課及與學生互動中，更能進一步整理自己在研究中所學習的近現代史知識，在此首先向王老師致謝。

從本文最初構思問題意識起，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陳永發老師、沙培德老師（Peter Zarrow）、吳啟訥老師和余敏玲老師就提供了許多協助。陳永發老師指導了本文最初的問題意識和資料蒐集，使本文在踏出第一步時有了一個堅實的基點，並在日後撰寫各章節時不時提醒自己相關資料是否充足。而過去兩年與沙培德老師、吳啟訥老師與余敏玲老師的一次次討論中，本文各章探討的內容也逐漸清晰，這些討論讓筆者得以爬梳辛亥革命以降到共和國建立後的中國現代教育發展，了解上海市檔案館中可資利用的檔案與相關課題，最後順利的在這兩年間的幾場研討會與學術刊物上發表部分成果。此外，政治大學教育系的周祝瑛老師對本文核心資料蒐集提供最直接的協助，在筆者擔任比較教育、教育史和中國大陸教育研究等數門課程助理期間，周老師致信北京師範大學的顧明遠老師，若非此信，筆者恐無法由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劉立德老師引介瀏覽該社典藏的各地鄉土教材，並且與在中央民族大學中從事這方面研究的滕星教授取得聯繫，更遑論將這些過去研究者未能窺其大概的材料作為本文之基礎。

由於本文使用的檔案資料均存於京、滬（二手教材更遍及各省市），但由於筆者修課的緣故無法參與學期中的交換學生，因此也感謝上述幾位老師們提供的打工機會，使我能負擔三次赴滬查找資料的經費，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和台灣大學歷史系的獎學金則彌補了我自己無法負擔的相關檔案蒐集費用，使我在2013年的1月間能取得上海市檔案館中所需之相關檔案。2011年夏天到2013年秋天的這五次的旅行除了讓我看到夏末時華北平原的翠綠、深秋時華中江面的白露和隆冬時江南水鄉的蕭瑟外，更有許多朋友們協助，在此一併向復旦大學歷史所的徐昂、高思源同學、華東師範大學的王飛學長、華中師範大學的梁磊學妹以及浙江大學教育所的李薇學姊、葛富強學長致謝。

同儕方面，在此感謝「現代中國與世界」的助教夥伴們，這兩年半間的每個週二，大家殫精竭慮讓這門四百多人的課程更饒富趣味，並和助教班上平均五十到一百位的同學奮戰，每個學期的尾聲更是孜孜矻矻的處理課務，尤其是黎冠忠、鄭宏興和陳雅琳幾位同學，讓我在這忙碌的兩年裡，每星期都能有許多新鮮



的事情，例如非常實用的公館餐廳大冒險和冷到連眼都結霜的「肥貓牌冷笑話」等等，在論文的最後送印時更感謝陳雅琳的多次協助與校稿。另外也要感謝在「毛澤東著作選讀」的 Q 學長和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共用一個研究室的 H 學長給我在研究上的刺激，每次討論時都給我思想上的激盪，讓我思考社會主義的流變與上海的城市性質。此外，李孟衡和徐和謙同學也加深了我對相關領域的認知，更認識了許多學識淵博的學者。其他如政治大學、中央大學、中正大學的朋友們，感謝大家在過去兩年給我的歡樂。

除了學術上的夥伴，也得感謝我的家人，在進入台大之前，父親曾提過在台大最珍貴的是有各種豐富的系所與課程，應該要藉此擴展自己的知識。雖然和父親讀的系所南轅北轍，但本文的發想除了本系提供的基礎知識外，父親的建議讓筆者在台大的六年間從不同系所的課程中得到了更多的知識刺激，尤其是碩二時朱嘉明老師在城鄉所剖析中國城市發展以及碩一的每周一為了連續修習夏鑄九與王志弘老師所開設的都市研究理論與方法課程，雖然為了修課，每每到了接近半夜十二點才下課，但這樣的豐富生活始終讓我難以忘懷。因此，本文能順利在兩年內完成，除了感謝台大不同系所的老師們辛勤的指導，也得感謝我的家人不斷的提點和鼓勵。

2011 年的暑假，筆者在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完成本文最初的資料蒐集後，沿京杭高鐵到了杭州，由表哥帶領下回到了故鄉。在城郊的新建樓房裡，大伯和筆者講起了他自己因大躍進時的教育改革和政治調整，遠遁寧夏鄉間的農場，不再繼續升大學的故事。表哥自己也是高考剛恢復的一兩年間當地少數考入省城的大學生，當時他對筆者說到：「也就剩你們這代人還關心爺爺那年代的事情」，本文雖未能刻劃大躍進的暴風驟雨，但中國革命在筆者一家三代中烙下的遭遇不斷提醒筆者不能過度相信研究者們經常使用的報章資料，得更進一步探討大躍進期間教育系統運作的實際情況。

上海這類老工業中心的研究或許不能反映中國的社會主義者們對城市的擘劃，也或許這些擘劃只是人們試圖用意志打造新社會的又一次失敗。無論如何，在這個教育系統不再反省其對師生勞動的濫用，混淆勞動與學習的性質，甚至將異化勞動視為理所當然的年代，謹以拙文獻給那苦難深重，但社會主義者思想與實踐同時狂飆的過往。

中文摘要



1958 年展開的大躍進運動影響了當代中國的許多層面，本文著重於考察上海市政府與各級學校如何透過各式教育活動再現當時各級政府掣劃的區域願景，並將教育活動視為地方政府藉由教育單位調整期區域發展策略的文本，以了解在大躍進時期區域政治、經濟政策重新調整下，地方政府如何讓學生得以參與區域的調整並凝視 (gaze) 其城市的變化。本文將先由 1958 年起在各省市在中央政府命令下編纂的鄉土教材作為基礎，以對「帝國主義」的話語使用作為主線，考察上海市的鄉土教材如何重述這座城市過去的發展與現實的關係。之後本研究將轉向教材中對區域願景的書寫，以上海市棚戶區的都市更新作為主軸，討論大躍進運動中對城市的想像如何為鄉土教材為學生勾勒的未來生活。在結束對文本的討論之後，本研究將焦點轉往大躍進期間席捲各省市的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運動，以此梳理教育活動與市政規劃的關係，除討論上海市的教育單位如何讓學生實際的參與市內的生產計劃外，也將涉及教育單位如何規劃不同區域中學校的勞動與就學方式，以此觀察地方政府如何傳達其區域規劃與學生勞動的關係。藉由教育文本和實際教學活動，我們可以看到在大躍進的政治氛圍下區域規劃與教育體系如何重塑區域形象與人群發展。因此，本文最後將指出鄉土教材編纂、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教育方式不單只是大躍進時期教育政策的一部分，同時也讓學生在課堂中凝視紙上的區域政策，並透過勞動實作其所習得的政治話語，參與了當下區域的歷史。

關鍵字：上海教育、大躍進、鄉土教材、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運動、城市形象、凝視

英文摘要



The Great-Leap-Forward had reshaped contemporary China since 1958. Policies planned by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represented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visions and still remains nowadays. Local education administrations, educators, teachers and CCP school committees translated those visions into teaching materials and educational activities, such as native-place textbooks. By gazing the educational material and participating education activities,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adjustment, regional planning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city can be understood more deeply. This research targets on the teaching material and activities in Shanghai municipal education. The first part based on the native-place history textbook, the usage of the term “imperialism” in teaching material weaved the past of Shanghai, and connected the planning visions in the movement. Also, native-place geography textbooks focused on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Shanghai. Teaching material and activities about the urban renewal in the shanty towns and new satellite industrial towns connected students’ daily life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plans. Furthermore, the significant educational activities in the movement -- the combination of education and productive labor – widespread across the whole country. The movement provided a chance for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in the official economic plans (especially local government) in the urban factories and rural communes. Education system involved with economic plans also reflected these differences of the school location arrangement and regional economic policy by local government. In the end, analyzing these educational activities helps us understand that the teaching materials and educational activities had reshaped the figures of region and career development .The education is not only part of the Great-Leap-Forward Movement, but also provided a way for students to gaze and to participate in their city – through the courses in the socialist c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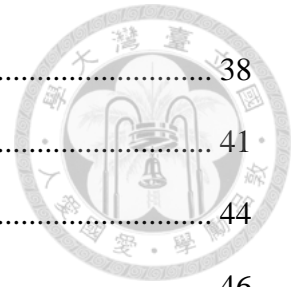
Keywords: Shanghai education, native-place textbooks, The combination of education and productive labor, City image, gaze

目錄



國立臺灣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i
謝辭	ii
中文摘要	iv
英文摘要	v
圖表目錄	viii
圖片	viii
表格	viii
圖表	ix
緒論：凝視城市	1
第一節：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	1
第二節：文獻回顧	6
1.都市與政治的文化史	7
2.教育史	8
3.教育與勞動生產相結合運動的相關研究	10
第三節：章節安排	13
第一章：識讀「帝國主義」	16
第一節：前言	16
第二節：故事中的帝國主義	20
第三節：城市中的帝國主義	25
第四節：小結	28
第二章：塑造「群眾」之城	32
第一節：前言	32
第二節：上海棚戶區的成因與中共建政後的改造	34

第三節：鄉土教材中公共建設的形象	38
第四節：勞動人民：鄉土教材中群眾的形象	41
第五節：小結	44
第三章：學習「勞動」	46
第一節：序言	46
第二節：學校與工廠	50
第三節：城市與郊縣	55
第四節：小結	59
結論：「進步」的鄉土	64
附錄	69
第一章	69
第二章	78
第三章	87
授權條款	96
引用書目	102
英文書目	102
中文書目	104
史料文獻	108



圖表目錄



圖片

圖 1 開埠前的上海	74
圖 2 解放後的黃浦公園與外灘的形象	75
圖 3 大鬧洋場	76
圖 4 一二八淞滬戰爭的教學示意圖	77
圖 5 1949 年之前上海棚戶區的分布	78
圖 6 2000 年時上海棚戶區的分布	79
圖 7 1959 年上海市的區域規劃	80
圖 8 1960 年的蕃瓜弄棚戶區	81
圖 9 上海棚戶區的空間改造圖	82
圖 10 1962 年上海市高級小學適用地理課本	83
圖 11 1961 年中等學校適用上海市鄉土地理教材	84
圖 12 肇嘉濱的轉變	85
圖 13 上海工人辛勤工作的形象	86
圖 14 老工人的形象	89
圖 15 學生支援基礎建設：清汗	90
圖 16 學生參與建築工地生產勞動	91
圖 17 學生下鄉勞動	93
圖 18 農民中學的形象	94
圖 19 2000 年時上海市各級學校校辦產業產值與比例分配	95

表格

表格 1 目前所見大躍進時期上海市各類鄉土教材出版情況	69
-----------------------------------	----

表格 2 1949-1963 年間上海市普通中學學生和專任教師人數.....	70
表格 3 1958 年上海市高小歷史鄉土教材教學進度.....	71
表格 4 1958 年上海市高中鄉土歷史教學進度.....	72
表格 5 1958-1962 間上海市高小與初中升學率.....	88
表格 6 1959-1963 間上海市區與郊區學生人數與勞動力折算.....	92

圖表

圖表 1 1949-1978 間上海市三級產業占 GDP 比重.....	87
--------------------------------------	----



緒論：凝視城市

「我們的鄰里被重新想像。它的純正性（Authentic）仍然反映地方特色，但「地方」的意義已然改變」¹

《裸城：純正都市地方的生與死》

第一節：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

近年來，全球各都市無不積極建立自己的城市形象，城市的過去與對未來的願景經過層層包裝，堆砌成一本本的城市導覽指南，同時，透過建築、公共活動銘刻在街道中，成為城市的肌理。一些當代的都市研究中將當代城市形象視為晚期資本主義的象徵，以地產開發為核心的資本積累驅動地方政府積極更新轄下各區域的樣貌，為了吸引各方資金，城市行銷與城市旅遊成為當代城市不能迴避的議題，在此基調下，迪士尼樂園式的城市規劃於雨後春筍般出現——當地需要「老街風情」時，市政當局與地產開發商便拼湊各種古樸的建築風格的創作了「老街區」——為了賦予開發計畫願景，地方故事重新為人挖掘，但也引發了一連串城市記憶的論戰。²在相關討論中，城市規劃與市政當局的意志都是人們所關注的重點：David Harvey 指出十九世紀中期 Haussmann 利用大巴黎計畫，重新調

¹ Sharon Zukin, *Naked City: The Death and Life of Authentic Urban Plac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1 ed.), 104

² 對於地景、地方與地方感的討論，都市規劃和地理學界有許多討論，參見：Jane Jacobs, *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3)；Tim Cresswell, *Place: A Short Introduction* (Malden, MA: Blackwell Pub., 2004)；Sharon Zukin, *Landscapes of Power: From Detroit to Disney Worl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Yi-fu Tuan, *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 (London: Edward Arnold, 1977)；Sharon Zukin, *Naked City: The Death and Life of Authentic Urban Plac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1 ed.)，人文地理學者針對「地方」一詞大多定義為一群人生活的空間，地方的邊界則視社群的認知而定，因此如法國學者 Henri Lefebvre 有「空間的再現」(representations of space)此一說法描述體制如何塑造空間；歷史學者與歷史著作參與地方感的重塑，但歷史學者對於這方面理論的討論仍較為缺乏，近來對中共空間政治塑造的研究可以參見 洪長泰，《地標：北京的空間政治》(香港：牛津大學，2012，第1版)；Paul A Cohen, *Speaking to History: the Story of King Goujian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9) 近年來在台灣由於保存引起的論戰，可以參考：王志弘，《文化治理與空間政治》(臺北市：群學出版社，2011)

整公共建築分布，投注資金興建筆直的道路，讓新建的公寓沖毀工人的鄰里，縝紳化（Gentrification）的大道與小區則讓大革命後在巴黎屢見不鮮的街堡無處重現。³Harvey 進一步的引用恩格斯的 *The Housing Question*，進一步指出城市必然是資本主義維繫增長的要素，若無空間上的不平等發展，資本積累就無處吸收，晚近資本主義的去管制化讓這個過程更加明顯，資本主義透過時空修補（Spatial-Temporal Fix）引入邊陲地區的資金，透過都市計畫，調整城市地租，在資本主義危機中重新鞏固核心地區的地位。⁴面對這些在現代城市中的現象，筆者將注意力稍稍移出當代城市，考察在現代區域計畫出現後，不以晚期資本主義邏輯為其運作模式的都市，試圖討論在不同的區域發展邏輯下，現代的區域計畫與市政當局是以何種方式規劃城市，並在此過程中建構起城市的新形象，因此 1949 年之後上海的區域形象重塑成為本文所關注的議題。

本研究以大躍進時期上海市教育單位出版的地方性教材切入 1949 年後地方教育，上海的城市性格與商業性格較其他省市鮮明，而其政治、經濟結構在 1949 年之後發生了巨大的轉折，因此本文將在大躍進時期首次展開編纂的鄉土教材與各式教育活動視為地方政府貫徹城市規劃、行政的文化實踐，冀望在研究的過程中分析地方性教材如何透過重塑區域形象，落實地方政府的意識形態與規劃政策。透過這樣的視角，解釋中共建國後區域形象與地方感形塑等文化治理（cultural governance）議題。⁵

³ David Harvey, *Paris, Capital of Modernity*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1 ed.), 235 – 244 與法國的明目張膽不同，英國在二戰後的 New Town 也試圖以國家的力量建立新城，讓工人能負擔合理的居住空間與品質——毫無疑問的工人們就此遠離倫敦，而許多新城也在 1980 年代大型工廠轉移到海外後成為死城，如同在 1984-1985 年間的英國礦工大罷工幾個發生的礦業城市一般，參見：Peter Geoffrey. Hall, 《明日之城：一部关于 20 世纪城市规划与设计的思想史》，童明譯（上海市：同濟大學出版社，2009），頁 146-149

⁴ David Harvey, *Rebel Cities: From the Right to the City to the Urban Revolution* (New York: Verso, 2012, 1 ed.), pp. 6 – 21

⁵ 「文化治理」此一名詞為王志弘教授依照 David Harvey、Sharon Zukin 等人對於晚期資本主義下，資本積累的空間模式所進行的延伸，Sharon Zukin 在 *Landscapes of Power* 一書中最後曾提及類似的概念，文化治理的概念在於企業將過剩資本投入工業、農業等產業得到的報酬在當代已經低於預期，因而將過剩資本轉入對空間的文化重塑，結合官方的力量讓資本在空間尺度上獲得更大的資本積累速度，王志弘以記憶再現體制再次詮釋了此一資本積累過程，而本文借用其「文化治理」概念中強調地方政府在經濟或政治因素對於地方的重塑，相關文獻請參考：王志弘，〈記憶再現體制的構作：臺北市官方城市書寫之分析〉，《中外文學》第 393 卷（2005），頁 11-14；王志弘，《文化治理與空間政治》（臺北市：群學出版社，2011）；Sharon Zukin，

與晚近的資本主義城市不同，1949 年之後的中國城市發展深受蘇聯的城市規劃與毛主義影響。1950 年代初期起，北京、上海和鄭州等城市受蘇聯顧問規劃，蘇聯風格的街坊式小區與大廣場、標誌性建築物充斥當時各個戰後復原的城市中。⁶1958 年大躍進展開與蘇聯顧問在稍後撤回後，毛主義對城市的想法開始逐漸顯著，Maurice Meisner 從思想的變化解釋毛主義刻意忽略馬克思的部分觀察，其結果造成 1949 年後的土地革命成為一場「資產階級革命」⁷，而在都市發展上，城鄉戶口制度與食物配給反而鞏固城市的發展。毛澤東對社會主義的唯意志論讓其於大躍進前後發動起一次次的知識份子上山下鄉運動，試圖以攀枝花、大慶、大寨和各類人民公社等中小型城市達到《共產黨宣言》中勾勒的彌平城鄉差異願景（在 1970 年代城市規模分布圖中確實可看出中國城市集中於中小型城市，這也讓歐美專家稱上山下鄉運動與美國的郊區化發展並為「逆向的都市化」）。⁸

相較於其他城市，上海為 1949 年前後中國重要的商業城市與人口中心，而中共的黨組織在上海也遭遇過幾次毀滅性的破壞，為穩定這具有特殊意義的城市，上海解放時毛澤東曾發表相關講話，保證上海的工商業正常運作不受打擾。⁹

Landscapes of Power : From Detroit to Disney World (Berkele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1993) ; David Harvey , 《新自由主義化的空間 邁向不均地理發展理論》(臺北市 : 群學 , 2008) ; 王志弘 , 〈台北市文化治理的性質與轉變, 1967-2002〉, 《臺灣社會研究》第 52 期 (2003) , 頁 123

⁶ 華攬洪 , 《重建中國 : 城市規劃三十年(1949-1979)》(北京市 :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 2006) , 頁 49-56

⁷ Maurice Meisner , 《毛主義的誕生 : 中國共產革命之路》(台北市 : 衛城出版社 , 2012 , 第 1 版) , 頁 201,3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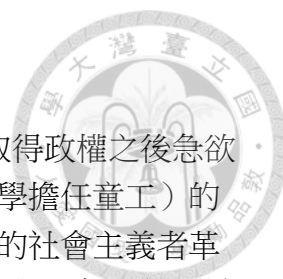
⁸ 華攬洪 , 《重建中國 : 城市規劃三十年(1949-1979)》(北京市 :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 2006) , 頁 237-239 ; Peter Geoffrey. Hall , 《明日之城 : 一部关于 20 世纪城市规划与设计的思想史》, 童明譯 (上海市 : 同濟大學出版社 , 2009) , 頁 290-291 關於毛時期中國的都市化 , 1980 年代的相關研究可參考 : R Yin-Wang Kwok , “Trends of Urban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in China” , Laurence J C Ma, Edward W Hanten ed. , *Urban Development in Modern China* (Boulder,Colorado : Westview PressInc , 1981) ; Rhoads Murphey , “Chinese Urbanization Under Mao” , *Urbanization and Counterurbanization* , Brian J L Berry ed. , vol. 11 (London : Saga Publication Inc. , 1976 , 1 ed.) , pp. 311 - 334 ; Clifton W Pannell , “Recent Growth and Change in China’ s Urban System” , Laurence J C Ma, Edward W Hanten ed. , *Urban Development in Modern China* (Boulder,Colorado : Westview Press Inc. , 1981)

⁹ 毛澤東 , 〈必須維持上海 , 統籌全局〉, 《毛澤東文集》,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 , 第 5 卷 (北京市 : 人民出版社 , 1949) , 頁 335-336

這使得上海在由商業城市變為計劃經濟下的工業城市的過程中，與其他區域相比略有不同。地景方面，上海的地景改變主要集中於外灘的外資企業收歸國有，開放租界（如改造黃浦公園和跑馬場等地），其他的都市更新則是針對自上海開埠以來逐步擴大的棚戶區，在這部份則是調整區域建築形式與改善居民就業情況（如將肇家濱改建為林蔭大道）。這兩種性質不同的空間改造宣示中共的政治勢力與意識形態已明確的改造上海的都市空間，1957年時，上海市長的柯慶施在甚至展現出比中央領導幹部更激進的政治態度：「相信毛主席要到迷信的程度，服從毛主席要到盲從的程度」，並宣稱此建設社會主義新上海。在城市經濟方面，大躍進中行政區擴大十倍的上海市也比過去還更能夠明確的掌握自己的糧食供應，大躍進期間，上海配合全國的計劃經濟輸出工人，學生也在這時期下鄉落戶和參與「與生產結合的教育」，面對城市的巨大改變和當下的政治運動。

學生的階級屬性不如其他社會群體如此明確——雖然在反右運動中，部分師生遭到政治處分——但教師與學生的權力關係卻比一般的作家之於讀者明確，因此由地方教育單位編纂的教材該如何跟學生循循善誘，使其了解中央與地方政府的區域政策，這也就是本研究挑選教育文本進行分析的主因。在現代中國的歷史中，不同形式的宣傳文本廣泛的為各政治勢力所用，晚清以降的各類政黨中不斷地使用不同宣傳形式以求其思想和主張可以深入民間，中共革命的過程尤其反映了這一點，除了各類地方誌與報刊中的寫作之外，中共更善於使用民間藝術與基層民眾的想法結合以爭取民眾認同。¹⁰我們可以就文化產品的生產性質區分這幾類作品的差異，在對民國時期的研究中採用的報刊、民間戲劇等文化形式多半可以反映民間社會對新生的政治事務的看法，但這類宣傳方式與後來各政黨的宣傳、教材相比，出版量與閱讀群則有所限制。而中共從北伐戰爭開始使用的農村年畫、秧歌的文化形式則較民間發行的報刊體現中共的政治想法，再搭配中共黨組的小組開會學習形式則更能深入人心。教育類的素材則兼具兩者之長，由於教育體系採取中央集權，因此這類素材由政府大量出版，供給不分階級、黨派的讀者學習，並透過定期考核強化讀者的記憶，相較於在中共黨組中所進行的文藝討論，學校對於教材的教學方式則會較為直白易懂。在中共建國之前，中共革命元老徐特立（毛澤東的蒙師，最早在延安施行生產與教育合一的教育政策）、程今吾（鄉村教育家陶行知弟子，中共建國後任北京師範大學副校長，鼓吹教育與社會結合）都在不同的中共根據地將中共的教育主張透過這類不分黨派的方式，以

¹⁰ 洪長泰對中共的文化宣傳有著一系列深入的研究，Peter Zarrow 近來也針對民國如何建構「國慶日」和「國史」（尤其是以民族革命為核心的漢族歷史）做了一番討論，參見：洪長泰，《新文化史與中國政治》（臺北市：一方出版，2003，第1版）；Peter Zarrow, *After Empire: the Conceptu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State, 1885-1924*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156-158, 212-247



正規的學校教育將其理念傳達給學生。

在教育文本之外，教育活動與生產間的關係也是共產黨人取得政權之後急欲改變的，〈共產黨宣言〉中曾提到「取消現在這種形式（兒童失學擔任童工）的兒童的工廠勞動。把教育同物質生產結合起來」，這一點在中國的社會主義者革命成功之後又是如何實踐？實存的社會主義政權仰賴計畫經濟，對於每一個區域經濟的安排與城市規劃也是 1949 年後計畫經濟體系的一部分。¹¹在這種生活與生產緊密結合的城市體系裡，地方政府的教育部門如何設計教學藍圖，使習於南京路上繁華生活的上海子弟進入工廠，接受勞動自身的「價值」，也就是本文急欲透過教育局與黨團檔案觀察的重點。

除了中共史的研究脈絡，本文也採用社會理論和人文地理學的角度，認為地景是一種「觀看的方式」，不同群體對地景的凝視（gaze）和塑造則創造了屬於該群體的地方感。¹²因此，本研究將地方性教材中對當地地景的論述視為區域當局對地景的凝視，由於凝視一詞原有對於權力運用的觀點，文本內的地景除了文本內部的邏輯外，也與外部的脈絡有了互文性。John Urry 曾借用傅柯對凝視的定義——傅科認為醫學的凝視開啟以分類學的權力視野開創了一種屬於現代醫學的人體空間——John Urry 進一步的指出，旅遊者對地景快速的一瞥，會將地景迅速的分類至旅者原有的脈絡中，同時旅遊業（作為一個文化的生產者）還會試圖改變當地的地景，使其更加貼近旅遊者「希望看到的」景觀，這樣的過程中發展出一種前台與後台混雜的社會空間，在此也提醒我們文學地景（如旅遊書、區域性教材）的描述建構了讀者對當地地景的分類方式，同時地方政府為了符合其分類邏輯也會進一步的改造環境，身處於其中的讀者則同時接受了分類的凝視與建構了自身了凝視。¹³另外，Michael Burawoy 和 Andrew G. Walder 的工業社會學著作中提供了我們車間勞動的管理方式，Michael Burawoy 注意到現代工廠透過創造「內部國家」的方式讓工人感受到形式上與資本家處於平等的，「甘願」¹⁴為體制

¹¹ 關於 1949 年之後中國大陸的城市規劃，可以參考最早一代的城市規劃師所寫的《重建中國》一書：華攬洪，《重建中國：城市規劃三十年(1949-1979)》（北京市：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

¹² John Wylie, *Landscape*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1 ed.)

¹³ 關於傅柯的凝視，請參考：Michel Foucault, 《臨床醫學的誕生》（臺北市：時報文化，1994）而「旅行者的凝視」請參考：John Urry, *The Tourist Gaze* (Thousand Oaks: Sage, 2002)

¹⁴ Consent, 也譯為「同意」，中文譯本的 *Manufacturing Consent* 中，譯者林宗弘先生區分了 Burawoy 的文意，認為「甘願」與「同意」在 Burawoy 的脈絡下兼具，但 Burawoy 討論的是霸權

效力，Andrew G. Walder 則提到由於毛澤東時代（或史達林時期）的配給問題，車間主任、工人和黨組會發展出實用性的侍從關係，由企業延伸的社會福利網路使得管理階層採取「有原則的用人唯親」¹⁵原則施恩回報。¹⁶ Michael Burawoy 和 Andrew G. Walder 的觀點進一步擴充了本文研究以 John Urry 觀點對教育活動的看法，除了教科書透過教學法成為學生「觀看的方式」外，在車間、農場中實作的教學活動更需製造甘願，教育與教育體制中的較工廠更為軟性的權力關係在此扮演了緩和車間中學生與指揮其工作的工人在身分上的差異的手段，學生在勞動的同時接受車間、教育者的規則，並親手參與地景的未來計畫。

在這樣的理論與實際的脈絡下，本文透過爬梳上海市當局在大躍進期間（包括前後幾年）的地方性教材，包括不同學校科目鄉土教材、上海市教育局檔案、教育局公開出版期刊《上海教育》與其他相關的「教育與生產結合」的教育紀錄（教案或報導）。將其與中共中央頒布的教育宣示與出版品對照，了解區域當局如何詮釋中共中央的教育政策，塑造上海在社會主義建設下的新地景，並將新的人群與社會結構置入其中。

第二節：文獻回顧

本研究將官方對區域的規劃與教育視為「地方」再現的象徵，因此有必要指出人文地理學中對「地方」一詞的定義，在人文地理學中，地方涉及了地方感和地方認同，同時也是人們日常生活的空間。持建構論的地理學者們一般也認為地方是由父權、政經結構或現代性的體制共同建構的產物。¹⁷而批判性的都市理論者，如 Castells 也認為都市形式（Urban Form）是在歷史的框架中，透過社會網

體系創造的強制性「同意」，因此用「甘願」為宜，參見：Michael Burawoy，〈製造甘願：壟斷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的歷史變遷〉（臺北市：群學出版社，2005），頁 33

¹⁵ Principled particularism，Walder 區分一般性的 Particularism（特殊主義，用人唯親原則）與實存的共產主義社會下類似的現象的差異在於共產主義社會不但和傳統社會（或資本主義社會）一樣保持「傳統」上的用人唯親，同時，由於計畫經濟體制照顧到每個人，組織的用人原則還得注意到與黨的政策維持一致，參見：Andrew G Walder，〈共產黨社會的新傳統主義：中國工業中的工作環境和權力結構〉，龔小夏譯（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6，第 1 版），頁 27

¹⁶ Michael Burawoy，*The Politics of Production: Factory Regimes Under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London: Verso, 1985）；Michael Burawoy，*Manufacturing Consent: Changes in the Labor Process Under Monopoly Capitalism*（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9）；Andrew G Walder，〈共產黨社會的新傳統主義：中國工業中的工作環境和權力結構〉，龔小夏譯（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6，第 1 版）

¹⁷ Tim Cresswell，*Place: A Short Introduction*（Malden, MA: Blackwell Pub., 2004）

絡與文化意義共同建構。¹⁸也因此，本文在觀察的視野上採取和前述理論類似的立場，將「地方」(Place)視為是群眾集體的情感和生活脈絡建構的空間，而「地景」(Landscape)視為解讀地方的入口，除了實際存在的建築結構外，在文本中再現的地景具有了更豐富的意涵，讓我們得以了解人們對當下時空的認知。

除了上述的理論外，本研究涉及幾類相關研究領域對當代中國的研究成果：教育史與以文化史角度研究的都市史與政治史，並將透過鄉土教材、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運動為結合這些相關研究的媒介，討論在共產黨政權建立之後，如何透過教育的方式進行空間再現，以及其政治意涵，以下將簡單的對這幾部分過去的研究進行回顧。

1. 都市與政治的文化史

歷史學界針對中共建政後的都市史研究目前仍不多見，與本研究相關的研究取向為近年來發展的新文化史與社會文化史領域。

洪長泰以新文化史進行的相關的空間變化的歷史討論，洪長泰最初以《到民間去》一書開展了以 1930 年代中國知識分子離開城市到地方上重編歷史與蒐集民歌的過程，並以此認為中共後來的革命，不論是 1960 年代的村史或廠史都是繼承了這樣的知識傳統，而其運用新文化史研究方法主要見於《新文化史與中國政治》，他認為可以以文化變遷等細微的解讀重新討論中國當代政治史，並稱其為「新政治史」¹⁹。雖然其名詞的適當性可能有待討論，但該書中揭糞了如華北的秧歌、陝西的年畫在中共革命中的歷史意義，他認為雖然這類事物不是往昔討論當代中國政治的核心，但他們都不約而同的「再現」了當代中國政治（並且比「實存」的政治在社會上能流傳更久）。在晚近的《地標：北京的空間政治》中，洪長泰則以建築與空間規劃如何作為中共樹立其政權合理性的角度探討了 1950 年代以來北京市主要政治地景的變化。²⁰洪長泰的研究主要集中於政府檔案中如何描述地景建築的過程與相關的政治儀式如何圍繞其展開，但可能囿於資料所限，其對於中央或地方政府如何將地景與地方結合，將其轉化為地方感的一部分少有著墨。

Barbara Mittler 在 *A Newspaper for China? : Power, Identity, and Change in*

¹⁸ Manuel Castells, "The New Histor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Space and Society", *Designing Cities: Critical Readings in Urban Design*, Alexander R Cuthbert ed. (Oxford: Blackwell, 2003)

¹⁹ 洪長泰, 《新文化史與中國政治》(臺北市: 一方出版, 2003, 第 1 版)

²⁰ 洪長泰, 《地標：北京的空間政治》(香港: 牛津大學, 2012, 第 1 版)

Shanghai's News Media, 1872-1912 一書中對於現代中國的報紙則提出了一個有趣的觀察點，他認為過去學者總將報紙等文本視為理所當然的史料，但未曾注意這些新媒介本身的文本邏輯，Barbara Mittler 指出當報紙這類新媒體在上海灘初次登場時，本身就宣示要「塑造新人」。²¹本文研究的鄉土教材對於 1950 年代末的上海市政府而言屬於一種前所未有的教育形式，因此這類教材與城建局經常撰寫的城市介紹有何差異，教育單位在最初的階段也不斷試圖廓清，這也讓我們可以在教材內部文本的變化中看到教育場域內外的變化。

其他著作亦偶有觸及中共如何塑造新地方空間的，如 Paul A. Cohen 的 *Speaking to History: the Story of King Goujian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最後的部分以勾踐在 1990 年代後如何作為杭州等地新興的文化旅遊產業宣傳品進行探討²²。Paul A. Cohen 的目的在於討論勾踐的意象在二十世紀中國的變遷，因此集中討論地方政府為了「浪漫」的旅遊氣氛，如何地方政府重新書寫西施與勾踐等人的愛情故事，至於與勾踐相關的「古蹟」（建築）在故事中如何再現，亦鮮有著墨，此外，1990 年代的政治—社會氛圍改變，雖然 Cohen 的研究能讓我們推敲中共地方政府的運作，但與 1950 年代的關聯並不大。

2. 教育史

中共建政後的鄉土教材的編審權限在地方教育單位，雖然自大躍進後迄今各省市均有編輯，但各地保存的情況不一，也難以確認其教學內容，李慶剛的《「大躍進」時期「教育革命」研究》扼要的討論了大躍進時期全國教育發展，但對其教學內容則付之闕如。²³而近年出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專題史叢書」《中小學教育史》中也僅是抄錄了幾段中央政令，足見其研究之缺乏。²⁴

部份海外研究者對於 1958 年的教育革命中，地方自主編輯教材運動有所關注，但多半只是蜻蜓點水式的提及。近年來，中國大陸內部的研究始於中央民族

²¹ Barbara Mittler, *A Newspaper for China?: Power, Identity, and Change in Shanghai's News Media, 1872-1912*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14

²² Paul A. Cohen, *Speaking to History: the Story of King Goujian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9)

²³ 李慶剛，《「大躍進」時期「教育革命」研究》（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0，第 1 版）

²⁴ 卓情君、李仲漢，《中小學教育史》，《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專題史叢書》（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第 1 版）

大學滕星教授及其學生，在其與李素梅的《中國百年鄉土教材演變評述》中，指出各時期中國鄉土教材演變的情況，但其研究對民國時期與改革開放後的關注遠遠超過中共建政後到改革開放前這一段歲月。其文中也表示「這個時期多數的省縣都展開了自己的鄉土教材編纂工作……對於這段時期尚缺乏有系統的討論」

25。

班紅娟在文中對 1949 年之後的河南鄉土教材進行了一番討論，作者提到了一些有趣的議題，例如作者指出當時的鄉土教材在故事選擇上的特色，以及如何「將領袖編入地方性中」²⁶。不過作者似乎想從這些政治敘事中提出更純粹的「地方性知識」，雖然這可能是要和全文關注更長的歷史階段中「河南特性」作一呼應，但降低政治性也同時降低了 1950 年代後的時代氛圍。另外，該文引用的鄉土教材數量不多，且適用的學校範圍相當分散，缺乏連續性，雖然可以理解這類史料蒐集不易，但也造成該文在詮釋無法進一步討論其所開展的議題。如何將領袖與中央的規劃編入鄉土教材是一個相當有意義的討論，當代中國絕大多數區域的現代化建設與新市鎮都是成長於中共建政之後，若能使用多幾種年代的教材，再參照全國性教材中的描述，也更能提供我們 1950 年代鄉土想像的完整圖像。

雖然關於鄉土教材的討論並未能提供本研究足夠的資料和框架，但若我們關注對其他歷史時期教育的研究，Peter Zarrow 最近以辛亥革命後教材與新聞討論新中國的認同如何產生的研究也值得我們關注，該研究中提及民國以來新的敘事體系推翻了過去的歷史，歷史被認為是一段有始有終，並且可以重新開始的過程，這樣的敘事方式透過教育體系內在的教學與課程發展邏輯不斷的強化，並透過各類測量在學生心中增強，其效果是現代史研究者所不應忽略的。²⁷程美寶則認為清末到民國間各地的教材受到地方仕紳的影響，並且鑲嵌到正式的學校制度

²⁵ 李素梅、滕星，〈中國百年鄉土教材演變評述〉，《廣西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30 卷，第 1 期（2008），頁 49-55

²⁶ 班紅娟、滕星，〈文化變遷中的河南鄉土教材研究〉，《教育學院》（中央民族大學，2010）

²⁷ Peter GueZarrow, *After Empire: the Conceptu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State, 1885-1924*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178-180; Peter GueZarrow, "The New Schools and National Identity: Chinese History Textbooks in Late Qing", *The Politics of Historical Production in Late Qing and Republican China*, Robert J Culp, Tze-ki Hon ed. (Leiden, Boston: Brill, 2007), pp. 21-55

中，將過去只記載於地方志上的敘事方式轉化到了現代教育體系中。²⁸程美寶所提到的這一點相當的有趣，由於民國並沒有官方強制編輯的鄉土教材，但在 1920 年代以來的鄉村教育運動中均不斷以最親近農民的方式傳遞知識，民初知識分子高遠的思想在地方社會原有的衝突中轉化，這又和中共建政後要求各省市出版的鄉土教材有什麼差異相當值得我們注意。至於對社會主義國家教育的研究，John Rodden 對東德教科書和教育體系的研究也值得本研究借鏡，該研究指出社會主義國家的課本由於馬列主義意識形態認為社會進化為歷史自然的規律，因此所有天然資源和財富關係都被賦予了馬列主義式的解釋，同時國家的建設計劃則被視為社會主義思想的具體實現，因此也是屬於「自然規律」的一部分。²⁹Rodden 對社會主義國家教科書編纂的意識形態發現相當的具有創見，本研究將延伸 Rodden 的觀察，希望將教育史長期關注的全國性教材與意識形態的關係的觀點向下延伸到地方政府如何的意識形態如何書寫地方。

3.教育與勞動生產相結合運動的相關研究

以文化史或社會理論的觀點考察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的著作目前相對缺乏，其中關注到 1958 年教育革命的著作為裡李慶剛的《大躍進時期教育革命研究》一書，其他的通史類著作多半僅對大躍進時期的社會變化進行描述部分的梗概，MacFarquhar 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曾給予在教育界發生的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運動一些關注，教育史類的著作在這部份則多半是轉述各地報紙、中央文獻。³⁰除此之外，在一些教育年鑑中我們也可以看到作者們整理當時的教育文件

²⁸ May-bo Ching, "Classifying Peoples: Ethnic Politics in Late Qing Native-Place Textbook and Gazetteers", *The Politics of Historical Production in Late Qing and Republican China*, Robert J Culp, Tze-ki Hon ed. (Boston: Leiden, 2007), pp. 55-79

²⁹ John Rodden, *Textbook Reds: Schoolbooks, Ideology, and Eastern German Identity* (University Park, P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 Press, 2006)

³⁰ 對於專業的研究，可以參考：李慶剛，《「大躍進」時期「教育革命」研究》（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0，第 1 版）；周全華，《「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廣州市：廣東教育出版社，1999，第 1 版），時代較近的通史類著作則可參考：林蘊暉，《烏托邦運動：從大躍進到大饑荒(1958-1961)》（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8，第 1 版）；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修訂版)》，《最近兩百年中國史》（台北市：聯經，2001）；Roderick. MacFarquhar，《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 2 卷（石家莊市：河北人民，1992，第 1 版）；John King Fairbank、Roderick MacFarquhar，《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49-1965)》（上海市：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第 1 版）；教育史方面的著作晚近可參考的

並重述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運動的發展，以下分別介紹這前人研究的成果。³¹

在前人研究中，大躍進期間教育界的變革大致上可以區分為以下幾點：

1. 教育權力下放
2. 教學機構與組織擴大
3. 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運動

研究者們對於上述的教育改革各有著重，對通史類著作而言，教育組織的擴大與大躍進期間各地成立的農民公社，普及學校教育，甚至是大躍進後期的「浮誇風」各自有所聯繫，高奇在《中國教育史研究》中將教育組織擴大解釋成是當時意圖多快好省的發展教育事業的一部分；張禮永等人在《共和國教育 60 年》中則認為這是由於 1949 年之後教育體系的發展造成高小學生升學與就業人數失衡，才導致政府必須要擴大教育組織容納在 1957 年時五分之七不能升學的學生；蘇渭昌等人在《中國教育制度通史》一書則將教育組織擴大與同時期各級政府習於制定過高的計畫作了聯繫，認為這是大躍進的急躁風在教育上的展現；比較不同的是 MacFarquhar 在《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中的詮釋，他將教育組織擴大與當時的掃盲運動放在一起討論，並提到了由於教育體系的擴大，農民出身的科學家人數也大量上升。³²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出雖然西方研究者較早關注大躍進期間的教育革命，但其解釋與中國的研究者大相逕庭，而這點也反映在教

則有：高奇，《中國教育史研究》，陳學恂編，第 6 卷（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第 1 版）；張禮永、郭軍，《共和國教育 60 年》，杜成憲編，第 1 卷（廣州市：廣東教育出版社，2009，第 1 版）；蘇渭昌、雷克嘯、章炳良，《中國教育制度通史》，李國鈞，王炳照編，第 8 卷（濟南市：山東教育出版社，2004，第 1 版）；另外，雖然地方教育史的書籍不多，但關於 1949 年後的上海教育發展仍可找到呂型偉，《上海普通教育史》，呂型偉編（上海市：上海教育出版社，1994，第 1 版）

³¹ 年鑑與資料集可參考：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編，《中國教育年鑒：1949-1981》（北京市：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4）；顧明遠編，《中國教育大系(修訂版)》（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³² 高奇，《中國教育史研究》，陳學恂編，第 6 卷（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第 1 版），331；張禮永、郭軍，《共和國教育 60 年》，杜成憲編，第 1 卷（廣州市：廣東教育出版社，2009，第 1 版），136；蘇渭昌、雷克嘯、章炳良，《中國教育制度通史》，李國鈞，王炳照編，第 8 卷（濟南市：山東教育出版社，2004，第 1 版），196；John King Fairbank、Roderick MacFarquhar，《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49-1965)》（上海市：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第 1 版），435-449 大躍進時期，這類「農民科學家」對人民公社的生產機具、方式的改良屢見不鮮，結果各有好壞，因此對於他們是否是「科學家」，或許不應過度樂觀

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研究上，陳蘊暉認為學校辦工廠的風氣在大躍進的浮誇風下最後成了學校辦的工廠與其專業毫無關係，而地方教育單位拿浮誇的數據大放衛星，造成了極大的混亂；高奇進一步的認為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及後續討論已經形成紅與專的兩條路線爭議，將教育上綱上線形成教育思想上的混亂。部分研究者認為，教育與生產勞動結合僅適用於農業中學與江西共大等與生產單位密切結合的教育機構，如張禮永等人則引述陸定一在當時的講話，認為農業中學雖然不能傳遞與全日制學校一樣的知識，但以當時國民經濟發展的情況，農業中學已經是擴大教育的一種替代路線；蘇渭昌等人雖然引用了 1961 年整頓教育後的文件指出 1958 年的教育革命超出了教育事業本身的發展條件，但認為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兩條腿走路」路線基本上調動了群眾的積極性，並且走出過去完全由政府辦教育的侷限；MacFarquhar 則引述了劉少奇的講話，認為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不單單是兩條腿的雙軌制，同時也是「將工業與教育同時辦起來」³³。

相較於前述的著作，李慶剛的《大躍進時期教育革命研究》較深入的針對 1958 年的教育變革進行研究，在此前的研究者往往不以教育革命指稱 1958 年的教育革命，並將其視為文革前十七年教育發展的一部分³⁴。李慶剛在他的書中提出 1958 年起的教育變革可以被稱為教育革命的原因在於 1958 年起的教育變革與此前的教育發展相較，其指導性的思想已有明顯的改變，具體的差異為：教育為無產階級服務（如強調右派份子的子弟不能就學，政治性內容更多等等）、教育與生產勞動結合以及教育事業躍進式發展，也因此李慶剛的文章也圍繞在這幾項議題中討論，並引用了當時許多報章雜誌的紀錄提供各省市的教育單位如何調動學生參與勞動的情況，但李慶剛的文章對於教育機構外的單位，例如當時已能管理區域內教育單位的地方政府如何配合並指導「勞動」的進行，這一點就相當缺乏，但從毛澤東、劉少奇和陸定一等人所提出的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原則就不斷的強調教育單位的發展是大躍進運動的一部分，因此在前人的研究中的部分缺

³³ Roderick. MacFarquhar,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 2 卷（石家莊市：河北人民，1992，第 1 版），152；高奇，《中國教育史研究》，陳學恂編，第 6 卷（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第 1 版），頁 332；張禮永、郭軍，《共和國教育 60 年》，杜成憲編，第 1 卷（廣州市：廣東教育出版社，2009，第 1 版），頁 136-177；蘇渭昌、雷克嘯、章炳良，《中國教育制度通史》，李國鈞、王炳照編，第 8 卷（濟南市：山東教育出版社，2004，第 1 版），頁 192-194；林蘊暉，《向社會主義過渡：中國經濟與社會的轉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 2 卷（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9），頁 238-239

³⁴ 周全華，《「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廣州市：廣東教育出版社，1999，第 1 版）

陷，也提供了本文進一步發展研究的機會。



第三節：章節安排

本研究目前希望教育中的教育活動入手，之後進入到教室外的教育活動，因此先從課本中對於「帝國主義」一詞的分析開始，在這部份我們將看到上海市教育局如何在教材中呼應中央對帝國主義的詮釋，並賦予其上海特色，繼而發展到上海市 1950 年代不斷大興土木的工人新村以及被整建處理的「棚戶區」，由此踏入教材與城市規畫的模糊地帶，最後透過分析在教室外的教育中學生與老師怎麼參與他們在城市裡的勞動教育作為結論，這樣展現了 1950 年代的上海教育的完整過程以及「生產與教育結合」下的教育活動考察中共創造上海的新形象，並在上海教育局檔案與公開出版品間考察其編纂過程在中如何闡述中央的教育指示。

由於相關的資料目前在學界的使用相對較少，雖然過去的研究者已注意到工人學校和各類工廠中的文宣可能代表的意識形態論述建構過程，但筆者認為教材中不僅只有「論述」，而是能找到其與城市管理當局的城市規畫有所符合之處，換言之，筆者認為對大躍進時期鄉土教材與教育活動的分析研就不只是反映了大躍進的歷史或是上海在大躍進前後的建設，而是體現了中共的「中央－地方」關係與地方治理邏輯（如地方政府各部門間的互動、群眾運動方式等），以更大的脈絡下解讀這批文本，希望能提供相關研究者對於中共地方治理政策的歷史脈絡，以下為本研究的章節規畫：

1. 第一章：帝國主義的城市－帝國主義和其在教材中的形象³⁵

本章節關注大躍進期間的上海市政府如何在教育中刻劃 19 世紀西方國家與上海城市發展的歷史關係，並討論地方政府的區域想像如何在教材中重塑城市的過去。本章節一開始將先關注大躍進時期上海市的鄉土教材中，「帝國主義」在舊上海複雜的都市肌理如何登場，上海市教育單位會將城市歷史上哪些部分視為舊社會裡的「帝國主義」遺跡；接著將結合 1949 年代以來上海市政府對城市的神塑與區域重劃政策，將教材中的形象與都市發展進行討論，梳理實存的城市與文字中的差異。經過上述的討論後，本章節將試圖討論上海市政府如何透過對於帝國主義的闡釋，梳理上海市當下的城市環境與其過去的關係，並透過大躍進同時展開的自編教材指示，讓學生藉由市編教材識讀城市的地景。

2. 第二章：塑造工人之城：以大躍進（1958-1961）期間上海鄉土教材中棚戶區

³⁵ 本章節修改前曾於 2012 年 10 月 5 日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第八屆冷戰時期海峽兩岸歷史研究生工作坊發表，在此致謝，並將刊行於台灣大學《史原》復刊第五期（2014 年 9 月）



及其群眾形象描寫為例³⁶

這個章節關注於鄉土教材中對於城區內實際建設的描述，並以 1949 年時圍繞在上海城區周遭的棚戶區作為討論中心，該區域的形成與上海現代發展的歷史背景有關：勞工無力負擔租界內的住宿，但基於工作方便，仍須居住在鄰近租界的區域。1949 年之後，棚戶區的居民也成為政權意識形態下受到宣傳關注的一群人，在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下，地方政府如何在教材中呈現其對城區投入的公共建設，以及工程所代表的市政願景。本文在這部分將先介紹上海棚戶區形成的原因，以凸顯這類區域在都市發展上的意義，接著討論教材如何描述改造棚戶區等相關的公共建設與刻劃群眾如何在這些建設的協助下「走出來」的形象。本章承繼上一章節對歷史的縱向討論之後，以橫向的區域變化作為討論的核心，討論城市未來的願景與當下的改造的再現，以及在學生的作文、老師所使用的教案中，又是如何學習這些願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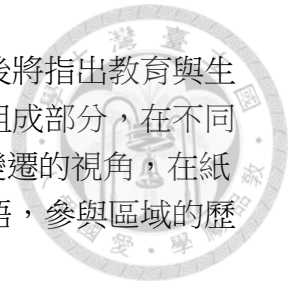
3. 第三章：學習「勞動」：以大躍進期間（1958-1961）上海市的教學與生產勞動相結合運動為例³⁷

這個章節中將以實際的教育活動做為說明教育如何與城市結合，以生產勞動運動考察市政府對城區中不同的勞動生產（經濟）計畫。這部分著重於考察當時所提倡的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政策在上海市的實踐，並將該政策視為地方政府透過教育單位傳遞區域發展的策略，以此了解在大躍進時期區域政治、經濟政策重新調整下，學生如何參與區域的調整，凝視（gaze）城市的變化。首先將描述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運動的政治與思想背景，該運動在中共中央催生下，經過短時間試行後蔓延至各省市，此時一批與工廠、農村等生產單位協作、合併的學校應運而生。教育與生產勞動結合涉及的除了教育系統的調整，學生勞動成果與當地的經濟計畫之間的關係也浮上檯面，考察上述那些與生產單位協作的學校，便可了解在上海這個中國近現代工商業中心，地方政府各單位如何調節學校勞動的「產能」避免與既有工廠衝突，而教育單位又如何的透過話語和教法維持學生甘願（consent）勞動。若以區域變遷考察這段歷史，在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政策完善後，為強化農業生產而設立的農業中學也與市區內學校在招生問題上有所扞格，尤其當 1959 年上海合併原屬於江蘇的郊縣後。市政府要如何協調學生就學區域，緩和由升學問題所折射的市內區域差異，本章節將藉由這類議題處裡

³⁶ 本章節曾以〈書寫社會主義城市：以大躍進（1958-1961）期間上海鄉土教材中棚戶區及其居民形象為例〉發表於 2012 年 5 月 11 日國立中央大學歷史所「傳承與創新——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研究生論文發表會」，並出版於國立中央大學《史匯》第 16 期，2012 年 12 月 31 日

³⁷ 本章節發表於 2013 年 10 月 13 日由政治大學與山東大學合辦，第 14 屆兩岸四地歷史學研究生論文發表會，並獲得華東師範大學《熱風學術》第八輯邀稿

市政府對於市內不同區域、人群發展規劃。經過上述討論，最後將指出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教育方式不單只是大躍進時期教育政策的一個組成部分，在不同區域、職業的勞動讓生產勞動成為學生親身凝視（*gaze*）區域變遷的視角，在紙上的區域政策外，進一步的可以透過勞動實作其習得的政治話語，參與區域的歷史。



第一章：識讀「帝國主義」*



「我们不紀錄花。」地理學家說。

「為什麼啊！花是最美麗的東西！」

「因為花是短暫。」

「地理書是所有書籍中最珍貴的書……他們永遠不會過時……我們記載的是永恆不變的東西。」

「但是短暫是什麼意思？」

《小王子》³⁸

第一節：前言

不同的街區、道路承載了不同時期的城市記憶。在城市中，歷史不只是字面上的浮光掠影，不同時期的發展在城市中銘刻了街道與建築，但由於現代人們習於以地圖認識城市，城市的樣貌化為圖紙上的空間符號——但時間卻在圖紙上缺席。³⁹ 這類圖紙上的符碼操作普遍見於現代社會，不過在中共建政後，圖紙與故事不僅具有標記「當下」社會外，在政治論述上讓新、舊社會的差異「躍然紙上」。也因此我們可以找到大量的革命故事講述一地如何進入新社會的過程，其中最常見的模式為改編地方原有的歷史故事，或讓其他地區的故事更貼近當代

* 本章節修改前曾於 2012 年 10 月 5 日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第八屆冷戰時期海峽兩岸歷史研究生工作坊發表，並將刊行於台灣大學《史原》復刊第五期（2014 年 9 月），在此致謝

³⁸ Antoine de Saint-Exupéry, 《小王子》，陳建偉譯（上海市：東華大學出版社，2006，第 1 版），頁 109 - 111

³⁹ 關於在文本層面（如地圖）塑造空間的生產流程的文化論述，本章在此對「地景」與其他再現物做區隔的基本定義為不論其再現的方式為何，地景必然在實際的空間存在，這也是它和其他符碼不同之處，關於這方面的研究可參考 Denis Wood, 《地圖權力學》，王志弘譯（台北：時報文化，1996，第 1 版），頁 5-41, 163-238；王志弘, 《文化治理與空間政治》（臺北市：群學出版社，2011），頁 9-28，而至於關於以地景（相較於文本的型態可能較為具象）塑造的一般性理論，可以參考：John Wylie, *Landscape*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1 ed.), pp.55 - 93；Sharon Zukin, *Landscapes of Power: From Detroit to Disney Worl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pp. 253-275

的，強化新舊社會間的差異。⁴⁰例如革命故事《白毛女》就是透過改編河北民間故事而成，在除去神怪的成分後，鄉野傳奇《白毛仙女》和中共不斷的強調「舊社會將人逼成鬼，而新社會將鬼變成人」論述交織成了新的政治寓言。一般學校的作文教學手冊也提醒教師們以《白毛女》等文為範式指導學生創作具有政治意義的地方故事，同時，故事不能只是遙遠的寓言，作文教法要求學生需將故事轉以自己的語氣創作，成為自己的故事。⁴¹這類特意強化事物部分樣貌的作文教學，讓我們得以進一步思考，在中共建政後官方的教育單位筆下的地方故事和歷史會是什麼樣貌？

1958 年大躍進運動開始後，在中共中央的指示與各級政府發動群眾下，民歌採集、編寫與教育界的鄉土教材編纂活動大行其道，從這一年展開編纂的各地鄉土教材也是當代中國鄉土教科書的起源。其後三十年間歷經多次政治變化，直到 80 年代末，教科書中仍保留大部分在 1958 年時的架構與內容。⁴²因此，在 1957 年底開啟這類鄉土教材書寫範式的最初階段便有其意義。

由於教育行政權限下放，各地教材展現出較原先人民教育出版社統一編纂版本（以下簡稱人教版）更多的地方特色，我們可以由這些教材中各省市對其過往所著重之處的不同，考察各省市強調的「地方傳統」。如湖南、陝西和江西等較

⁴⁰ 辛安亭在討論邊區教材編寫的文章中分析民國時期語文教材中的「蛇在地上爬，爬的好爬的快」，這類描述僅能適用於城市，因為所有鄉村地區的孩子都知道蛇是會傷人的，因此這類故事移植時必須改寫，參見：辛安亭，〈回顧在延安十一年的教材編寫與生活〉，《中國教育大系》，顧明遠編，第 3 卷（武漢市：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第 1 版），頁 2072

⁴¹ 關於作文素材考慮於假期中寫「聽來的故事」、「爸媽的童年」等鄉土主題，並要求老師進行評述，請參考：李國才、繆詠禾，《小學高年級作文教學經驗》（上海市：上海教育出版社，1960，第 1 版），頁 52；關於作文教學時評析《白毛女》如何成功的改編神怪故事，使其富有政治性，請參考 蕭東，《作文講話》（上海市：上海教育出版社，1959，第 1 版），頁 4-7 洪長泰在他的書中認為中共對於民間與地方歷史的改寫可能繼承了 1920 年代中國知識分子對於從民間歷史中淬煉新的國族歷史的看法，這一點本文會在結論部分討論 洪長泰，《到民間去：1918-1937 年的中國知識分子與民間文學運動》（上海市：上海文藝出版社，1993，第 1 版）

⁴² 或許我們會認為 50 年代末期的鄉土教材滲入中共的意識形態，造成其對區域歷史的改編，但同樣的章節安排直到 1980 年代末期的鄉土教材中依然存在（部分內容也未隨著毛時期的過去而調整），唯一的差別在於 1989 年的上海市鄉土教材在課本末頁補上介紹各區的名勝古蹟導覽的〈上海鄉土史考察指南〉一節，請參見：上海市中小學教材編寫組，《上海鄉土歷史》（上海市：上海教育出版社，1989，第 1 版）。筆者認為這部分的改變值得以當代中國旅遊文化的角度再進一步探討，但其中不曾改變的論述模式對區域發展論述的限制，或可思考阿圖塞提供的基本假設：我們討論的主題本身限制了我們的問題結構。

內陸省份，鄉土歷史往往由古代，甚至是考古時期作為書寫的起點，而除了在人教版全國教材中提過的各地古代農民戰爭外，鄉土教材強調當地的傳統工業或人物故事，陝西的教材提到北宋耀窯的興衰與當代陝西陶瓷工業的復興，江西的教材提到了湯顯祖、王安石和陶潛的故事。⁴³另外有些省市的鄉土教材多由清末開始書寫，多數強調在清末封建統治下人民起義，或是民國後日本的入侵，如山東鄉土歷史中提到捻軍起義時，雖和人教版課本一樣未討論捻軍的成因，但在結論時強調捻軍是山東人民的榜樣。⁴⁴其他多數省市，如內蒙古、安徽、湖南等教材則是按照人教版的章節安排，按照不同的革命階段講述該省與中共革命組織的關係。⁴⁵和其他省市不同，作為當時唯二的兩個直轄市，上海市的歷史不能像山東歷史乾脆略過青島租界，或吉林歷史排除長春等大都市在日本統治下的工業建設，專注討論共產主義者在鄉村與長白山區的發展，上海的鄉土故事與歷史幾乎不可能排除「西方」要素，西方勢力以上海為灘頭堡擴張到全國的過程與城市的發展糾結。⁴⁶在隨著大躍進而生的鄉土教材中，編輯與撰寫者會如何關注這些已經嵌入城市的地景，直接面對「帝國主義」在上海的實踐，這樣獨特之處也是本章所關注的面向。⁴⁷

鄉土教材和民間故事雖然都是講述本地的故事，但教材的使用範圍侷限於教育系統內，而其編纂方式也就不同於文化系統可以在民間蒐集審查，教育系統在

⁴³ 陝西省教育廳，西安師範學院編，《陝西省中學鄉土教材 初中歷史》（西安市：陝西人民出版社，1958，第1版），頁10；江西省教育廳教學研究室編，《中學鄉土教材 可愛的江西（第三輯）》（南昌市：江西人民出版社，1957，第1版），頁3-42

⁴⁴ 山東省教育廳編，《初級中學適用 山東鄉土歷史教材》（濟南市：山東人民出版社，1959，第1版），頁4；蘇壽桐編，《初級中學課本 中國歷史第三冊》（北京市：人民教育出版社，1958，第3版），頁18 人教版著重於捻黨失敗的原因，山東的教材則著重於捻黨與當地的關係

⁴⁵ 湖南省教育廳編，《湖南近代現代革命史簡編》（長沙市：湖南人民出版社，1958，第1版），頁14-69；內蒙古自治區教育廳教研室編，《內蒙古自治區中學歷史鄉土教材 代用課本》（呼和浩特市：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60，第1版），頁4-37；安徽省教育廳編，《高級小學試用課本 史地鄉土教材》（合肥市：安徽人民出版社，1958，第1版），頁1-16

⁴⁶ 吉林省教育廳編，《中學鄉土歷史試用教材》（長春市：吉林人民出版社，1959，第1版），頁25-41；山東省教育廳編，《初級中學適用 山東鄉土歷史教材》（濟南市：山東人民出版社，1959，第1版）

⁴⁷ 大躍進期間在各類期刊上均可發現許多討論當地歷史與文化的文章，就已出版的專書而言，本章關注的上海市就所屬的出版社就分別有：上海民間故事編委會編，《上海民間故事選》（上海市：上海文藝出版社，1960，第1版）；張回、包村，《上海近百年革命史話》（上海市：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第1版）；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上海民歌選》（上海市：上海文藝出版社，1959，第1版）

行政與經費上的中央集權使得教材編纂與講授仰賴各級政府的指示，而非編纂者或教師的個人意志⁴⁸。在普通教育中納入鄉土教材並非中共首創，過去的研究者也曾關注清末到民國間廣東鄉土教材中的族群政治等議題。⁴⁹在可見的檔案中，抗戰中期汪政府統治下上海市便已有編纂鄉土教材的政令，不過這類教材與 1958 年時在毛澤東與中共中央指示下各地編輯的教材有許多差異。⁵⁰在汪政府的指示中，教材編纂權責在學校，這也使學校周遭的事物反而比起整個區域的發展要更著重，且編纂指示中也未提及編輯需要注意區域發展的歷史面向。⁵¹ 1958 年開始的鄉土教材編纂則與上述作法大相逕庭，各縣、各校雖然也負擔了編輯部分鄉土教材中內容的任務，但僅作為全市教材的補充。⁵² 而在編纂上，相關的教學參考與指示都不斷提及該教材「和（德日法西斯）腐朽的罪惡的『本土教育』有著不可調和的原則上的區別……我們的鄉土教育是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教育的一部分」。⁵³這時期編纂的上海鄉土教材在 1958 年後的 30 年間少有變動。因此上述編輯原則下，教材對歷史的揀選和情節安排就對這段期間的學生如何認識自己的城

⁴⁸ 就鄉土教材而言，可以參考其出版量與上海市中等學校學生數量做推算，而教材並非課本，不一定每個學生都得有，因此也能看出在大躍進時上海市第一次出版鄉土教材的流通量其實相當龐大，請參考 表格 1 目前所見大躍進時期上海市各類鄉土教材出版情況 和表格 2 1949-1963 年間上海市普通中學學生和專任教師人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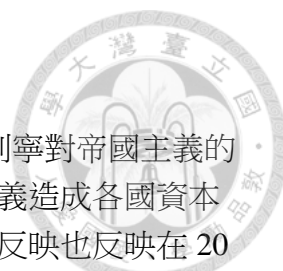
⁴⁹ May-bo Ching, "Classifying Peoples: Ethnic Politics in Late Qing Native-Place Textbook and Gazetteers", *The Politics of Historical Production in Late Qing and Republican China*, Robert J Culp, Tze-ki Hon ed. (Boston: Leiden, 2007), pp. 55-79

⁵⁰ 上海市檔案館，〈R48-1-79〉（上海市：上海特別市教育局，1942），另外，由於目前筆者未見汪政府時期上海各地中小學編纂的鄉土教材，因此難以對兩者進行比較，不過針對戰後在社會主義集團中如何面對法西斯主義遺留的「本土教育」在西方的教育史研究中也有少數作品可供參考，John Rodden 曾用了 *From Brown to Red* 來描述在東德發生的現象，請參見：John Rodden, *Textbook Reds: Schoolbooks, Ideology, and Eastern German Identity* (University Park, P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 Press, 2006), pp. 3

⁵¹ 關於毛澤東與中共中央在 1957 年中到 1958 年時對各地鄉土教材編纂的指示，請參考：毛澤東，〈在普通教育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毛澤東文集》，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第 7 卷（北京市：人民出版社，1957，第 1 版），頁 245-249；作者不詳，〈教育部關於編寫中小學、師範學校鄉土教材的通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報》，1958。而對於上海當地鄉土教材編纂原則中必須注意到整個區域與國家的歷史，請參考：上海市檔案館，〈B105-7-690〉（上海市：上海市教育局，1959）

⁵² 上海市檔案館，〈B105-7-686〉（上海市：上海市教育局，1959）

⁵³ 白砥民，《歷史課中鄉土教材的教學》（上海市：上海教育出版社，1958，第 1 版），頁 1，頁 8



市有極大的影響。

「帝國主義」在馬列主義理論最早且最清晰的論述應始於列寧對帝國主義的研究，其中帝國主義中被視為「社會主義的前夜」，同時帝國主義造成各國資本在空間上（以鐵路網而言）「分布的不平衡」與壟斷。這類壟斷反映也反映在 20 世紀初社會主義者的中論上，帝國主義將現代資本注入殖民地，由於現代大資本的集中，殖民地可能不會有成熟的無產階級，1920 年第三國際重新討論帝國主義與殖民地關係時，進一步指出殖民地的革命可能不會是共產主義性質的革命，反而得與當地資本階級合作，並不應將這些革命塗上共產主義的色彩。⁵⁴這些討論呼應了馬克思本人在《不列顛在印度統治的未來結果》中非西方世界在帝國主義下淪為殖民地的觀點，但在非西方世界的革命者論述本身的革命時卻難以複製馬克思認為英國資本主義摧毀印度舊社會的貢獻，反而可能得像共產國際面對殖民地的革命時的務實態度，透過重組民族的革命歷史達到反帝國主義的目的。⁵⁵由於帝國主義的故事蘊含著空間、時間的全球資本重構與深埋地方的革命策略，這些理論背景讓上海的故事和印度故事一樣得重新由既存的脈絡中揀選。⁵⁶作為中共最早進行工人革命與中國接觸現代西方的主要口岸，地方政府如何在大躍進的氛圍下以「帝國主義」的視角，揀選所需的歷史故事、在市編教材中布置情節，本章將在下面的章節中分別以時間和空間的角度進行討論。

第二節：故事中的帝國主義

與其他省市（如江西、河南、甘肅等省分⁵⁷）的鄉土教材略有不同，在可見

⁵⁴ 庫恩，《共產國際文件匯編》（北京市：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65），頁 187190

⁵⁵ 上海市教育局教學研究室，《高級中學課本世界近代現代史下冊課堂教學參考書》（上海市：新知出版社，1958，第 1 版），頁 8-12

⁵⁶ 以下定義在分別參考政治經濟學辭典和馬列主義原典：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北京市：人民出版社，2001，第 3 版），頁 1, 頁 4；許滌新，《政治經濟學辭典（中）》，許滌新編（北京市：人民出版社，1984，第 1 版），頁 1

⁵⁷ 甘肅省教育廳編，《甘肅省初級中學鄉土教材 中國歷史》（蘭州市：甘肅人民出版社，1959，第 1 版）；河南省教育廳編，《河南省歷史鄉土教材》（鄭州市：河南人民出版社，1959，第 1 版），目錄；江西省教育廳教學研究室編，《中學鄉土教材 可愛的江西（第三輯）》（南昌市：江西人民出版社，1957，第 1 版），編輯凡例 甘肅的鄉土教材由遠古的甘肅開始寫起，相較之下上海的鄉土歷史教材僅補充近現代史部分的中國歷史，河南省的鄉土歷史更強調河南人民走過悠久的歷史道路，至於江西的鄉土教材則分有三部分，革命史蹟與其他歷史人物並行不悖。

的版本中，上海的歷史總是被設定從鴉片戰爭後開始：各國通過南京條約將上海轉變為通商口岸，繼而取得虹口一帶的租界，從此外國勢力涉足上海，上海人民對帝國主義的鬥爭也由此展開，太平天國、小刀會一直到民國初年的工人運動成為了這座城市故事的骨幹，並鑲入全國的歷史敘事中（見圖 1 開埠前的上海和圖 2 解放後的黃浦公園與外灘的形象）。這一套與故事相伴的時間架構，架構「引導學生形成歷史觀念」，成為學生理解過去的結構。⁵⁸這一節將討論這些被選入教材中的故事，並盡可能的描述在教學現場中他們如何呈現。

上海的革命故事與到中共在全國的革命戰略規劃息息相關，雖然上海的工人和先進思想提供了中共初生的土壤，但外國勢力與本地社會在上海形成了複雜的結構也同時讓中共在 1930 年代初被迫撤離，因此 1949 年後重返上海的中共黨政機關首先得面對也就是上海複雜的人群結構。⁵⁹教材中的歷史則試圖梳理上海複雜的過往，首先人群被區分為買辦階級與勞動工人，對買辦階級，教材編纂指示提到要「加強（學生）對侵略者及其走狗的深惡痛絕……提高革命的警惕性」，⁶⁰工人們則作為其對立面，展現著「光榮的革命傳統」。⁶¹在梳理本地群眾的同時，更重要的是如何面對上海與外國的聯繫，由於中共認為反法西斯、反帝國主義的鬥爭是在全球尺度上展開的，因此在挑選教材中的材料就也得注意到不同事件在革命發展階段中所蘊含的意義，編纂指示中甚至提到上海的鄉土教材在編輯和施教時都必須提及「上海作為外國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入侵中國的基地……（使學生）認識上海人民和全國人民一起……摸索著保鄉衛國的道路」等連接上海特殊地位的詞句。⁶²其中，工人的角色透過革命敘事佔據了極大的篇幅，除了呼應中共的意識形態，也搭配 1949 年以來將這座城市由一座以外貿導向的「帝

⁵⁸ 上海市檔案館，〈B105-7-363〉（上海市：上海市教育局教學研究室，1958）

⁵⁹ 在抗戰後中共面對上海等大城市的問題時，毛澤東曾多次的提到大城市作為蔣介石勾結「美帝國主義」的中心，而被帝國主義分化的資產階級也造成大革命時期中共的挫敗，參見：毛澤東，〈抗戰勝利後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毛澤東選集》（北京市：人民出版社，1945，第 2 版），頁 1123-1136；毛澤東，〈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毛澤東選集》（北京市：人民出版社，1939，第 2 版），頁 638-640，而在 1949 年時毛澤東與陳毅都對解放軍如何進入上海，面對一般的群眾做了闡釋，請參見：陳毅，〈入城紀律是給新區城市人民的見面禮〉，《陳毅軍事論文選》（北京市：解放軍出版社，1996，第 1 版），頁 345-501；毛澤東，〈必須維持上海，統籌全局〉，《毛澤東文集》，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第 5 卷（北京市：人民出版社，1949），頁 335-336

⁶⁰ 上海市檔案館，〈B105-7-363〉（上海市：上海市教育局教學研究室，1958）

⁶¹ 上海市檔案館，〈B105-7-363〉（上海市：上海市教育局教學研究室，1958）

⁶² 上海市檔案館，〈B105-7-363〉（上海市：上海市教育局教學研究室，1958）

國主義基地」轉向以國營重工業與工人為主的社會主義城市的各類政治運動。⁶³

各級學校上海市鄉土歷史教材都均以鴉片戰爭作為起點，但初中和高中的教材在故事的開頭則有些許差異。高中教材特別介紹了上海在鴉片戰爭前的歷史，初中與高小教材則是直接從〈吳淞抗英鬥爭〉開始寫起，這兩則故事刻畫了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原始面貌：透過軍艦和買辦窺視中國繁榮的港埠，東印度公司的職員在海岸邊看見「黃浦江上有無數船隻」（見圖1開埠前的上海）起了進犯上海的野心，而清政府殘破的武裝則給了帝國主義進入上海的機會。⁶⁴面對外國勢力入侵，教材特別凸顯了清政府的角色，高小與初中課本放大了江南提督陳化成在吳淞抗英的形象，用以對比兩江總督牛鑑「應該逃跑」的主張。教學指示中說明這段歷史的描述應當注意清政府無力保護人民群眾的利益，不過陳化成卻仍具有清朝官員的身分，高中教材選擇性地避開這類特殊的清政府官員，但配合初中教材則將政府內官員內的矛盾轉化為官員們對人民的看法，照顧人民利益的陳化成也在吳淞口戰死後被當地百姓入祀城隍廟。⁶⁵帝國主義在這一套故事的脈絡中成為切割清朝政府與人民的工具。

值得關注的是，雖然陳化成在教材中被認為是支持人民的利益官員，但不論在任何一個版本的故事中，除了在中共建政後被視為封建禮教之一的「入祀城隍廟」行為外，故事中沒有描述人民群眾對陳化成抗英的主動支持，這一點或許是受限於抗英的相關史料未能證明，但教學參考中卻極力的要求教師將陳化成死後成為神的過程變成「普通勞動者……渴望解放的要求」，這類沒有明確史料可佐證其生平的人物相當有趣，1956年人教版初中歷史課本在這段時期只提及了三元里人民起義，但1964年版便納入了陳化成，內容雖與大躍進時期的鄉土教材差

⁶³教育單位與城市工程單位的橫向聯繫可能較其他單位為較弱，但我們還是可以找到上海教育出版社行文上海市委教育衛生部要求指示該如何說明城市工業發展政策的公文（該文表示要以「通俗的方式」說明市政府對於新工業的規劃），而另外也有公文關於上海教育出版社對城市建設局的請示，要求對方檢查教材是否符合城市當前的規劃，而在教育局研究室編輯課本的指示中也強調要結合城建局與規畫局的資料，請參見：上海市檔案館，〈A23-2-809〉（上海市：上海市委衛生教育部，1961）；上海市檔案館，〈A54-2-1463〉（上海市：上海市基本建設委員會城建處，1961）；上海市檔案館，〈B105-7-351〉（上海市：上海市教育局，1958）；上海市檔案館，〈B105-7-620〉（上海市：上海市教育局，1959）

⁶⁴ 上海市教育局，《高級中學中國歷史第三冊鄉土教材》（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58），頁2-4

⁶⁵ 上海市檔案館，〈B105-7-363〉（上海市：上海市教育局教學研究室，1958）

異不大，但更強調了陳化成的「兵士出身」。⁶⁶在鋪陳陳化成殉職時，教學參考鼓勵教師渲染陳化成的形象，體現了教材依照不同的教學需要揀選人物生平（而非全然虛構）的編輯手法。

陳化成與他的部下戰死後，帝國主義踏上了上海的土地，為此後的上海歷史拉開了序幕。

陳化成的死象徵著腐敗的清朝官員已無力抵抗。在「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的基本假設下，教材開始處理租界建立後人民群眾中的分化，一部份的人成了買辦階級，這批人在教材中被直斥為「漢奸」——「外國資本主義在中國開銀行、挖礦山……沒有一件不是透過買辦的手」。⁶⁷上海人民則被全國人民群眾起義所喚醒，太平天國期間小刀會的起義在各級學校的教材中都得到了相當大的重視。小刀會源於民眾自保的組織，在台灣、福建、上海等地都曾起事，而在太平天國期間，小刀會活動目的在於建立大明太平天國，雖然小刀會確實可代表太平天國期間上海的民變，但小刀會也試圖維持其所佔領的縣城與外國租界的和平。這使得教材在處理小刀會的故事時，在這一部分有所只好剪裁。小刀會在教材中成為顛覆的清朝政府與狡詐的租界帝國主義代理人合作下的犧牲品，由於「封建統治者與侵略者互相勾結，絞殺革命」，⁶⁸小刀會如同 20 多年後在另外一座大城市被政府、外敵包圍的巴黎公社般被圍困在上海縣城，租界的傭兵在清朝獻出了上海租界區的管理權下撲滅起義。本地的歷史故事和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相結合，述說著「反封建需反帝」的歷史規律。⁶⁹

小刀會起義的失敗成為教材中的轉折點。清朝政府透過與帝國主義的合作，在上海建立起了大型的近代工業，而這也「刺激了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產生」，⁷⁰民族資產階級在上海城市敘事中登場，但這類帝國主義下帶有兩面性的人並未分到任何篇幅，反帝國主義鬥爭仍然是上海城市始終清晰的主線：法租界以公共衛生為由拆除寧波會館爆發的四明公所衝突、上海小車工人罷工成了課本中所關注

⁶⁶ 白砥民，《歷史課中鄉土教材的教學》（上海市：上海教育出版社，1958，第 1 版），頁 11；人民教育出版社，《初級中學課本 歷史第三冊》（濟南市：人民教育出版社，1964，第 6 版），頁 6

⁶⁷ 上海市教育局，《高級中學中國歷史第三冊鄉土教材》（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58），頁 3

⁶⁸ 上海市檔案館，〈B105-7-363〉（上海市：上海市教育局教學研究室，1958）

⁶⁹ 上海市教育局，《高級中學中國歷史第三冊鄉土教材》（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58），頁 8

⁷⁰ 上海市教育局教學研究室，〈高小歷史第三冊增編上海鄉土教材幾個問題的說明〉，《上海教育》第 13 卷（1958），頁 23

的帝國主義對上海人民壓迫的代表，不過兩件事情如果仔細討論可能節外生枝，如寧波人的鄉土意識和自食其力的車夫是否該定義成產業工人的成分問題。教育局的指示中特別提到這兩件事情的教學原則是「不應該將他和全國性的歷史事件分裂開來……全國各地反帝鬥爭洪流中的一部分」，⁷¹ 這句話清楚的強調上海市教育當局對於鄉土歷史選材時所關注到的面向：描寫地方的歷史時，透過全國或大區域的事件將地方整合。在清末的敘事中，雖然民族資產階級同樣集中於上海，但由於其兩面性，或許使教育當局不得不選擇更小範圍的事件，這時由帝國主義所激發的民間動亂就成了連接上海與全國歷史的接點。

除了故事脈絡，這些近代故事被呈現的細節也提供學生們參與「反帝國主義」運動的想像。在描述 20 世紀初的上海抵制日貨運動時，高小和初中的課本中提到了「兒童」可以做些什麼，例如民國初年中抵制日貨時「兒童手拿竹竿鐵鉤，一見日貨招貼，就狠狠的撕毀他」⁷² ——而在這段教材中以大量的篇幅描述學生以罷課形式支援罷工、參與愛國演講，甚至以集體退學的對抗租界當局的學校政策。高中教材也照顧了高中生可以做的宣傳形式，在講述反美國華工禁約運動時，教材描述當時學生們透過表演話劇、參與演講的形式鼓動其他的社會階級認識到美國帝國主義的面貌，而帝國主義加緊侵略與學生喚醒其他階級也開啟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反外國工廠事件和持續不斷的工人運動。在此，帝國主義（獲具體為反帝國主義運動）成為黏合上海不同階級運動，並且讓學生能參與社會的機會，如果考慮到大躍進時期金門炮戰在學校、里弄間的各類宣傳，現實與城市的過去似乎在「反帝國主義」下得到共鳴。

「帝國主義」經過鄉土教材中的故事鋪陳，成為連接中國舊社會與 1958 年當下的接點，上海的學生們則學習了解讀自己城市的一種方式。在教學參考中也認為透過「帝國主義」貫串本地的歷史教學，能讓學生感受到「新中國建立以來鄉土面貌的巨大變化」。⁷³ 時間的重塑對於學生認識發生在自己身上的政治運動可能也有其他效果，1958 年上海的教育界最大的改變莫過於「生產與教育結合」的勤工儉學運動。學生們在歷史課上學到帝國主義將舊社會的兒童壓迫為童工，在現實中，學生則認為新社會的勤工儉學將列寧「學習、學習、再學習」轉變為「勞動、勞動、再勞動」，讓自己變成舊社會的「童工」。⁷⁴ 儘管政治勢力能透過大規模的基礎教育改寫鄉土歷史，讓人們透過以新政權設定的觀點認識最熟悉的

⁷¹ 上海市檔案館，〈B105-7-363〉（上海市：上海市教育局教學研究室，1958）

⁷² 上海市教育局，《初級中學中國歷史第三冊鄉土教材》（上海市：上海教育出版社，1958，第 1 版），頁 9

⁷³ 白砥民，《歷史課中鄉土教材的教學》（上海市：上海教育出版社，1958，第 1 版），頁 12

⁷⁴ 上海市檔案館，〈A23-2-370-30〉（上海市：中共上海市委教育衛生部，1958）

土地——只是人們對新生的時間軸卻可能有著截然不同的認知。

第三節：城市中的帝國主義



每一個故事都會建構起一個想像空間，讀者在閱讀的同時步入故事的迷宮，不同的書寫所建構的想像空間性質上則有所差異——如奇幻文學作品與日記的差異，更具體的表現可能是旅遊書上的文字成為旅人在實存空間中的參考座標——Hevia 曾讓我們認識八國聯軍如何透過改寫北京的空間規劃讓舊中國的權力核心「學習帝國主義」。⁷⁵ 鄉土教材更是明顯的希望學生在一個「親切感人」⁷⁶ 的空間中旅行，本章接下來描述的是大躍進時期鄉土教材是如何書寫上海的舊市區中的一些特定區域。

上海的建成區主要圍繞著過去的租界區形成的，1949 年之前的都市計畫不斷的嘗試調整租界與其他區域的關係，抗戰前的上海特別市政府試圖利用大上海計畫——在租界外的江灣鎮創造新的市中心——改變上海的區域中心，日本佔領時期也在大上海計畫堆疊軍需用途的大型商港取代外灘，不過這些規劃由於時間過短，都未能完全實現。⁷⁷ 中共建立政權後，中國政府終於能完全進入租界，調整建成區中不合理的居住結構與各區域的政治屬性也就由地方政府接續進行，如開放外灘公園並在其顯眼處興修人民英雄紀念塔便是此時的規劃。但由於歷史因素，多數重要的黨政機關仍然在建成區內的外國遺留建築中辦公。⁷⁸ 這些混雜的現象使得針對學生的鄉土教材不只得描寫地景在過去的輝煌，更重要的是得討論地景本身在 1949 年後的轉變，其中又以外灘由於距離上海市內交通樞紐不遠，特別受到各地教師在校外教學關注。

黃浦江畔的外灘係十九世紀中葉西方在上海建立租界後最早控制的區域，

⁷⁵ Hevia 曾提到八國聯軍佔領北京期間對於北京空間使用的改寫，尤其以打穿北京城牆建築車站為其中巧妙之處，請參見：James Louis Hevia, *English Lessons: the Pedagogy of Imperialism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195–240

⁷⁶ 上海市光明中學初一語文備課小組，〈到外灘上課去〉，《上海教育》第 20,21 卷（1958），頁 8

⁷⁷ 上海城市規劃志編纂委員會編，《上海城市規劃志》（上海市：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9，第 1 版），頁 70,76

⁷⁸ 吳海勇，〈上海解放後都市空間重構進程中史蹟與紀念場所建設〉，《上海城市的發展與轉型》（上海市：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第 1 版），頁 326；羅崗、許紀霖，〈城市空間再生產與社會主義新傳統〉，《城市的記憶：上海文化的多元歷史傳統》（上海市：上海書店出版社，2011，第 1 版），頁 272

英、法租界建築了與黃浦江平行的沿江大道和碼頭，方便商船和軍隊集結，同時為了聯繫英、美租界，租界工部局修建外擺渡橋讓外灘得以聯繫虹口一帶，使外灘成為上海租界區的中心，各式的歐式建築櫛比鱗次。⁷⁹ 也因為這些造型雄偉的建築，租界成為教育單位編輯鄉土教材時針對西方殖民（或是新中國如何擺脫西方殖民）最有利的圖像（見 圖 2 解放後的黃浦公園與外灘的形象）。西方所建立的租界讓上海的城市空間參與了資本主義的歷史軌跡，教材極力將西方國家一步步的奪取租界的行政與警察權的過程和馬克思曾經討論過西方在十六、十七世紀擴張殖民地的「海盜掠奪精神」連結，教學指南中建議老師們可以透過地圖的方式指出哪一上海的建築物與工廠是帝國主義者所建造的，接著詢問學生「為什麼這些又長又寬的馬路都是由東向西的呢？」。⁸⁰ 希望透過數過一遍列強在上海遺留的遺蹟後，讓學生認識「帝國主義列強把舊中國作為共有殖民地的情形……獲得深刻的表象」。課本中的圖文也有助於將外灘與中國人民的反帝國主義行為也得到了放大（見 圖 3 大鬧洋場），不過其中對於學生們最鮮明的形象可能莫過於在鄉土歷史教材中指出「（開港）第四天便有一個英國商人在小東門開槍打傷兩個我國的兒童」。⁸¹

除了教室內的教學，上海市的教育單位在大躍進期間將校外教學也列入學校計畫中，因此我們也可以看到一些當時各級學校前往外灘校外教學的紀錄。⁸² 一群初中老師為了教學語文課本中〈外灘變了〉這一課，先自行前往外灘備課，詢問各大樓的警察和沿街的司機、售票員，蒐集關於外灘政治性質變化的資料，之後他們帶著學生到外灘實地教學，並在黃浦公園的草地朗讀課文。教案的作者們對於這樣的空間安排特別感到自信，他們認為朗讀到課文中提及黃浦公園當下是如何的「整潔、安靜、美麗」時，周遭靜謐的公園與黃浦江所圍繞環境能給予學生認識這段課文的正回饋，這時候在朗讀課文時，學生應該更能想像課文中提到黃浦江畔的外國兵艦和那些「黃浦江畔的倉庫裡堆滿了從外國運來的廉稅的貨品」，同時教師藉由解說兵艦、外國傾銷的廉價商品與帝國主義間的聯繫，並回顧到當下的帝國主義侵略：1958 年的金門砲戰。藉由這些課文中對帝國主義的描述，學生們可以重新思考城市的轉變，建構起自己對城市的認知，甚至還有人回

⁷⁹ 鄭祖安，《上海地名小志》（上海市：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8，第 1 版），頁 63-65

⁸⁰ 林逸，〈歷史教學中鄉土教材的應用〉，《歷史教學問題》（1958），頁 41

⁸¹ 上海市教育局，《高級中學中國歷史第三冊鄉土教材》（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58），頁 5；上海市教育局，《初級中學適用 上海市鄉土地理教材》（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60），頁 23；白砥民，《歷史課中鄉土教材的教學》（上海市：上海教育出版社，1958，第 1 版），頁 17

⁸² 李進編，《上海教育發展 60 年重大事件紀實》（上海市：上海教育出版社，2010，第 1 版），頁 40

憶起過去他父親擔任碼頭工人時的遭遇，因而強化教材欲連結帝國主義與城市的目的。⁸³

另外一份教案提供了比起簡單的校外教學形式更加深刻的教法，上海市第六女子中學（原天主教曉明女中）的教師透過控訴會的形式，讓學生分成數組，前往以下幾個單位進行訪問，再回到課堂中控訴這些單位在過去如何成為帝國主義剝削人民的代表，其中分別是：

1. 黃浦區公安局（舊巡捕房）
2. 海關、郵局
3. 銀行：匯豐銀行、麥加利銀行等
4. 大洋行、大公司
5. 公用事業：上海自來水公司、上海電話公司
6. 娛樂場所：跑馬場、外灘公園、上海夜總會等
7. 教會：徐家匯教堂、董家渡教堂等
8. 學校：本校或其他教會學校
9. 碼頭、船塢

這份教案要求教師在課堂上重複利用 1949 年前的上海地圖，讓學生分組上台控訴帝國主義在他們訪問的單位中是如何進行：訪問沙遜洋行的學生們報告沙遜洋行老闆在過去的嘴臉、訪問上菸一廠的學生則控訴在五卅等運動時英美商人透過更換產品包裝逃避反帝抨擊。學生們對於參與控訴會非常熱衷，甚至下課後還有人抱怨他們沒機會上台控訴自己學校過去被教會控制的歷史。⁸⁴在校外訪問中，學生實際走訪上海舊城區中的各式「帝國主義」遺存，以特定的視角實際的行走於城市中，並按照設定好的劇本（如在教案中提到老師規定學生必須對以下某些類型的人物進行訪問、並且必須訪問特定的主題，而且教案中提到學生們最感到興趣的是在這次校外教學中，連銀行的經理都會帶他們去「一般人無法前往的房間」參觀過去的遺跡）考察城市中的特定角落，這類今昔對比或許看似平凡，但除了學生得到進入禁區的興奮外，輿論也認為讓學生「聽一聽過去怎麼生活的……收效很大」⁸⁵。Walter Benjamin 和 Michel de Certeau 將城市中「漫步」的定義透過隨意的移動打亂既有的城市布局，使人得以另外一種方式認識城市，但在這類教育旅行中，城市文本不但是在都市規劃中書寫好的，連觀看方式都是

⁸³ 上海市光明中學初一語文備課小組，〈到外灘上課去〉，《上海教育》第 20,21 卷（1958），頁 8-9

⁸⁴ 廖振鵬，〈一堂課內外活動相結合的歷史課〉，《歷史教學問題》第 3 卷（1959），頁 41-42

⁸⁵ 楊修，〈“滾地龍”〉，《文匯報》（1962/11/13）

教育部門規劃的。⁸⁶



第四節：小結

關於現代社會中，官方與專業人士透過有意無意的安排，提供遊客一雙「訓練有素」的眼睛，使其活動具有規範性，同時也讓其觀賞的場所愈見規制，John Urry 在其著作 *The Tourist Gaze: Leisure and Travel in Contemporary Societies*（中文譯本為：《觀光客的凝視》⁸⁷）中稱此類後台的專業規劃與前台的個人行動混雜的情況為「觀光客的凝視」（Tourist Gaze）。作者認為當代旅行中的凝視不同於一般意義的觀看，也非「驚鴻一瞥」的浮光掠影，在當代社會中，專業者有意無意的設定許多凝視對象（gaze）⁸⁸，而旅行經驗也從口耳相傳的異國經驗化為眼見為憑的風景，各類凝視的技術相繼成熟，「靜謐的山林」、「熱帶的自然」和其他各類歷史文物躍然紙上，也成為到此一遊的旅人相簿中必有的一景。專業者重塑各類景色的過程不見得是偽造，但在真實與過度真實（如迪士尼大街，其原先建築目的即是建立理想社區，以供出售，但由於法令與利潤限制，當迪士尼樂園開幕時，那些代表理想社區的小屋化身為理想生活的實境秀的櫥窗）⁸⁹間，專業者必須選擇符合參觀者期待的節目，而凝視即是這些旅人和專業者間持續不斷的互動。⁹⁰

本章認為，地方性教材與教學參訪活動即塑造了一種經專業者設計的空間知識，而帝國主義理論則勾勒了此一空間，該理論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的發展中有其特殊的地位，在列寧深入闡釋帝國主義後也得到相當大的發展，並在 20 世紀

⁸⁶ 關於旅行者的凝視，請參考：John Urry, *The Tourist Gaze* (Thousand Oaks: Sage, 2002), P. 145–150，而不經意地漫步在都市社會學的原始理論中認為具有突破城市既定規範的功能（例如行人能進入城市中許多交通工具難以深入的區域），班雅明也以「遊蕩者」（flâneur）一詞描繪現代消費社會中呈現漫無目的的這群人，在美國的案例中，Jane Jacobs 對紐約市的觀察也奠基於類似的方法，請參考：Michel de Certeau, “Walking in the City”,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pp. 91–110; Jane Jacobs, *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3), pp. 178–199

⁸⁷ John Urry, 《觀光客的凝視》，國立編譯館、葉浩譯（台北市：書林，2010，第 1 版）；John Urry, *The Tourist Gaze* (Thousand Oaks: Sage, 2002)

⁸⁸ 此為 Urry 創造的字，參見：John Urry, 《The Tourist Gaze》(Thousand Oaks: Sage, 2002), p. 144

⁸⁹ Sharon Zukin, *Landscapes of Power: From Detroit to Disney Worl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p. 225

⁹⁰ John Urry, *The Tourist Gaze* (Thousand Oaks: Sage, 2002), pp. 122 – 123, 144 – 150

的全球共產主義革命中激盪，毛澤東在抗戰結束前也以形象化的方式描述了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就是「兩座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大山」。⁹¹ 不過在本章所關注的案例中，我們可以注意到在 1950 年代上海市編的鄉土教材中，市教育局並不試圖給「帝國主義」一個清晰的解釋——1958 年恢復了政治課，但市編教材中並不包括政治課⁹²——例如雖然文本的脈絡中帝國主義不斷的和「外國侵略者」、「舊社會的腐敗」一併現身，但我們難以區分故事中「帝國主義者的買辦」和一般從事國際貿易的商人的有何區別。從理論的角度觀察，過多的文本陳述或許模糊帝國主義的意義，但這些詞藻提供的形象卻相當鮮明，對於讀者而言，故事透過起承轉合，將理論的形象以故事清晰的勾勒出來，反而更能打入一般人的閱讀環境。

Urry 也將教育性的出遊活動歸類為在現代社會中特殊的觀光凝視，在本章中，我們可以進一步的指出教育性的凝視與其他遊覽活動的不同之處——一般旅行者依據專業者或書籍的知識拍下「到此一遊」的畫面，但教育性的旅遊不但要求學生得「到此一遊」，教師們還依據教學理論設計了各式檢核活動，以此強化學生對空間的認知。⁹³ 我們可以此層次繼續了解上海的一般學生習得的「帝國主義」，在 1963 年編纂的上海市學生作文選中，一位初二的學生將上海市的歷史用簡單文字勾勒出來，雖然 1963 年時鄉土教材的教學情況可能不如大躍進時期熱烈，⁹⁴ 但該生行文的脈絡幾乎依循著上海市鄉土歷史教材對於近現代史人物的安排——先從鴉片戰爭時代的陳化成開始到五卅的工人運動結束。如此的情節設定將上海描寫為「萬惡的舊社會……染上了罪惡與汙穢。殖民主義者的獸蹄踐踏著

⁹¹ 毛澤東，〈愚公移山〉，《毛澤東選集》（北京市：人民出版社，1945，第 2 版），頁 1101-1104

⁹² 政治課在 1950 年前後曾在各中小學施行，但 50 年代中取消，直到 1958 年才又恢復教學，但在上海市教育局關於市編教材的指示中，各類編纂的教科書並不包括政治科，市編的歷史課本雖然「加強歷史的政治思想教育」，但在章節上結構上則是增加一些「歷史唯物主義教材」，例如〈基礎的上層建築〉、〈我國歷史發展的規律〉等等，請參見：上海市檔案館，〈A23-1-326〉（上海市：上海市委教育衛生辦公室，1961）；上海市檔案館，〈B105-7-620〉（上海市：上海市教育局，1959）；上海市檔案館，〈B105-7-351〉（上海市：上海市教育局，1958）；上海市檔案館，〈B105-2-177〉（上海市：上海市教育局教學研究室，1959）

⁹³ John Urry, *The Tourist Gaze* (Thousand Oaks: Sage, 2002), pp. 149 - 150

⁹⁴ 雖然 1962 年後相關的鄉土教材仍有再版的證據（見 表格 1 目前所見大躍進時期上海市各類鄉土教材出版情況），但根據上海市教育局的檔案顯示，在 1961 上海市教育局的檔案中顯示，教材本身不再出版，僅提供教師於銷售據點購買，甚至連更大範圍的市編教材實驗範圍也縮小許多，請參見：上海市檔案館，〈B105-2-449〉（上海市：上海市教育局，1961）；上海市檔案館，〈A23-1-326〉（上海市：上海市委教育衛生辦公室，1961）

你美麗的土地……美帝國主義的吉普卡，在馬路上橫衝直撞」。⁹⁵ 文章中的「帝國主義」、「殖民主義」與「舊社會」等詞似乎沒有區別，甚至在文末的批改語中也僅提及上述的情節安排符合以「光榮的歷史」、「悲慘的過去」直到「光輝的現在」的行文規則。或許我們難以了解該生使用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二詞時兩者是否明確可替換，但帝國主義總是具象的與外國事物連結，另外一篇文章則提及「沙遜大廈正是帝國主義剝削我們中國人民的罪惡象徵」⁹⁶，這類具象的「帝國主義」成為了學生書寫城市過去的手法。

過去對於鄉土歷史、民間故事的研究中，洪長泰認為中共繼承了一九二〇年代中國知識分子對於中國歷史重塑的招喚，毛時期多次發動群眾撰寫家史、村史、社史和廠史正是繼承了此一傳統。⁹⁷ 洪長泰等作者關注的往往是這些民間故事改寫者（或撰寫者）的心態，但我們或許進一步的觀察在這些地方歷史撰寫的過程中如何針對不同群體改寫、調整章節安排，本章認為，這樣的作法代表著地方政府對地方過去的想像，並以此支撐未來發展的願景。上海的故事讓我們可以看到市教育單位對於上海的過往歷史著重在鴉片戰爭之後的中外對壘，藉此描繪上海被迫加入帝國主義遊戲的面貌，而這樣的鄉土教材搭配「全國的故事」，則顯得上海在帝國主義下更加的無力（而不是侵略的中心），雖然在撰寫時難以迴避外灘的商店與生活，但卻無法讓我們讀到十里洋場的繁華與上海成為中國近代商業中心的過程，教學者也毫不避諱的表示這樣的教學與選材的目的不是讓學生學習「什麼五花八門的新知識」，而是「認識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對中國人民的殘暴統治」。⁹⁸

晚近西方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用於空間層次的闡揚中，總會能在不同的理論發現其透過論述與辯證的方式，創造了解讀空間的不同意義，並賦予地景不同於其在資本市場下交易的脈絡。⁹⁹ 但在本研究所關心的時代中，若我們將上海市

⁹⁵ 戴月琳，〈上海禮讚〉，《上海市初中學生作文選》，上海市中小學生作文評選選委會編（上海市：上海教育出版社，1963，第1版），頁54

⁹⁶ 孫璐如，〈我最喜愛的「六一」節〉，《上海市初中學生作文選》，上海市中小學作文評選選委會編（上海市：上海教育出版社，1963，第1版），頁62

⁹⁷ 洪長泰，《到民間去：1918-1937年的中國知識分子與民間文學運動》（上海市：上海文藝出版社，1993，第1版），頁296-299

⁹⁸ 白砥民，《歷史課中鄉土教材的教學》（上海市：上海教育出版社，1958，第1版），頁27-28

⁹⁹ 相關的作品本章中不一一引用，其中較富盛名者可參考：David Harvey，《新自由主義化的空間 邁向不均地理發展理論》，《空間與都市研究譯叢》（臺北市：群學，2008），頁65-144；David Harvey，《新帝國主義》，王志弘、王玥民、徐苔玲譯（台北市：群學出版社，

編教材視為地方政府對於區域過去發展脈絡的闡述，我們或許可以察覺到，雖然教材的論述屏除將上海的城市史視為資本或商業發展的歷史，但由於歷史書寫的過程中不能避免的情節安排，區域發展脈絡反而在中共「包下來」的政策下更顯得單一，並且與行政組織的科層化架構若合符節：市編鄉土歷史教材與地理教材重塑了區域的今昔，並試圖將區域的脈絡編織到上級政府準備好的全國性敘事中。

最後，大躍進期間的教育變化很少被關注，但這個時期的學生們透過教材、作文與「生產與教育結合」運動等活動，識讀被統括於「帝國主義」下的上海往事，在鄉土教材的課程中進一步發展為其凝視城市的方式。¹⁰⁰雖然我們無法衡量這些 60 年代初畢業的學生是否體現了教材的理念，於 60 年代晚期在外灘的匯豐銀行大樓裡打造去除帝國主義影響的上海，但直到今日我們仍可以看到一些人認為「歷史味兒」就得有封建社會、資本主義這些概念，或許本章能為提供一些解釋。¹⁰¹

2008)，頁 69–105；John Wylie，*Landscape*（New York：Routledge，2007，1 ed.），P. 55–93；Sharon Zukin，*Landscapes of Power：From Detroit to Disney World*（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pp. 255–297

¹⁰⁰ 大躍進期間的「教育革命」很少被教育史學者或進行當代中國研究的學者論及，筆者目前所見僅有一些相關研究，如：李慶剛，《「大躍進」時期「教育革命」研究》（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0，第 1 版）。

¹⁰¹ 葉綱，〈高考命題改革者〉，《南方周末》（2013/06/06），
<http://www.infzm.com/content/91228>（擷取日期：2013/06/07）

第二章：塑造「群眾」之城*



無論哪一個巍峨的古城樓，或一角傾頹的殿基的靈魂裡，無形中都在訴說，乃至於歌唱，時間上漫不可信的變遷；由溫雅的兒女佳話，到流血成渠的殺戮。¹⁰²

〈平郊建築雜錄〉

第一節：前言

建築承載著人們的歸屬感，不同建築、街道形成的地方則是人們在家與體制間的中介，在日漸城市化（urbanization）的現代世界，體制進行的區域規劃與民眾的日常活動則形構城市在不同人群的面貌。在某些非西方城市，由於城市發展集中於少數產業和地區，就業與服務無法滿足急速湧入的人口，過度城市化（over-urbanization）使得難以負擔城市服務的人群只能委身都會區邊緣缺乏規劃的低收入聚落（shanty town），本研究討論的上海將這類聚落被稱作「棚戶區」。作為基層勞動力棲身之所與城市的治安死角，西方福利國家與蘇聯式社會主義體系對棚戶區有著殊途同歸的處理方式：區域的產業與環境重劃。¹⁰³棚戶區不單是城市規劃的議題，其改造可以釋放原先處於一地的勞動力，並轉變產業型態，但在居無定所的棚戶區居民與一般勞工間，地方政府重塑地方與居民的形象也就值得關注。在諸多宣傳材料中，地方教育單位編纂的鄉土教材便提供了我們一個有系統的媒介，本研究試圖以大躍進時期上海市的鄉土教科書著手，討論在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下，如何敘述「資本主義」遺留的空間結構與其改造過程。

* 本章節曾以〈書寫社會主義城市：以大躍進（1958-1961）期間上海鄉土教材中棚戶區及其居民形象為例〉發表於2012年5月11日國立中央大學歷史所「傳承與創新——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研究生論文發表會」，並出版於國立中央大學《史匯》第16期，2012年12月31日

¹⁰² 梁思成、林徽因，〈平郊建築雜錄〉，《梁思成 林徽因講建築》（長沙：湖南大學出版社，2009），頁97-110

¹⁰³ 對於西方世界的貧民窟處理方案可以參考：Peter Hall，*Cities of Tomorrow: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Urban Planning and Desig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Oxford：Wiley-Blackwell，2002，3 ed.）；Robin Evans，“Rookeries and Model Dwellings”，*Translations from Drawing to Building*（Cambridge, Mass.：MIT Press，1997），pp. 93-118 Evans提到西方建築與規劃者在19世紀末以來對貧民窟的整治是源於一種對公共衛生與道德的自信；蘇聯式的處理則可參考Gyorgy Enyedi，“Urbanization Under Socialism”，*Cities After Socialism*，Gregory Andrusz, Michael Harloe, Lvan Szelenyi 編（Oxford：Blackwell，1996），pp. 100-119

上海的棚戶區與上海的工業發展息息相關，十九世紀上海開埠後，由於租界與西方建立的現代化的工商業形成的優越區位使上海吸收周邊人口移入，棚戶區即在這時期萌芽。隨著外省治安敗壞與農業災害日增，大片棚戶區湧入上海的勞工在港區與租界周邊蔓延。孟眉軍對解放前上海市棚戶區的研究指出棚戶區為二十世紀初上海新興工業提供充足的勞動力，在陳映芳近年來的口述工作中也展現了棚戶區居民離鄉背井的複雜因素，但上海市政當局對其的區域管理政策始終莫衷一是¹⁰⁴。一九三〇年代協助上海市政府調查的專家們甚至認為棚戶區是城市發展的必經階段——只要經濟持續發展，棚戶區居民會自行改善居住環境¹⁰⁵——但一九三〇年代後多次戰爭使得計畫落空。

到了一九五〇年代初期，棚戶區再造便與當時的政治運動有著密切關聯，上海市政當局藉由主動打擊流氓與地主取得棚戶的支持，也得以調度棚戶工人支援當時新興的工業區。校園外的城市變化看似與校園無涉，但大躍進運動中的鄉土教材與「教育與生產相結合」的教育革命則打開了學校的大門。¹⁰⁶在一些教案中，師生們參觀經整頓的棚戶區或在意識形態上截然不同的黃浦江畔租界區¹⁰⁷，經過不同地景的對比，提供學生未來社會的形象，並透過教材與教學使其參與其中。

大躍進時期也是一九四九年後中共首次下放教科書編審權的時期，各省市根據毛澤東於大躍進前指示編輯的鄉土教材則能讓我們看到地方當局對當地的想像並彰顯地方當局的區域計畫——由於對區域描述甚詳，甚至使 1960 年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中國地理課本取消了區域（分省）地理。¹⁰⁸以本文研究的上海為例，大躍進期間，當地的鄉土教材幾乎年年更新，因此可供我們觀察大躍進中話語使用與意識形態的變化。

¹⁰⁴ 關於民國時期棚戶區管理制度研究，可以參考：孟眉軍、林拓，〈上海市棚戶區空間變遷研究（1927 年—至今）〉，《城市與區域經濟系》（華東師範大學，2006），頁 15-17，而棚戶區的住戶的口述訪問也能反映一些民國時期棚戶區的生活情況：陳映芳，《棚戶區：記憶中的生活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¹⁰⁵ 罗苏文，〈高郎桥：1914-1949 年沪东一个棉纺织工人生活区的形成（下）〉，《社會科學》第 2006 卷，第 1 期（2006），頁 8-9

¹⁰⁶ 李慶剛，《「大躍進」時期「教育革命」研究》（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0，第 1 版），頁 108-204

¹⁰⁷ 謬振鵬，〈一堂課內外活動相結合的歷史課〉，《歷史教學問題》第 3 卷（1959），頁 41-42

¹⁰⁸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編，《中國教育年鑒：1949-1981》（北京市：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4），頁 505

在中共建政之後上海的區域規劃反映了華東區與全國經濟計劃的強烈主導地位，舊社會中無法得到工作與住房保障的棚戶成為成為新興工業可運用的人力，在區域論述上，破舊的棚戶轉變為整齊的工廠與公共住宅則更能彰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差異，也是上海工人「翻身」的過程。至於在寫給中學生的教材中如何鋪陳上海工人的轉變，本章將先介紹上海市政府對於棚戶區的處理方式，再討論教材如何闡述棚戶區中勞動人民的生活，以及在這一系列的空間重組走出棚戶區的勞動人民在社會主義下的新形象。此外，這些論述在大躍進不同的階段如何調整？本研究將在之後討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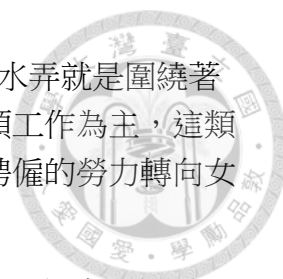
第二節：上海棚戶區的成因與中共建政後的改造

在討論棚戶區如何再現於大躍進中的文本之前，有必要針對大躍進之前上海棚戶區的發展進行了解。依照時代與處理政策的不同，大致上可依中共建政前後作分野，中共建政前的處理政策受到戰爭與租界、市政當局的政策影響，中共建政後的政策則受到中央計劃經濟與政治運動影響，本部分將根據調查報告、城市規劃資料集與前人研究討論此一變化過程。

上海的棚戶區的空間分布大致貼合舊上海的租界邊緣與海港發展，租界外經年的戰亂迫使鄰省居民遷入，無法負擔租界內住房的工人只能在委身河灘、濱海地區自行建築違建聚落（如圖 5 1949 年之前上海棚戶區的分布，今昔對照可參考圖 6 2000 年時上海棚戶區的分布）。¹⁰⁹

對於這些戶籍不明且從事低階工作的棚戶，上海租界當局的態度並不是相當友善。由於上海市本身由多個租界所組成，城市公共服務網路，如水電等系統整合問題使處於三不管地帶的棚戶能得到公共服務更加稀少。藥水弄（於今普陀區）甚至僅有兩支公共水龍頭，另外棚戶區建築破壞河灘地自然的排水功能，一經暴雨便可能使周邊工廠的污水灌入社區，惡劣的衛生環境造成孩童的高死亡率，其惡劣的環境在當代就被人視為上海發展的惡果，1949 年後更被建築學界稱

¹⁰⁹ 罗苏文，〈高郎桥：1914-1949 年沪东一个棉纺织工人生活区的形成（上）〉，《社會科學》第 2005 卷，第 12 期（2005），頁 5-7；罗苏文，〈高郎桥：1914-1949 年沪东一个棉纺织工人生活区的形成（下）〉，《社會科學》第 2006 卷，第 1 期（2006），頁 9-11



為「舊上海的地獄」。¹¹⁰棚戶大多從事租界區周邊的輕工業，藥水弄就是圍繞著江蘇藥水廠所興起的棚戶區，高郎橋棚戶區則以輕紡織業和碼頭工作為主，這類的輕工業所需技術不高，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租界的工廠逐漸將聘僱的勞力轉向女性與孩童使得當地婦女就業率遠高於全市。¹¹¹

1930年代，租界當局曾以集合住宅委員會（housing committee）處理棚戶問題，但該單位關切的是1930年代全球經濟不景氣與戰爭造成的上海房市萎縮問題。雖然針對棚戶區所代表的工人居住問題，該單位曾提出放寬工廠與既有房舍分租、擴建限制，希望讓工人能在「一圓（元）內往返住家與工作地」，但連年的戰爭使新建工房意願降低，而將既有單元分租後居住情況連租界的調查者都認為更糟。¹¹²隨著租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回收，上海市政府重新規劃平民住宅與棚戶限建政策以控制棚戶區的面積。但出租住宅速度與數量遠低於需求，難以改變棚戶區的居住形式，隨後的內戰也打亂了地方政府的建設步調。¹¹³

中共建政後的城市政策為「將消費的城市轉變為生產的城市」，毛澤東強調在接管上海的同時需維持城市原有人員的生計，公共服務網路覆蓋率提升與戰後復員也使上海的居住品質逐漸恢復。¹¹⁴第一次五年計劃中，蘇聯專家建議上海城市規劃須遵行兩個原則：一為在郊縣建立一系列以工業為主的衛星城鎮（如圖7 1959年上海市的區域規劃，因此1959年的上海市的行政範圍較十年前擴大了約十倍），二為擴大上海建成區的規模以提供足夠的居住品質。雖然規劃認為上海需加強建成區的建設，但計劃經濟將住宅視為非生產性營造，李富春於第一個五年計畫報告書中強調「非生產性營造不得超過預算的15%」，財政限制使住宅的建造總量還是追不上工廠招募的工人所需的住房量，也因此中共建政初期的上海市政府對棚戶區的改善多半僅在准許其自接水電（1949年後部分的棚戶區依然

¹¹⁰ 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城市經濟組，《上海棚戶區的變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第2版），頁33-34；上海市檔案館，〈C43-1-451-10〉（上海市：上海市經濟學會，1961）

¹¹¹ 羅蘇文，〈高郎橋：1914-1949年滬東一個棉紡織工人生活區的形（上）〉，《社會科學》第2005卷，第12期（2005），頁9

¹¹² 郭奇正，〈城市危機與國家干預－上海公共租界集合住宅委員會設立的社會意義初探〉，《都市與計劃》第37卷，第2期（2010），頁242,245-246

¹¹³ 孟眉軍、林拓，〈上海市棚戶區空間變遷研究（1927年—至今）〉，《城市與區域經濟系》（華東師範大學，2006）

¹¹⁴ 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毛澤東選集》，第4卷（北京市：人民出版社，1949），頁1424-1439；毛澤東，〈必須維持上海，統籌全局〉，《毛澤東文集》，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第5卷（北京市：人民出版社，1949），頁335-336

保持原貌，請參考：圖 8 1960 年的蕃瓜弄棚戶區)。 ¹¹⁵

建成區的棚戶區的特殊的歷史背景提供 1950 年代的「五反」運動與「鎮反」運動相當好的空間。¹¹⁶五反運動收編上海原先的私營企業，其效果使得這些企業在之後公私合營中「配合」轉變為國營企業，運動初期有效的提高員工薪資與聘用人數也讓原先就業環境惡劣的棚戶居民因此得到改善（蕃瓜弄棚戶區的居住情況，參見：圖 8 1960 年的蕃瓜弄棚戶區）。¹¹⁷鎮反運動則進一步使中共能掌握原先因國民黨清黨後與中共鮮有聯繫的上海底層工人，鎮反運動使得中共得以動員棚戶區居民指認「會道門」份子，清除棚戶區的「惡霸」。¹¹⁸環境改善一定程度上加強居民對新政權的信任，此過程中共也在棚戶區建立起基層政府組織動員居民，同時開始固定棚戶區常住人口。¹¹⁹另外一方面，社會主義完全就業的意識形態也改變棚戶區居民的生活，在 1962 年統計中，產業工人的比例由解放前的 37% 上升到 65%，上海市政府甚至藉由以工代賑的方式將棚戶區清潔工作包給當地的居民以達到完全就業的目標¹²⁰。與此同時，棚戶區新的居住環境改造也逐步展開。一方面上海市政當局准許棚戶接水接電，自建學校，另外一方面則將棚戶搬遷到新的公共住宅或城郊的新工業區中。¹²¹由於中共建政初期的公共住宅規劃原先接近英國的花園城市計畫（如曹楊新村，於今普陀區），其美觀的立面與街區規劃經常出現在各類宣傳品中，但由於之後一面倒的外交政策，花園城市被認為資產階級氣息太重，一五之後轉向了強調住宅的規劃與街道整齊間的關係

¹¹⁵ 林岳震、郭奇正，〈解放後至改革開放前上海城郊的社會主義營造過程〉（東海大學，2005），頁 67

¹¹⁶ 上海市檔案館，〈B1-2-490-1〉（上海市檔案館：中國人民救濟總會上海市分會，1952）

¹¹⁷ 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城市經濟組，〈上海棚戶區的變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第 2 版），頁 64-66；楊奎松，〈1952 年上海「五反」運動之經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史研究》，第 1 卷（南昌市：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第 1 版），頁 363

¹¹⁸ 楊奎松，〈上海鎮反運動的歷史考察〉，《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史研究》，第 1 卷（南昌市：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第 1 版），頁 251

¹¹⁹ 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城市經濟組，〈上海棚戶區的變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第 2 版），頁 57-59；文匯報，〈上海群眾文藝躍進再躍進〉，《文匯報》（1958/09/26）；文匯報，〈不毛之地變成了文化樂園〉，《文匯報》（1958/09/28） 棚戶區人口複雜，修繕對區縣一級的地方幹部來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因此在重建時地方政府也要求啟動人口調查，一面協助居民修復，一面排除流動人口，參見：上海市檔案館，〈A54-2-175-12〉（上海市：上海市徐匯區人民委員會，1957）

¹²⁰ 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城市經濟組，〈上海棚戶區的變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第 2 版），頁 64

¹²¹ 文匯報，〈兩個星期內成為「四無村」〉，《文匯報》（1958/01/07）

的蘇聯式的周邊式街坊，以此為社會主義建築風格，在衛星城鎮新建小區和棚戶區改造都普遍施用，直到改革開放初期。¹²²

1950年代的棚戶區整建方案延續當時的規劃風格，大致分為三類：自行改建、政府介入改建或就地重新規畫為工房。¹²³藥水弄這類人口密度不高的區域允許自行改建，後兩種模式便於成片改造進行區域經濟整合（如圖 9 上海棚戶區的空間改造圖），如肇家浜的林蔭大道為第一個五年計劃的重點工程，政府便在棚戶區補帖居民移置他地再行重建。¹²⁴如棚戶區靠近工廠，則參考蘇聯的城市規劃中住宅與工業區結合的原則，就地興建工房。由於大批的整建住宅消耗預算甚多，因此在日後討論中則會不斷在「改善市容」和「最經濟原則」中博弈。¹²⁵這樣的規劃也使改革開放前的棚戶整建的成效不佳，1952年時甚至讓「佔據街道、排水道」的棚戶就地合法，新興工業區的招工也使棚戶區往工業區延伸，甚至讓外國專家認為具有中國特色的「郊區化」。¹²⁶在上述過程中我們可以發現，棚戶區處置政策涉及中央計劃經濟下對工人的需求和地方政府對如何以公共建設安置城市人口居住的矛盾，但工人居住有的高品質住宅也是地方政府得極力宣傳的建設，在這樣的過程中，那些現實因素會被課本忽視，本章接下來討論上海市政當局如何藉由公共建設和大躍進在教科書中賦予「棚戶—工人」一個在社會主義建設下新生面貌，將他們納入上海的地景中。

¹²² 林岳震、郭奇正，〈解放後至改革開放前上海城郊的社會主義營造過程〉（東海大學，2005），頁 71–72；文匯報，〈上海建築學會連續召開座談會：討論有關建築風格苦幹問題〉，《文匯報》（1961/07/22）

¹²³ 上海市檔案館，〈B11-2-81-1〉（上海市：上海市城市建設局，1964）

¹²⁴ 國家城市建設總局城市規劃局城市規劃手冊編寫組，《城市規劃資料集》（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1982），頁 136

¹²⁵ 鄒瘦懿，〈上海桃源新村〉，《建築學報》第 1 卷（1964），頁 27–33；劉秀峰，〈創造中國的社會主義的建築新風格〉，《建築學報》第 9 卷–第 10 卷（1959），頁 3–12；鄧述平、李錚生、司馬銓，〈居民小區規劃用地的經濟性與合理性〉，《建築學報》第 7 卷（1964），頁 21–24

¹²⁶ 孟眉軍、林拓，〈上海市棚戶區空間變遷研究（1927 年—至今）〉，《城市與區域經濟系》（華東師範大學，2006），頁 32；David D Buck，“Policies Favoring the Growth of Smaller Urban Place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1979”，*Urban Development in Modern China*，Laurence J C Ma, Edward W Hanten ed.（Boulder, Colorado：Westview Press Inc.，1981，1 ed.），pp. 114–146

第三節：鄉土教材中公共建設的形象

鄉土教材的編輯指示始於 1957 年底，與同時期廣西、江西等地採取報紙徵文的方式不同，上海鄉土教材由教育局編輯，章節較有系統。¹²⁷雖然亦有嘉定縣自行出版的《嘉定地理鄉土教材參考材料》¹²⁸，但上海市通行的鄉土教材的前言都可見教育局全權編纂，編纂上已有地理科學科中心，可見上海教育單位對編纂工作的分工程度已較為細膩。¹²⁹

由於市政府教育單位的介入，因此鄉土教材對於棚戶區再造的基本原則和城市建設部門一樣，都認為這是「改善勞動人民的居住條件和城市面貌」¹³⁰，對城市建設部門而言，上海的棚戶區改造在大躍進期間為建國十年來群眾生活改善的樣板。¹³¹鄉土教材的編纂者得相當注意這類重要的在地建設，在講述上海不同區域的建設和生活情況的同時也須論述中共如何改善城市內的公共建設以提供勞動人民更好的生活環境，將一般的市政建設上升到工人階級發展的層次。1958 年版的《中等學校適用鄉土地理教材》便在第一章節開宗明義描述了上海解放後最大的意義在於保全了中國的國防，並在黨和人民的努力下，將帝國主義的口岸轉變為重要的工業基地。¹³²

1958 年的教材呼應當時大躍進運動中調動群眾積極性的主題，連自然資源在課本中都被視為保障人民群眾的生活所用，課本中特別指出上海沿岸的海塘是因為反動派政府不加維護，使勞動人民辛苦建設的海塘日漸殘破，並要求學生回家調查海塘工程以及「過去的」沿岸人民田產受澇情形。市區內河岸的整治則受到更大的重視，在描述了自然的河流分布後，課本轉而提及為了改善人民生活與市

¹²⁷ 雖然目前研究者仍然相當稀少，但關於中共建政後的鄉土教材研究可以參考中央民族大學滕星教授及其學生一系列的研究，如李素梅、滕星，〈中國鄉土教材的百年嬗變及其文化功能考察〉，《教育學院》（中央民族大學，2008）

¹²⁸ 作者不詳，《嘉定地理鄉土教材參考材料》（出版者不詳，1958）

¹²⁹ 上海市教育局，《中等學校適用 上海市鄉土地理教材》（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61），前言

¹³⁰ 作者不詳，〈以更大的成就來歡慶偉大的建國十周年〉，《建築學報》第 9 卷-第 10 卷（1959），頁 1-2；上海市教育局，《中等學校適用 上海市鄉土地理教材》（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61）

¹³¹ 劉秀峰，〈創造中國的社會主義的建築新風格〉，《建築學報》第 9 卷-第 10 卷（1959），頁 3-12

¹³² 劉秀峰，〈創造中國的社會主義的建築新風格〉，《建築學報》第 9 卷-第 10 卷（1959），頁 1-2

政需要，填沒肇嘉浜棚戶區所在的河灘地，並興建林蔭大道，但既然河流易於灌溉和排水，為何要填沒既有河道卻沒有多加解釋。¹³³相較之下，蘇州河畔藥水弄一帶的處理就被描述為單純的經濟問題：過去蘇州河因為帝國主義無限制的發展受到嚴重的污染，人民政府計畫興建污水管，並在 1958 年發動挖河泥運動疏濬河道，改善當地居民的生活，政治運動在自然環境便在課本中有了巧妙的結合。

事隔不過數月，大躍進氣氛更加渲染了 1959 年版的鄉土地理教材的人文地理的篇章，棚戶區的汗水與帝國主義侵略具體的結合，課本描繪了一個都市圖像：一邊是帝國主義侵略者與買辦居住的跑馬場和花園住宅，另一邊則是忍受工廠汗水和廢氣、無法接近城市核心的勞動人民，而以侵略者為名，但「為上海工人和學生的鮮血所染紅」的街道則穿梭其間。¹³⁴解放則改變了這類地景，上海由一個連基礎工業都缺乏的城市轉變為各式工業兼具的工業基地，與此同時，經過第一次五年計畫積累的資金讓政府有能力改善群眾生活，以往只能棲身於蘇州河上的船戶都能住上服務應有盡有工人新邨，課本還在作業中建議學生前往工人新邨實察，並在最後提到了上海市政建設的目標就是結合社會主義建立一個世界最先進、美麗的花園城市。¹³⁵

1960 版的鄉土地理教材比起之前的版本，更強調了人民公社化，先前的人民公社多半放在農業或郊縣的章節，這個版本則提及市區的人民公社正在籌備和上海青年支援外地建設的必要。在這個版本更加具體描繪勞動人民的建設，並指出解放前的勞動人民由於帝國主義造成的畸形發展，只能在勞動條件很差的工廠中工作，直到解放後上海的工業才能全面並走向精密產業。這個版本特別強調了上海的建設是全國建設的一部分，由於共產黨的領導推動建設，上海的勞動人民才成為城市的主人。¹³⁶

¹³³ 劉秀峰，〈創造中國的社會主義的建築新風格〉，《建築學報》第 9 卷-第 10 卷（1959），頁 1-2

¹³⁴ 上海市教育局，《中等學校適用 上海市鄉土地理教材》，《第二分冊》（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59），頁 2-5

¹³⁵ 上海市教育局，《中等學校適用 上海市鄉土地理教材》，《第二分冊》（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59），頁 43。如第一部分所言，花園城市一詞由於出於英國的規劃模式，原始的規劃想法多採取郊區獨棟的建築提供小家庭使用，但獨棟低層建築被認為是不經濟並帶有資本主義氣息，在這一版本的教材中尚未對這個詞彙加以詮釋，到了 1961 年版中特別強調此處的「美麗」系指園林化的意思。上海市教育局，《中等學校適用 上海市鄉土地理教材》（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61），頁 55

¹³⁶ 上海市教育局，《中等學校適用 上海市鄉土地理教材》，《第二分冊》（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60），頁 17

1961 年的鄉土教材對於前述的幾項公共建設和住宅改善議題有了清晰的描述。海塘和河道疏濬的建設明確的與「黨動員廣大群眾」結合（不再是過去「政府進行建設」的口吻），並且搭配大躍進的意象，先前動員群眾修築的海堤也成了「鋼鐵的手臂」¹³⁷。住宅方面則將曹楊等新村與近郊工業區做了結合，作為城市住宅改善的樣板，1959 年才動土的「閔行一號街」工人住宅與商店街甚至成為課本封面（如 圖 10 1962 年上海市高級小學適用地理課本）。¹³⁸

到了大躍進結束的 1962 年，教材中的用語出現了比較大的轉折，「公社」二字從課本中消失，經濟地理的部分還補上中共中央針對大躍進錯誤糾正的字句。不過在市政建設的部分，除了又納入新完工的張廟一條街（於寶山區）之外，在要求讀者憶苦思甜後，大躍進口號還是繞回了課本。¹³⁹

大躍進期間許多教材都特別將舊上海與當下上海的公共建設做比較，其中跑馬廳改建的人民公園特別容易與肇嘉浜棚戶區填沒後的林蔭大道做類比，跑馬廳改蓋建被認為是上海人民揚棄了資本主義紙醉金迷的生活，將帝國主義的空間還給勞動人民並「提供重要的集會使用」，肇嘉浜的改建則是人民群眾在黨的發動下填平四郊，修築林蔭大道以提升環境衛生的結果（如 圖 12 肇嘉濱的轉變）。¹⁴⁰黃浦江畔的建設也具有類似的意義，1961 年的中學教材一改過去只提及黃浦江的航運功能，將黃浦江畔放入封面（如 圖 11 1961 年中等學校適用上海市鄉土地理教材）外，還補充說明黃浦江見證帝國主義的侵略，「今天……建立了一條綠化地帶，供勞動人民散步休息」¹⁴¹。除了課本上的描述之外，教案中則提供老師要求學生前往人民公園和外灘地公安局的鄉土教學課程，教案作者認為這樣的授課方式符合高爾基的說法：「一切都要從比較中去了解」¹⁴²，今昔對比、憶苦

¹³⁷ 上海市教育局，《中等學校適用 上海市鄉土地理教材》（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61），頁 6

¹³⁸ 上海市教育局，《中等學校適用 上海市鄉土地理教材》（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61），封面

¹³⁹ 上海市教育局，《高級小學適用 上海市鄉土地理教材》（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62），頁 5,11

¹⁴⁰ 上海市教育局，《高級小學適用 上海市鄉土地理教材》（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61），頁 11；上海市教育局，《中等學校適用 上海市鄉土地理教材》（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61），頁 48-51

¹⁴¹ 上海市教育局，《中等學校適用 上海市鄉土地理教材》（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61），頁 16

¹⁴² 謬振鵬，〈一堂課內外活動相結合的歷史課〉，《歷史教學問題》第 3 卷（1959），頁 41-42

思甜似乎成為中等教育以下對公共建設的評價方式。

此外，我們也可以注意到，每當課本習題要處理一些負面議題時，「舊上海」便成了最佳的提問對象，不論是讓學生考察原先的居住環境或工作環境，「現在的上海」則是提供學生參觀市政工程的空間，以便讓學生藉由討論會的形式認識「未來的上海」。我們可以發現越到大躍進的高峰期，「黨與群眾」的角色就越加明顯，中學以上的鄉土教材或許還會有一些知識性的內容，高小使用的鄉土教材幾乎只剩下最精華的「政府發動群眾進行建設」之類的描述，並展示最新的硬體建設。但作為地理科，不同區域的處理方式為何不同，課本卻懸而不談。由於這些建設在課本中多半被描述為改善群眾生活，接下來將討論課本是如何書寫這些被公共建設拉出棚戶區的「群眾」。

第四節：勞動人民：鄉土教材中群眾的形象

棚戶區的勞動人民在社會調查報告或文學作品中深具情節的「翻身」故事，除了區域的改造，對於工人的形象塑造相當重要，雖然地理課本對於個別的人物並沒有特別注意，不過對於底層群眾如何在解放後走出陰暗骯髒的區域卻有許多著墨，課本花了許多篇幅書寫針對上海群眾的先進生產力為帝國主義禁錮於棚戶中，直到解放後發揮生產力成為工人，甚至還有作業配合這類敘事。¹⁴³在教學紀錄中也有許多頌揚棚戶區的工人為生產效力的故事，《上海教育》刊載一篇小學生作文中提到「工人叔叔造大房子，我們造小房子，長大了要造更多大房子」¹⁴⁴，棚戶區可以展示上海工人群眾生活翻轉的「實況」，透過訪問棚戶區，不但可以帶給學生許多「新玩意」，居民與居委會幹部的憶苦思甜還可以讓參訪者「陪著落淚」¹⁴⁵，感受到區域是「有前途的」¹⁴⁶，接下來的本章將梳理此一過

¹⁴³ 上海市教育局，《中等學校適用 上海市鄉土地理教材》（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61），頁 55 - 56 在討論上海未來發展的章節中，課本附上了一段廠史調查作業，要求學生參觀工業區，了解廠史，並認識工人在解放後的生活

¹⁴⁴ 戴輝，〈金色的童年，幸福的十歲〉，《上海教育》第 12 卷（1959），頁 17

¹⁴⁵ 文匯報，〈以階級教育與革命傳統教育為紅線，組織少年兒童訪問調查工廠、里弄〉，《文匯報》（1963/11/28）

¹⁴⁶ 烏克蘭參訪團訪滬時，上海市教育局接待其參訪蕃瓜弄和曹陽新村，烏克蘭參訪團對於勞動群眾生活在這兩個區域的改善表示其透過「本質」了解到蕃瓜弄雖然殘破，但卻是具有前途的，參見：上海市檔案館，〈B105-7-1145-11〉（上海市：上海市教育局接待辦公室，1961）

程。¹⁴⁷

稍早於市編教材正式印行，區縣的教育單位將自己的區域與更大範圍的建設結合，川沙的教育單位告訴學生「農民伯伯在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領導下」改造了沙地，「富民沙」改造完成也顯示在共產黨帶領下的新社會更加富饒，脫離地主殘暴的統治。¹⁴⁸

1958 年的市編教材印行後，透過新舊對比展現當下計畫的正確性更加顯著，課本強調上海人民在帝國主義時期深受外國資本家蹂躪，但「上海人民是不可征服的」，雖然工廠中的生活條件惡劣，上海人民仍不斷的在黨的帶領下自覺的進行革命，以至於解放後在工人自己帶領下，連工作間的氣溫控制都是與四季溫度變化結合。¹⁴⁹大躍進中軍事化動員的過程躍然紙上，工人以軍事化的方式出現，他們「支援解放台灣，阻止抗帝國主義侵略……組織突擊隊，要到哪裡，便到哪裡」。同時，課本描述上海的學生們「在勞動中鍛鍊自己」，各級學校紛紛展開勤工儉學運動，同時更多的學生紛紛前往各地，到農村安家落戶。¹⁵⁰在大躍進中，這樣描述看似平常，但當我們考慮大躍進期間為解決上海城市人口糧食配給與住房問題時，官方的一項政策就是讓青年與工人到外省市支援，如此，使學生願意前往全國各地支援便顯得有其特別的意義，尤其其中對學生畢業後就業的描述或許更能加強學生的親切感。

1959 年的教材中則關注大躍進後勞動人民的積極性，並表現出上海在工業發展上的優越地位，其中提到上海超額完成第一個五年計畫配額，工人們為「躍進再躍進……忘我的勞動著」（如 圖 13 上海工人辛勤工作的形象）。由於上海周邊的重工業多半是在大躍進前才逐步擴大規模的，但為了將工人揉入上海的地方感中，作業要求學生訪談工人以了解「革命鬥爭的歷史與技術革新的情況」。這個版本的配合 1958 年 2 月上海交大和康生等人倡議的「學校就是工廠，學生就是工人」¹⁵¹口號，提出上海工人素質的提升可以將上海轉變為一個「為全國人民

¹⁴⁷ 張家駿、陳家熾，〈群策群力〉，《文匯報》（1959/08/25）；陳煒、蔣子誠，〈如何在校外活動中向少年兒童進行階級教育〉，《文匯報》（1963/08/17）

¹⁴⁸ 喬永潔，〈運用鄉土教材教育學生〉，《文匯報》（1957/12/06）

¹⁴⁹ 上海市教育局，《高級小學適用 上海市鄉土地理教材》（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58），頁 5；上海市教育局，《中等學校適用 上海市鄉土地理教材》，《第一分冊》（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58），頁 24

¹⁵⁰ 上海市教育局，《高級小學適用 上海市鄉土地理教材》（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58），頁 7-11

¹⁵¹ 熊月之、周武、爾冬強，《上海 一座現代化都市的編年史》（上海：上海書店，2009），頁 536

服務的工業大城市」，因此針對文盲、勞動者的「文化革命」便以業餘教育的形式讓不識字的工人能提升生產水準。學生也得參與生產革命則可以學到「書本上學不到的實際知識」，這給學生一種「人人勞動，人人學習」的勞動者形象。¹⁵²

1960年的教材則對工人的技術優越性做具體的描述，並將其與大躍進要求的「多、快、好、省」結合，教材指出上海的是全中國工人隊伍最整齊的地區，上海的老工人具有長期的鬥爭經驗與技術能力，只是在解放前他們只能窩居棚戶中，呼應1958年12月到1959年5月間，上海市勞動局嚴格篩選兩千多名技術優秀工人支援北方省分建設的「支內」熱潮，教材中將上海優秀的工人描述成在大躍進中的「先行官」，不但將輸出工業產品支援鄰省，甚至可以遠赴外省協助建立新工業基地同時節省工業原料運輸到上海加工的成本。¹⁵³

雖然民國時期的上海市眾所皆知的商業城市，工業在相較之下並不是特別突出，但為了強化上海的勞動人民形象，各版本的課本偶爾都會提及如城隍廟（小刀會起義場所）等古蹟保存的意義：象徵上海人民在帝國主義下不如草芥的地位與起義。¹⁵⁴這類古蹟多半代表著人民起義暫時的挫敗，例如對抗帝國主義者以衛生為由拆除四明公所的抗爭中，上海碼頭工人雖發起罷工，但人民在缺乏領導的情況下最終還是失敗。¹⁵⁵透過古蹟保存論述，教材中塑造的空間賦予人民群眾的新意義。

我們可以發現這段時期教科書中勞動人民的形象看似鮮明，但卻又缺乏個體的面貌。在課本中，具有高度創造力的勞動人民因帝國主義淪入棚戶區，但上海工人掌握的技術是全中國最先進的，具有支援各地建設的能力。但其實這樣的形象塑造便如同洪長泰討論人民英雄紀念碑上的人民形象一樣的模糊——不一定每一個學生的家庭都原先住在棚戶區，在中共完全就業的經濟政策下，卻人人都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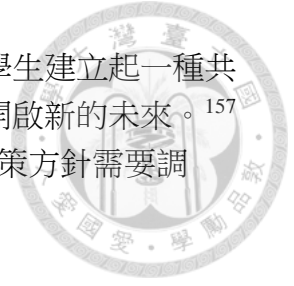
¹⁵² 上海市教育局，《高級中學適用 上海市鄉土地理教材》（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59）；上海市教育局，《中等學校適用 上海市鄉土地理教材》，《第二分冊》（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59），頁 39-42

¹⁵³ 上海市教育局，《初級中學適用 上海市鄉土地理教材》（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60），頁 26-40；丁云亮，《階級話語的敘述與表象：1950年代上海工人之文化經驗》，《博士文叢》，第5卷（合肥市：安徽人民出版社，2009），頁 299-300

¹⁵⁴ 上海市教育局，《高級中學中國歷史第三冊鄉土教材》（上海市：上海教育出版社，1958，第1版），頁 6-8；上海市教育局，《高級小學適用 上海市鄉土地理教材》（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58），頁 24-25；

¹⁵⁵ 上海市教育局，《高級中學中國歷史第三冊鄉土教材》（上海市：上海教育出版社，1958，第1版），頁 14

是某一種型態的工人——上海在計畫經濟下的「職員化」¹⁵⁶為學生建立起一種共同的想像：勞動人民的過去相當不堪，學生參與勞動教育則能開啟新的未來。¹⁵⁷直到 1962 年大躍進結束後的教科書對此描述僅提及大躍進的政策方針需要調整，上海的工人仍然得為提升市民的生活而努力。¹⁵⁸



第五節：小結

本研究試圖以棚戶區為中心，考察大躍進時期上海的鄉土教材如何書寫大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強烈介入下的上海。在棚戶區生活的人們雖然只是中共建政初期上海市數百萬人口中的一部分，但由於其特殊的歷史成因與解放後的政治發展，在教材中棚戶區便成為整個勞動人民棲身的場所的代表，並隨著大躍進將勞動人民的形象推上高峰。棚戶區的整頓方式與上海週邊工業區的發展、新住房的規劃成為大躍進改善人們生活的樣本。¹⁵⁹

我們可以透過許多不同的材料探討棚戶區與勞動人民在中共建政後的形象，但筆者認為通過教育系統層層審編的鄉土教材比起其他宣傳材料更能反映中共要如何將大躍進改善勞動人民生活的形象放入學生最親近的生活經驗中。在課程研究的框架中，或許我們可以認為教材這類如教育學者 John I. Goodlad 所定義的正式課程（formal curriculum，如教材）或運作課程（operational curriculum，如教案），總是與學生最終學習的經驗課程（experiential curriculum），由於教學與學生自身的學習興趣，往往相去甚遠。但若以社會史的角度來看，利用地方教育單位編纂的教材與教師的教案卻可以反映地方政府要傳遞區域規劃與區域願景。在這次的研究中，由於學生恰好是階級屬性並不明確的一群人，但同時象徵社會主義的未來，因此不同於《建築學報》等具有高度針對性的刊物，在傳遞區域願景上，鄉土教材不會集中在針對某一群人指導「該怎麼做」，而傾向於呈現不同的

¹⁵⁶ 許紀霖、羅崗，《城市的記憶：上海文化的多元歷史傳統》（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1），頁 216-225

¹⁵⁷ 洪長泰，《新文化史與中國政治》（臺北市：一方出版，2003，第 1 版）；洪長泰，《地標：北京的空間政治》（香港：牛津大學，2012，第 1 版）

¹⁵⁸ 上海市教育局，《高級小學適用 上海市鄉土地理教材》（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62），頁 7

¹⁵⁹ 例如在蕃瓜弄的整建中就非常強調棚戶區的改建乃先以居委會協調居民，而不是普通的拆遷，這樣讓勞動人民對自己的認知有很大的幫助，也是棚戶區改建與其他區域不同之處。再處理長寧區周家喬的李縱涇浜地區侵占綠化後的原棚戶區也是採取群眾運動的方式處理，參見：上海市檔案館，〈B11-2-36-1〉（上海市：上海市閘北區人民委員會，1963）；上海市檔案館，〈B11-2-106-32〉（上海市：上海市城市建設局，1965）

人們「已經做了什麼」，並透過教育者循循善誘的口吻，讓學生在比較中看到未來上海的想像。

我們還可以注意到教材中如何將中央的經濟計劃寫進上海的地方感，一般可能認為地理教材由於牽涉自然地理，意識形態能介入的成分較少，但 John Rodden 針對東德教材的研究指出，由於教育體制與教材編纂採取中央集權，因此不只人文地理或經濟地理可以和計畫經濟結合，編寫自然地理時也必須強調計劃經濟「自然」的，因此教科書便不能單純描述銅礦的分布和化學性質，還得強調銅礦在計劃經濟上的優越性。¹⁶⁰John Rodden 所提出的觀察也可以在大躍進時期上海地區的鄉土教材發現，首先，不同時期的鄉土教材都強調上海優越的工業發展和產業工人隊伍只是中央計劃經濟中的一顆棋子¹⁶¹，在呼應中央要將上海建設為工業城市的規劃的同時，鄉土教材便強調這些建設對於如何改善上海的環境，並將上海市民都抹上勞動人民的色彩。¹⁶²如此一來，不論是被認為有助於鋼鐵元帥升帳的沼鐵礦還是河道分布、氣候分布都在課本中與勞動人民有密切關係。¹⁶³

由於其人口組成與各級政府的區域規劃，棚戶區的書寫再現了中共建政後各類政治運動與經濟計劃，我們可以在棚戶區的改造中看到地方政府對城市空間的重劃，也可以看到地方政府如何將區域更新與中央計畫經濟結合，在大躍進尾聲展開的「四史」（村史、社史、廠史、家史）編輯運動中都不斷地讓工人回憶棚戶區的光榮傳統。¹⁶⁴透過觀察鄉土教材對城市中特定區域和人群的書寫，讓我們可以看到上述的連接過程如何刻劃一個新的社會主義上海。

¹⁶⁰ John Rodden, *Textbook Reds: Schoolbooks, Ideology, and Eastern German Identity* (University Park, P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 Press, 2006), pp. 76,84–87

¹⁶¹ 上海市教育局，《初級中學適用 上海市鄉土地理教材》（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60），頁 54

¹⁶² 上海市教育局，《中等學校適用 上海市鄉土地理教材》（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61），頁 46

¹⁶³ 上海市教育局，《中等學校適用 上海市鄉土地理教材》，《第一分冊》（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58），頁 5

¹⁶⁴ 王智慧，〈以真人真事編繪廠史工人家史，為階級教育活動增添形象教材〉，《文匯報》（1963/12/03）

第三章：學習「勞動」*



「普遍禁止童工是和大工業的發展不相容的……可能是反動的……生產勞動和教育的早期結合是改造現代社會的最強有力的手段之一」¹⁶⁵

《哥達綱領批判》

「除了「理論家」與「知識分子」兩個糊塗的觀念而外，還有煙天念的一句「理論與實際聯繫」……從中國的歷史實際與革命實際的認真研究中創造出理論來，才叫做理論與實際相聯繫」¹⁶⁶

《整頓黨的作風》

第一節：序言

在追求社會前進的理念下，藉由改變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以改造社會的為多數社會主義組織共同的方向，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和《資本論》等書中提出的按勞分配和公有制的原則提供實存的社會主義政權藉計畫經濟調節社會總生產的意識形態基礎，而勞動也成為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下每個公民的權利與義務。¹⁶⁷在此脈絡下，調節和培訓未來生產力的教育部門也成為政府計畫的一環，畢業後職業分配成為實存的社會主義國家中教育的顯著特色。1958年開展的大躍進運動讓教育與生產勞動的關係更往前了一步——在中共的政治命令下，教育不僅是勞動力的再生產，同時也成為生產的一部分。

除了理論意義，實存的社會主義政權以生產勞動為名改變了社會結構，按勞

* 本章節修改後發表於2013年10月13日由政治大學與山東大學合辦，第14屆兩岸四地歷史學研究生論文發表會，並獲得華東師範大學《熱風學術》第八輯邀稿，在此致謝

¹⁶⁵ 以下兩段引文除收於該原始出處外，1958年時也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另編成了縮節本提供外界作為理論基礎，因此以下引文會同時引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的《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論教育與生產相結合》一書。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第3卷（北京市：人民出版社，1975，第1版），頁24；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列寧主義教研室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論教育與生產相結合》（北京市：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58，第1版）

¹⁶⁶ 毛澤東，〈整頓黨的作風〉，《毛澤東選集》，第3卷（北京市：人民出版社，1942，第1版），P.819

¹⁶⁷ 許滌新編，《政治經濟學辭典（上）》（北京市：人民出版社，1984，第1版），頁106

分配成為新的經濟組織輸送資源的原則，新社會的城市常民則透過居委會、工會與各級黨組織等政治、經濟力量將各色人群納入「生產建設」計畫中，生產單位與圍繞其周圍的居民小區成為 1949 年之後中國社會最顯著的特徵。¹⁶⁸上海作為計畫經濟時期的主要工業中心，1949 年之後中共尤重於重塑其特性，1949 年之前上海作為中國外商匯集的商業口岸，工業產值並不顯著，但在 1949 年之後的計畫經濟下，工業產值大幅超越商業（參見 圖表 1 1949-1978 間上海市三級產業占 GDP 比重）。工人群體隨著計畫經濟下大型的煉鋼廠、化工基地及其周邊的工人小區逐步覆蓋了城市原有的肌理。為了強化工人意識，擴大和鞏固群眾參與生產勞動，中共在工人間進行大量政治宣傳，過去的研究曾關注中共在 1949 年後上海工人群體中的教育、宣傳活動，認為在車間的讀報組，工廠的大字報、訴苦會和識字班對於鞏固生產勞動有所助益。¹⁶⁹上海的教育系統也在工人階級的文化培訓中扮演了吃重的角色，到了 1958 年中共中央發動大躍進時，教育與生產勞動的關係進一步發展，普通教育也納入了生產勞動中，且此時主客易位，劉少奇在 1958 年 9 月 30 日提出「辦一個工廠就是辦一個學校」後，康生進一步在 1958 年 10 月 12 日喊出「學校是整個勞動大軍的一個組成部分……現在鋼鐵潮流下，也可以只勞動，不讀書」。¹⁷⁰

現代教育理論中偶有討論教育與勞動的關係，杜威認為現代教育的目的在於調和勞動與休閒（勞心者）的差異，人們也一向對於歐美學生就學期間持續打工給予正面評價。¹⁷¹現代中國教育史上也曾在北洋政府時期開始施行將生產性知識

¹⁶⁸ 丁云亮，《階級話語的敘述與表象：1950 年代上海工人之文化經驗》，《博士文叢》，第 5 卷（合肥市：安徽人民出版社，2009），頁 296

¹⁶⁹ 請參見丁雲亮一書第二章的部份；丁云亮，《階級話語的敘述與表象：1950 年代上海工人之文化經驗》，第 5 卷（合肥市：安徽人民出版社，2009）

¹⁷⁰ 大躍進期間學生前往工廠蒐集和學習工人文藝：文匯報，〈上海群眾文藝躍進再躍進〉，《文匯報》（1958/09/26） 劉少奇：上海市檔案館，〈B105-2-3-7〉（上海市：上海市教育局，1958），康生：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大事記 1949-1982》（北京市：教育科學出版社，1983，第 1 版），頁 225

¹⁷¹ John Dewey，《民主與教育》（台北市：網路與書，2006，第 1 版）；文匯報，〈勤工儉學有什麼好處〉，《文匯報》（1958/02/16）也有一些人認為赫魯曉夫在 1955 年便提出將蘇聯的教育與生產勞動做更緊密結合，以配合戰後復員的教育方針，並在 1958 年 12 月 24 日由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通過〈關於加強學校同生活的聯繫和進一步發展全國國民教育的法律〉確立此一原則，但成效不彰，且中共的教育與生產勞動結合遠遠早於蘇聯，因此兩者應沒有繼承關係，參見：史曉明，〈二十世紀中期“兩種教育制度，兩種勞動制度”探析〉（河南師範大學，2011），頁 13-14；姚士良，〈蘇聯同行來信祝賀〉，《文匯報》（1958/11/10）

與傳遞給學生的常識課程。¹⁷²相較於之前本章提及社會主義者（不論是馬克思、蘇共或中共），民國時期的勞動課程的法律基礎則是 1943 年的《義務勞動法》，地方政府也藉此法討論讓民眾義務參與郊區建設，學校的義務勞動則披上一層「雙手萬能」的德育的外衣，其次才是日後服務國家經濟。¹⁷³這些看法與中共大相逕庭，延安時期的教育改革方針即提到邊區教育的目的在於傳授「實際需要的知識」¹⁷⁴，而時任延安自然科學院長徐特立曾提過：「把生產當作教育的手段」¹⁷⁵，「讓群眾發揮無窮的創造性」¹⁷⁶，並以此區分純粹的工廠學徒制與「教育結合實際」的差異¹⁷⁷；陶行知的學生，曾任八路軍抗屬子弟學校書記的程今吾認為教育學的前提是「生產勞動」¹⁷⁸，他發展了「在真實的生產勞動和社會運動中的實踐」¹⁷⁹的實踐教育法以擴充陶行知的理論，並將該教法也用於該校。¹⁸⁰延安經驗提供我們認識大躍進期間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運動的線索，無獨有偶，1958 年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長的陸定一指出：教育與生產勞動的結合是要改變不

¹⁷² 1936 與 1941 年兩個常識教學大綱的教學要點都指出該科設置目的在於讓學生認識到生產性的知識 課程教材研究所編，《20 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自然 社会 常识 卫生卷》（北京市：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第 1 版），頁 192,206

¹⁷³ 上海市檔案館，〈Q248-1-344〉（上海市：私立上海法政學院，1945）；上海市檔案館，〈Q109-1-328〉（上海市：上海市參議會，1946）；中央訓練團義務勞動高級人員訓練班編，《蔣主席義務勞動言論集》（出版地不詳：中央訓練團義務勞動高級人員訓練班，1946，第 1 版），頁 9-10；王治範、黃質夫，《中等學校勞動生產訓練》（上海市：正中書局，1946，第 1 版），頁 2,3,7,41 Robert Culp 曾討論過民國時期新式教育組織的規訓意義，參見：Robert Joseph Culp，《Articulating Citizenship: Civic Education and Student Politics in Southeastern China, 1912-1940》，《Harvard East Asian Monographs.》（Cambridge, MA：Distribut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7），頁 165-208

¹⁷⁴ 解放日報，〈根據地普通教育的改革問題〉，《中國教育大系》，顧明遠編，第 3 卷（武漢市：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第 1 版），頁 1977

¹⁷⁵ 徐特立，〈對於邊區兒童的我見〉，《徐特立教育文集》，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編（北京市：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第 1 版），頁 87

¹⁷⁶ 徐特立，〈關於教育與生產結合的幾個問題〉，《中國教育大系》，顧明遠編，第 2 卷（武漢市：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第 1 版），頁 1131

¹⁷⁷ 徐特立，〈對牛頓應有的認識〉，《徐特立教育文集》，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編（北京市：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第 1 版），頁 122

¹⁷⁸ 程今吾，《新教育體系》（上海市：上海書店，1948，第 1 版），頁 5

¹⁷⁹ 程今吾，《新教育體系》（上海市：上海書店，1948，第 1 版），頁 103

¹⁸⁰ 程今吾，《延安一學校》（上海市：新華書店華東總分店，1950，第 2 版），頁 14-21

將勞動是為階級鬥爭與生產鬥爭的實踐並造成學生鄙視體力勞動的教育思想。¹⁸¹就實際層面，大躍進時期的教育政策如此在乎生產的原因與 1954 年劉少奇提出的雛型有許多相似之處：學校數目無法滿足高小和初中畢業生升學，待學（上海市的情況，參見表格 5 1958-1962 間上海市高小與初中升學率）與畢業生專業與工作不對口造成計劃經濟的人力浪費，中共便要求各級學校積極宣傳，讓學生畢業後直接參與勞動。¹⁸²然而高小和初中教育的升學取向很明顯，連該文件亦不能避免指稱順利升學者較為優秀，為進一步使教師在課堂上正確的傳遞政策，加強對教師的領導至為重要，陸定一抽象的解釋這一點：教育學是社會科學，一切社會科學都要跟著政治走。於是，生產勞動不再是學生畢業後才會面對的抉擇，而是政府整頓教育體系的切入點。¹⁸³

在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運動下，學校被重新定位，生產勞動納入正式課程，此時的生產勞動不再只是服務性課程，而是明確的規定要和周邊的工廠、農場、公社協作（或者是由生產單位辦學校），其產值與產品也須納入地方政府的生產與銷售計劃中。¹⁸⁴上海市的政策規劃進一步強調教育場所中的生產勞動與這段時間內上海的作為「工業城市」¹⁸⁵的經濟改組需要相結合，教育局提出學校能生產的項目後，計劃委員會和相關單位將進行評估，並提供學校技術指導，有必要的話也對學校貸款以設置可配合產量的工廠（多數學校原先並沒有實習工

¹⁸¹ 上海市檔案館，〈B105-2-3-3〉（上海市：上海市教育局，1958）

¹⁸²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中共中央轉發中央教育部黨組《關於解決高小和初中畢業生學習與從事生產勞動問題的請示報告》的批語〉，《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 5 卷（北京市：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頁 249-250；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論新中國經濟建設》（北京市：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第 1 版），頁 362 在 1961 年上海市委針對大躍進三年期間教育發展的檢討報告中也提到了各類生產勞動對於吸收這些無法升學的學生的幫助，參見：上海市檔案館，〈A23-1-326-1〉（上海市：上海市委衛生教育部，1961）同時嘉定縣教育局也在處理超齡就學的學生，參見上海市檔案館，〈A23-2-1536-18〉（上海市：嘉定縣教育局，1959）現代學者也是持類似的看法，參見張禮永、郭軍，《共和國教育 60 年》，杜成憲編，第 1 卷（廣州市：廣東教育出版社，2009，第 1 版），頁 136

¹⁸³ 上海市檔案館，〈B105-2-3-3〉（上海市：上海市教育局，1958）

¹⁸⁴ 上海市檔案館，〈B105-2-3-17〉（上海市：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1958）；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大事記 1949-1982》（北京市：教育科學出版社，1983，第 1 版），頁 231

¹⁸⁵ 上海市檔案館，〈B105-1-1745-8〉（上海市：上海市教育局，1957）上海市教育局覺得中共中央在反右運動期間提出學生下鄉勞動僅限農業生產太過狹隘，進一步提出要配合上海市的「工業城市」背景，中央的指示參見：上海市檔案館，〈B105-1-1745-4〉（上海市：國務院，1957）

廠，有的也不見得能滿足實際生產下的耗損），同時也要求工廠需貼補學生的勞動收入。¹⁸⁶另外，針對學校的區位條件，上海市教育局也指示市區學校和郊區學校配合當地的生產勞動，例如郊區學校與人民公社合作，市區學校配合市政府的工業發展準備不同的工廠，也因此在這個時期上海各級學校學生經常派遣到農村中支接收割，學校招生量也視農村所需勞動力而調整。¹⁸⁷

在教育與生產勞動——或明確的說是市政府的生產計劃——結合下，上海市原先以普通中學為主的教育系統紛紛與周邊工廠結合，加上 1959 年時上海合併周邊原屬於江蘇的數個郊縣，一時間技工學校、農業中學等各式與生產單位密切結合的教育機構豐富了上海的教育系統。¹⁸⁸配合劉少奇在當時提出的「兩條腿走路」辦學原則，這段時期的學校形式主要可以區分為兩種：將勞動（當時又稱為勤工儉學）安排在教學計畫內的全日制學校和半工半讀的學校（如農業中學）。不論在哪一種類型的學校，教育計畫均要求依附於生產計劃，配合大躍進期間權力下放，中央的教育政策調整結合了地方政府內數個部門，其過程對於規劃與參與各方來說都是首次，提供了我們一個新視角檢視地方政府如何讓學生學習「勞動」。本章接下來的部分將分別針對與工廠協作的勤工儉學運動和郊縣的農業中學進行討論。¹⁸⁹

第二節：學校與工廠

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運動開始後，各級學校最具體的改變也就是強調半工（耕）半讀的勤工儉學運動，在地方政府的要求下，各校學生，校級幹部費盡心力與工廠簽訂合約。¹⁹⁰教育部門主要考慮透過設立工廠或擴建實習工廠讓學生投入工業生產，如果條件無法允許才可投入與生產無關的服務性勞動。¹⁹¹由於不是

¹⁸⁶ 上海市檔案館，〈A29-2-51-49〉（上海市：上海市人民委員會，1958）；上海市檔案館，〈A23-2-51-60〉（上海市：上海市委教育衛生部，1958）

¹⁸⁷ 上海市檔案館，〈A23-2-633-1〉（上海市：上海市教育局黨組，1960）

¹⁸⁸ 呂型偉，《上海普通教育史》，呂型偉編（上海市：上海教育出版社，1994，第1版）

¹⁸⁹ 上海市檔案館，〈A23-2-370-11〉（上海市：上海市政府高等教育局，1958）；上海市檔案館，〈A23-2-370-21〉（上海市：上海市委教育衛生部，1958）；上海市檔案館，〈A23-2-633-1〉（上海市：上海市教育局黨組，1960）

¹⁹⁰ 多數的檔案不區分勤工儉學和半工半讀的差異，少數檔案中提到勤工儉學專指全日制學校將勞動編入課程，半工／農半讀則指的是學校自辦工廠／農場，兩者之外只能下放農村或工廠勞動，參見：上海市檔案館，〈B243-2-176〉（上海市：上海市高等教育局，1959）

¹⁹¹ 上海市檔案館，〈A23-2-370-21〉（上海市：上海市委教育衛生部，1958）；上海市檔案館，〈B243-2-136〉（上海市：上海市高等教育局，1958）



每間學校的專業都能直接和工廠對口，勤工儉學無疑的實踐了前述劉少奇對教育無法滿足經濟計劃的人力需求的言論——將實際運作的工廠引進學校，讓學生學習實際生產技術。在本節重點在於討論學校和工廠配合的過程，以及師生在參與計畫過程中的反應。

工廠辦學方案在大躍進開始時得到了極大的鼓勵，天津國棉一廠辦的半工半讀學校就曾為《人民日報》表揚，其他地方政府群起效尤，學校辦工廠的方案也在 1958 年 9 月 12 日毛澤東參訪時以「必然的趨勢」表揚武漢大學的自辦工廠。¹⁹²最初，上海教育局也先後指示轄下學校與必須與周邊工廠合作，藉由廠校合作替工廠進行技術創新，同時也訓練學生參與勞動的能力，使學校可以不依賴政府經費自力更生（當時新創的學校也標榜此原則）¹⁹³。1958 年底的上海市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展覽會上多半展示學校的自力更生成果，但卻被前來視察的康生批評為積極性不足，應以群眾運動的方式配合國家計劃發展更多高精密工程，不要被老教授和研究所的條條塊塊侷限。為滿足這一點，復旦和交通大學的勤工儉學納入更多的研發項目，稍後連上海市的中等專業學校都在勤工儉學成果報告中提到了自己的勞動成果與上海擁有的先進工業技術間的關係。¹⁹⁴

廠校合作的原則最終希望將廠校合一，達到「辦學校即辦工廠，辦工廠即辦學校」，教育系統規劃工業、理科、醫學等專業大學可以按照市政府的工業需求興辦化工、建築材料或精密設備工廠，這類工廠也受到教育部門較大的關注，而其他學校則可以興辦一些生活用品的工廠。這些工廠的生產與銷售計劃則納入計畫委員會與工業行政部門的領導。¹⁹⁵

當學校介入工廠，分屬兩個部門的雙方關係就相當多變，勤工儉學政策在制定階段就一波三折，市委和教育局最初希望工廠將原料撥給有意願的學校，並讓學生在不影響勞動計畫下爭取有報酬的工作，在一番討論後，正式的政策改成學生參加勤工儉學並不列入勞動計畫，但在計算生產率時才部分計算。¹⁹⁶政策制定過程中的折衝樽俎在實際環境中就更形複雜，也讓我們看到學校與生產計劃部門

¹⁹² 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大事記 1949-1982》（北京市：教育科學出版社，1983，第 1 版），頁 222,231

¹⁹³ 文匯報，〈用勤工儉學的辦法 上海三師創建附中〉，《文匯報》（1958/03/12）

¹⁹⁴ 上海市檔案館，〈A23-2-317-7〉（上海市：上海市高等教育局，1958）；上海市檔案館，〈A23-2-317-40〉（上海市：上海市高等教育局，1958）

¹⁹⁵ 上海市檔案館，〈B243-1-142-106〉（上海市：上海市高等教育管理局節約工作組，1958）；上海市檔案館，〈B243-1-142-1〉（上海市：中共上海市委教育衛生工作部，1958）

¹⁹⁶ 上海市檔案館，〈A29-2-51-49〉（上海市：上海市人民委員會，1958）；上海市檔案館，〈B105-7-328-13〉（上海市：上海市教育局，1958）

的博弈。生產階段，學校被認為具有研發能力，但計畫分配到協作工廠的原料是有限的，廠校彼此多有掣肘。¹⁹⁷成果方面，上海電機製造學校將校內工廠產出的成果用於購買設備擴大生產，卻反被上海市稅務局索討稅金，直到 1959 年時稅務局終於明確規定學校的產出不需徵稅，但被學校合併的校外工廠則需徵稅，如此一來又有一些響應政策的學校又成為課稅對象。¹⁹⁸隸屬不同行政層級機構的學校（如電機製造學校屬於中央的電機製造部、鐵路電信學校屬於鐵道部）進入地方經濟計畫後突然造成配銷體系很大的問題，這些學校可以向中央機關要求原料，再銷售給上海市內的其他單位；隸屬於上海市的學校雖然沒有中央單位方便，但勤工儉學所得不須納稅，教育局和共青團反而得提醒學校從事生產勞動時要避免與民爭利。¹⁹⁹此外，由於校內實習工廠的規模不足以滿足全校學生勞動，大量學生湧入一般性勞動（這也是教育局認為非專業學校可以從事的勞動）反而影響市政府的勞動計畫，擠壓了城內失業民眾的就業空間。有些學校班級全城尋找協作工廠，到處簽約的結果反而壓低工廠薪資，有些工廠甚至願意讓學生義務勞動，市政府只能要求各部門成立對應的勤工儉學委員會處理，但成效不彰。²⁰⁰

¹⁹⁷ 上海市檔案館，〈B243-2-136-1〉（上海市：上海市高等教育局，1958）

¹⁹⁸ 上海市檔案館，〈A29-2-51-49〉（上海市：上海市人民委員會，1958）；上海市檔案館，〈B163-2-651-13〉（上海市：上海市輕工業學校，1958）；上海市檔案館，〈A23-2-344-1〉（上海市：交通大學，1958） 1961 年中央教育部與財政部更改標準，學校生產的產品只有用於教學使用時才不扣稅，參見：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大事記 1949-1982》（北京市：教育科學出版社，1983，第 1 版），頁 289

¹⁹⁹ 上海市檔案館，〈B105-7-328-13〉（上海市：上海市教育局，1958）；上海市檔案館，〈A29-2-51-69〉（上海市：電機製造工業部上海電機製造學校，1958）；上海市檔案館，〈A29-2-51-224〉（上海市：上海鐵道電信信號學校，1958）；上海市檔案館，〈B243-2-136-126〉（上海市：上海市高等教育局，1958）；上海市檔案館，〈B243-2-136-126〉（1958：上海市高等教育管理局，1958）；上海市檔案館，〈B105-7-1092〉（上海市：國務院，1960）就算是服務性的勞動也是被指定不得與社會上具有服務性質的行業衝突，如學校自辦洗衣廠，參見：上海市檔案館，〈B105-7-328-68〉（上海市：共青團上海市委員會學校工作部，1958）關於中央機構所屬學校後來下放給地方政府的決定可參見以下檔案，不過檔案指出中央並沒有明確要哪些學校該下放，地方政府可自行協調：上海市檔案館，〈B127-2-212〉（上海市：中共上海市勞動局黨組，1958）

²⁰⁰ 上海市檔案館，〈B105-7-328-68〉（上海市：共青團上海市委員會學校工作部，1958）；上海市檔案館，〈B105-7-328-13〉（上海市：上海市教育局，1958）；上海市檔案館，〈B243-2-124-57〉（上海市：上海市高等教育局，1958）；上海市檔案館，〈B105-7-328-30〉（上海市：上海市教育局，1958）；上海市檔案館，〈A23-2-370-22〉（上海市：上海市委教育衛生部，1958）

勤工儉學運動的核心參與者是學生，因此就算在經濟層面上教育部門與生產部門有所矛盾，鼓勵學生參與勞動、學習勞動的目標並未改變，生產勞動一詞即指出了學生參與的勞動是生產性的，生產接受計畫調控，因此學生要學習的不是利潤核算問題，而是如何配合生產計畫進行勞動。上海市教育局在 1958 年的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博覽會宣傳了一些中學生參與經濟生產和技術創新的榜樣：如江寧中學的高三學生周必文改良玩具車馬達使中國玩具在市場上能「壓倒日本」、上海學生發明無線電話改善公社間通訊，這些故事共同的特色就是要群眾「發揮社會主義敢說敢做的精神」為計畫服務。²⁰¹這種「好工人」的形象刻劃也滲透到生產部門，華東師範大學附屬中學的高三學生在「老工人」的指導下，撇開了那些虛情假意的企業和繁複的公式做出了鼓風機，讓自己的班級成為一個小型翻砂廠；市立新光初中的學生以少年先鋒隊發動郊區的學生，在老社員的帶領下辦了一個肥料廠；上海具有較大規模的生產設備的市東中學，在提到與有經驗的工人互動是將學校的實習工廠轉變為生產工廠的關鍵。這些「好工人」和「老工人」的形象具有正面的教育意義，成為論及學生生產勞動時必提的榜樣（參見圖 14 老工人的形象）。²⁰²除了學習按照計畫外，教育單位普遍認為學生學習的是勞動的政治與教育意義，一些學校的輔導報告中進一步認為就算從不具經濟利益的勞動，只要有教育意義也要讓學生投入；學校附屬工廠中老師還會解說這些勞動和經濟建設的關係，如上海生產的機械零件是四川的油田訂購的，學生耽於玩樂，不事生產便會造成國家巨大的損失等等。²⁰³

生產勞動的課程紀錄多數會提到上海市區學生具有的資產階級習氣，而生產勞動扮演了改造上海市新一代的居民的重要角色。²⁰⁴由於前述各級政策部門在勞動時間、酬勞分配上沒有辦法達到一致的規劃，學生便在夾縫中找空隙，有些學生認為既然勤工儉學是一門課，兩星期的課程結束後也該回學校讀書繼續升

²⁰¹ 上海市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展覽會編，《青年學生在勞動中躍進》（上海市：上海教育出版社，1958，第 1 版），頁 48-52,75-79

²⁰² 上海市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展覽會編，《青年學生在勞動中躍進》（上海市：上海教育出版社，1958，第 1 版），頁 2,8；上海市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展覽會編，《勤工儉學在市東中學》（上海市：上海教育出版社，1958，第 1 版），頁 6

²⁰³ 上海市檔案館，〈A29-2-51-132〉（上海市：上海機械製造學校，1958）；上海市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展覽會編，《勤工儉學在市東中學》（上海市：上海教育出版社，1958，第 1 版），頁 2

²⁰⁴ 上海市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展覽會編，《大膽革新中學教學》（上海市：上海教育出版社，1958，第 1 版）；上海市檔案館，〈B105-7-328-50〉（上海市：上海市教育局，1958）；上海市檔案館，〈A29-2-51-1〉（上海市：中共上海市中等專業學校委員會，1958）

學；有些學生則將生產勞動視為賺錢手段，認為「擺麵攤」²⁰⁵才一本萬利；有一些人想趁機到對自己有利的單位工作，例如電影院售票、點心店賣點心、到街上撿菸頭等；也有些人認為在協作廠工作有利於日後職業分配。²⁰⁶共青團和學校的檔案中將上述行為認為學生的舊社會的背景產生資產階級習氣無法配合新社會的計畫（對比於一些出身工人家庭的子弟反倒更尊重自己的父親）²⁰⁷。由於教育局指示學校管理勞動報酬，學生只配給衣服或食物票。在激勵學生勞動和避免學生抱怨自己「不滿 16 歲，這和舊社會童工有什麼區別」²⁰⁸、「國家是好了，個人卻苦了」²⁰⁹間（有些學生甚至引經據典抱怨列寧只說過「學習、學習、再學習」，沒說過「再勞動」）²¹⁰，勤工儉學只好回歸教育層面解決：以勞動課成績或加強小組學習等方式鼓勵學生，並不斷表揚學習老工人的道德，甚至乾脆讓學生駐廠勞動，以車間中工人之口強調學生須服從生產紀律，「脫去少爺皮，換上工人繭」。²¹¹換句話說，雖然生產勞動讓學校與工廠結合，甚至讓學生進入了工廠，但其教學方式仍是透過教育性的獎懲傳達生產勞動。

城市學校的勤工儉學提供了地方教育單位宣傳自身配合區域計畫的機會，學生在大工地與大機械旁參與社會主義勞動、大興土木為勤工儉學運動最為常見（參見圖 16 學生參與建築工地生產勞動），學生的勞動力深為教育局所讚賞，還估計出「十五個學生大約等於一個工人」²¹²（上海市教育局對學生與勞動力的核算參見：表格 6 1959-1963 間上海市區與郊區學生人數與勞動力折算）。除了工廠勞動，基礎建設勞動讓學生們得以參與各項公共工程，這類和工人、城市共

²⁰⁵ 上海市檔案館，〈A23-2-370-22〉（上海市：上海市委教育衛生部，1958）

²⁰⁶ 上海市檔案館，〈B105-7-328-68〉（上海市：共青團上海市委員會學校工作部，1958）；上海市檔案館，〈B105-7-328-50〉（上海市：上海市教育局，1958）；上海市檔案館，〈B105-7-328-30〉（上海市：上海市教育局，1958）；上海市檔案館，〈A23-2-370-11〉（上海市：上海市政府高等教育局，1958）

²⁰⁷ 上海市檔案館，〈B105-7-328-68〉（上海市：共青團上海市委員會學校工作部，1958）；上海市檔案館，〈A23-2-370-21〉（上海市：上海市委教育衛生部，1958）

²⁰⁸ 上海市檔案館，〈A23-2-370-30〉（上海市：中共上海市委教育衛生部，1958）

²⁰⁹ 上海市檔案館，〈A29-2-51-64〉（上海市：上海電機製造學校，1958）

²¹⁰ 上海市檔案館，〈A23-2-370-22〉（上海市：上海市委教育衛生部，1958）

²¹¹ 上海市檔案館，〈A29-2-69-211〉（上海市：共青團上海鐵路電信信號學校委員會，1958）；上海市檔案館，〈B105-7-328-30〉（上海市：上海市教育局，1958）；上海市檔案館，〈B127-2-212-35〉（上海市：上海市高等教育局，1958）；上海市檔案館，〈A23-2-633-73〉（上海市：上海市委教育衛生部普教處，1960）；毛仲磐，〈勤工儉學的小故事〉，《文匯報》（1958/07/17）；文匯報，〈勤工儉學的又一重要形式〉，《文匯報》（1958/08/14）

²¹² 上海市檔案館，〈A23-2-370-11〉（上海市：上海市政府高等教育局，1958）

同勞動的活動激發了人們對未來的想像。上海建築材料工業學校這類中等專業學校協助建設工業住宅、廠房和丈量土地；華東師範大學的學生喊出「與水爭路，與時間爭路」的口號修建曹陽到安亭的公路，華東師範大學醫學院學生還喊出「提前跨入 1960 年而鬥爭」²¹³，此外，小學生也在少先隊與城市建設局的帶領下築路，中學生則參與市政府填平法華濱的建設——「為紅領巾興建跳傘塔」——協助清汙（參見圖 15 學生支援基礎建設：清汙）。²¹⁴透過這一系列的活動中，勤工儉學讓學生們希望藉由勞動「在建設社會主義的高樓大廈中，親手砌上一塊磚」²¹⁵——勞動將學生鑲嵌進了區域的發展中。

第三節：城市與郊縣

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運動是大躍進在教育上的折射，大躍進中建立的人民公社運動徹底的改變了農村，上海教育部門也在 1959 年上海合併數個原屬江蘇的縣份後開始面對廣大農村中的教育問題，當年編輯的上海市編鄉土地理教材中就介紹了這些郊縣的田園風光，並強調郊區產業的目的在於「保證城市蔬菜的大量供應」，並強調這類分工可以逐步消除城鄉差異。²¹⁶過去的研究者注意到大躍進時期的農村教育在掃盲和增加農民對科學認知的努力，不過本章關注的是農村教育政策與地方政府的產業人力規劃間的關係。²¹⁷與市區不同，長期以來，農村教育面對的人學率和鞏固率（學生入學後不休學）²¹⁸雙低的問題，人民公社開始後，中共應許了公社在食物和福利上都會躍進，但糧食產量躍進意味著地方政府

²¹³ 上海市檔案館，〈B127-2-87-33〉（上海市：上海市勞動局，1960）

²¹⁴ 上海市檔案館，〈A29-2-53-164〉（上海市：上海建築材料工業學校，1958）；上海市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展覽會編，《青年學生在勞動中躍進》（上海市：上海教育出版社，1958，第 1 版），頁 42-43；上海市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展覽會編，《紅領巾的社會活動》（上海市：上海教育出版社，1958，第 1 版），頁 60-61

²¹⁵ 上海市檔案館，〈B127-2-87-33〉（上海市：上海市勞動局，1960）

²¹⁶ 上海市教育局，《高級中學適用 上海市鄉土地理教材》（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59），頁 62

²¹⁷ John King Fairbank、Roderick MacFarquhar，《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49-1965)》（上海市：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第 1 版），頁 435-449；張禮永、郭軍，《共和國教育 60 年》，杜成憲編，第 1 卷（廣州市：廣東教育出版社，2009，第 1 版），頁 148

²¹⁸ 郊縣學生升學率不佳的情況可以參考 表格 5 1958-1962 間上海市高小與初中升學率，而就算到了 1965 年，在農業中學等學校已經做到一社一校下，金山縣十七所農業中學的學生流失率還是超過 40%，請參見：呂型偉，《上海普通教育史》，呂型偉編（上海市：上海教育出版社，1994，第 1 版）

徵糧量也會上升，農村得投入更多的勞動力，此時，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原則也就運用到農村，動員市區學生協助收割、修水利與郊縣學生就讀半農半讀學校就成為這段時期的特色。

農業中學始於 1958 年 3 月中江蘇省委的民辦農業中學座談——農業中學不只是半工半讀，行政領導上歸公社管理，同時配合公社的生產——參與此次座談的陸定一在聽聞這種學校後，特別指出要各地興辦農業中學，以民辦為主的農業中學開始大為風行，不但 4 月 21 日《人民日報》更以社論鼓勵，該年 12 月 10 日中共八大更在關於人民公社的指示中規定人民公社需自辦小學、農業中學。²¹⁹在此風潮下，上海也興辦了農業中學，同時鼓勵郊區的普通學校和人民公社結合，進行半農半讀（當時上海以市區為主，郊區範圍不大），但普通學校進行半農半讀時往往參照勤工儉學的政策，力求增加學校的產量，於是便有學校和跟人民公社搶土地的糾紛。²²⁰隨著 1959 年原屬江蘇的郊縣帶入更多郊縣農業中學後，上海市政府對農業人力、糧食生產的規劃也就更清楚的反映在這些學校的計畫上（上海市政府對市區、郊區學生的勞動力估算，請參考：表格 6 1959-1963 間上海市區與郊區學生人數與勞動力折算），以下將由此出發，從普通學校協助農作開始，再進入公社中的農業中學，討論教育安排和課程如何折射市政府對農業區域的規劃。

上海市內學校在大躍進開始之後就編有農業知識課程，許多學校也在操場上設置「紅領巾農場」等集體勞動農場供學生種植教學作物，但整體來看這門課並不是很受重視，至 1963 年，全市負責此課程的教師僅一半出身農業相關的職業學校。²²¹下鄉勞動多半在寒暑假間舉行，與農業知識課程不同，其目的在於讓學生接觸農村，在道德上願意去農村服務，在大躍進開始之前被稱為「義務勞動」

²¹⁹ 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大事記 1949-1982》（北京市：教育科學出版社，1983，第 1 版），頁 21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 11 卷（北京市：中國文獻出版社，1995，第 1 版），頁 615-616

²²⁰ 上海市檔案館，〈A23-2-370-11〉（上海市：上海市政府高等教育局，1958）；文匯報，〈普通中學改成農業中學〉，《文匯報》（1958/03/28）；文匯報，〈上海郊區辦起 420 所中學〉，《文匯報》（1958/04/04）；文匯報，〈上海郊區大辦農業學校〉，《文匯報》（1958/08/18）

²²¹ 上海市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展覽會編，《小學農業常識教學經驗》（上海市：上海教育出版社，1958，第 1 版）；呂型偉，《上海普通教育史》，呂型偉編（上海市：上海教育出版社，1994，第 1 版）

222。由於上海市教育局對學校設置工廠的規劃，不具技術專業的文科學校和中學便經常前往農村協助勞動，這也是大躍進之後常見於報端的「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形象（參見 圖 17 學生下鄉勞動）。²²³市東中學紀錄該校學生於寒假期間赴農村協助清淤、興修水利的過程，公社的生活讓學生了解農村的情況以及農作流程，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認識農村中的階級，學生們利用自己在社會主義課中的學習成果判斷出哪些人是依靠城市生活的舊地主，並和農民討論農業合作化的好處。²²⁴合作社幹部、老農與學生會談的教學方式在參與夏、秋兩季的收割勞動中也相當常見，那怕是在 1960 年農業普遍歉收的時節，這樣的教育方式依然可以讓學生體認到公社化對農作物產量的好處（偶爾有一些破綻，金山縣朱涇公社的農民趁學生到公共食堂吃飯時說「這是你們來了才搞得這樣好的」²²⁵，但說完立即遭到旁人糾正）。市區學生到農村勞動之餘也帶著認識大躍進期間新農村的作業，老師們會安排讀報、政治學習和調查活動，讓學生認識對周遭工作的農民進行調查，讓學生體會「為了保證工人老大哥吃好，寧願自己吃少」和「把農村建設的跟城市一樣」農業規劃願景。²²⁶

與市區學校的走馬看花不同，人民公社中的農業中學負擔的是公社的生產需求，一般的農業中學（上海的農業中學以初中為主）設有試驗田，師生在內耕作，由於公社補助和學生學費只能佔其運作經費很少的部分，試驗田和師生協助

²²² 在教育界可見的「義務勞動」指示大約起於 1957 年在暑假前的反右運動告一段落後，共青團中央轉發各省市展開義務勞動的通知，要學生，一開始集中在高等院校，1958 年之後在大躍進的背景下，中學生也逐步加入參見：上海市檔案館，〈C21-2-1036-62〉（上海市：上海市委，1957）；上海市檔案館，〈C21-2-1036-171〉（上海市：共青團上海市委辦公室，1957）；上海市檔案館，〈C21-2-1036-221〉（上海市：共青團上海市委辦公室，1957）；程永寧、許學習、周自進，〈大學生到農村義務勞動〉，《文匯報》（1957/08/05）；文匯報，〈上海中等學校師生三萬人 寒假期間下鄉義務勞動〉，《文匯報》（1958/01/25）；文匯報，〈上海中小學生暑假生活豐富多彩〉，《文匯報》（1958/07/27） 大躍進開始之後，寒暑假期間支援農村收割仍被稱為義務勞動，郊縣也會組織「義務勞動辦公室」負責相關業務，參見：上海市檔案館，〈A72-2-23-5〉（上海市：嘉定縣「三秋」義務勞動辦公室，1959）

²²³ 上海市檔案館，〈B243-2-176〉（上海市：上海市高等教育局，1959）

²²⁴ 上海市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展覽會編，《勤工儉學在市東中學》（上海市：上海教育出版社，1958，第 1 版），頁 24-33

²²⁵ 上海市檔案館，〈A23-2-633-147〉（上海市：上海市委教育衛生部，1960）

²²⁶ 上海市檔案館，〈A23-2-633-147〉（上海市：上海市委教育衛生部，1960）；徐峰，〈第九女中三秋勞動善始善終〉，《文匯報》（1960/11/08）；文匯報，〈向明中學全面安排三秋勞動和生活〉，《文匯報》（1960/10/12）；文匯報，〈將青春獻給壯麗的農村教育事業〉，《文匯報》（1960/11/14）



公社生產所得相當重要。時任上海市委教育衛生部長的楊西光從不諱言農業中學設置就是要緩和農民對子弟被迫放棄升學的反彈，學生程度與勞動時間的客觀因素使得農業中學的課程必須有所精簡，為農業生產服務，例如將歷史課程與其他科合併，加強農業常識課程（參見圖 18 農民中學的形象）。²²⁷

農業中學的師生來源相當複雜，1958 年開始興辦農業中學時，願意且有資質上學的學生多半是住在鎮上的非農業家庭出身（如舊地主、手工業者），當教育局指示農村學生應該就近在農村就學、協助生產時，家長們多半不願意接受，有些農民認為孩子能到上海市區的學校就學是「革命勝利果實」²²⁸；學校方面則認為農業中學招生情況不理想，教育局應該把附近市區學校的學生分配下來。²²⁹1959 年，各地的糧食產量逐漸發生困難，上海農村的情況雖然並非極端嚴重，但教育局在該年三月指示要釋出超齡學生回社勞動（對於同時期前來農村收割的市區學生來說，要注意的僅是不可趁下鄉購買農副產品而已²³⁰），消息釋出後引發外界恐慌，家長認為「原來是勞動要動員讀書，現在又要動員勞動」，學生中甚至傳出初中升學考試一定會讓超齡學生考不上，此時教育局只好對學生解釋農業中學的教師依然會定時訪視回社勞動的學生，並將有城市戶口者（市居證）與普通農村居民區分開處理。²³¹農業中學的設立具有將生產勞動與教育結合的目的，並且以生產為主，但當生產勞動需要更多勞動力時，農業中學的就學政策就成為政府可以運用的手段，既然可以離開普通中學半農半讀，那直接在生產隊接受老師定期訪視又有何不可？

農業中學的出現在制度上讓農村可以「留得住中學生」²³²，使其大致運作到 1980 年代初人民公社制度完全結束，但在上海這種以城市經濟為主，地理空間卻包含大片農業區的城市來說，農業中學面對的競爭就沒有最早施行的江蘇輕鬆：上海市教育單位照其他省市的經驗將農業中學交給人民公社領導，視為生產的一部分，但其不直接注資的結果導致 1959 年寶山縣 38 所農業中學還沒有一個專職的校長；1960 年之前上海也一直沒有市編本農業中學用教材（同時期的普通中學用市編教材已經有數十本，教育局只好讓農業中學先用江蘇編的教材，直到 1965

²²⁷ 上海市檔案館，〈A23-2-492-93〉（上海市：上海市委教育衛生部，1960）；上海市檔案館，〈A23-2-549-1〉（上海市：上海市委教育衛生部，1960）；上海市檔案館，〈A23-2-489-1〉（上海市：上海市委教育衛生部，1959）

²²⁸ 上海市檔案館，〈A23-2-1536-33〉（上海市：南匯縣委員會宣傳部，1959）

²²⁹ 上海市檔案館，〈A23-2-549-57〉（上海市：上海市委教育衛生部，1960）

²³⁰ 上海市檔案館，〈A23-2-633-147〉（上海市：上海市委教育衛生部，1960）

²³¹ 上海市檔案館，〈A23-2-1536-33〉（上海市：南匯縣委員會宣傳部，1959）

²³² 陸定一，〈農業中學創辦二周年〉，《人民教育》第 2 卷（1960），頁 1-3

年乾脆建議是用普通中學教材)²³³；上海的普通中學設置密度較高，農業中學為公社服務限制學生前途，城市近郊學生反而不願意就學，於是發生「就全國來看有發展前途，但還要看具體情況」²³⁴。這些問題折射農業在上海市計畫經濟中的地位，1959年合併郊縣的原始目的在於穩定上海的農副產品供給，但上海仍是主要工業城市，工業在計畫經濟中佔有極大的比重，但人民公社的積極性又是大躍進所提倡的，對比江蘇全省農業中學佔有大量田地，自給自足的情況，上海市教育局興辦農業中學這類與公社結合的學校時顯得有些躊躇，農業中學的教師們還認為上海是「秘密的」²³⁵興辦農業中學。²³⁶大躍進時期的人民公社、戶口政策和二五計畫使現代中國的城鄉二元化體系完全確立，學生在城市附屬的廣大的農業區域就學也就被迫認識了兩套系統的差異，雖然許多人抗拒前往農村支援收割，當地工商業者也不願子弟就讀，此時「勞動」成為銜接農業與學校政策的卡榫：它宣示學生在農村升學不代表受到差別待遇，只是服從計畫經濟生產要求，學校系統仍是連貫且開放的，而且計畫最終一定會「消滅城鄉差別，消滅工農差別」²³⁷——但在計畫的終點到來前，不同區域所受的教育卻將學生鑲嵌進不同的生產計劃中。

第四節：小結

關於現代工業的人身控制，Michael Burawoy 以其在美國和蘇聯等地的工廠田野經驗寫了 *Manufacturing Consent: Changes in the Labor Process under Monopoly Capitalism*（中文譯本為《製造甘願：壟斷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的歷史變

²³³ 上海市檔案館，〈B105-8-805-1〉（上海市：上海市教育局，1965）

²³⁴ 上海市檔案館，〈A23-2-489-182〉（上海市：上海市委教育衛生部，1959）有些老師還建議既然國家提倡勞動，接受三年勞動洗禮的農業中學學生在升學考試時應該要優先錄取，參見：上海市檔案館，〈A23-2-549-57〉（上海市：上海市委教育衛生部，1960）

²³⁵ 上海市檔案館，〈A23-2-489-177〉（上海市：上海市委教育衛生部，1959）

²³⁶ 陳光，〈農業中學的新階段和新任務〉，《人民教育》第2卷（1960），頁10-14；黃茂林，〈一所機耕化的農業中學〉，《人民教育》第2卷（1960）；歐陽惠林，〈江蘇省農業中學的第二年〉，《人民教育》第2卷（1960）；作者不詳，〈農業中學大抓鞏固提高，為1960年繼續大發展準備條件〉，《人民教育》第1卷（1960），頁54-55

²³⁷ 消滅城鄉差別為陸定一展開農業中學政策時的原話，上海市農村工作委員會在農業中學興辦第三年的回顧報告時又再一次提及過去三年農業中學辦學政策與區域發展間的關係，參見：上海市檔案館，〈A72-2-416-6〉（上海市：上海市委農村工作委員會，1960）

遷》²³⁸) 和 *The Politics of Production : Factory Regimes under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 ²³⁹兩書進行討論。他認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資本主義藉由製造工人甘願 (consent) 勞動的新方式創造新的社會觀，獨裁型的企業已無法得到員工支持，人們透過勞資協商機制使得工人成為工廠共生體的一部分，工人與資方協力排除企業外的工人，並在企業內尋求晉升的機會，這種形式上的平等 (企業內的年資加乘不區分管理階層或工人)，使得工人感覺不到被剝削，企業本身龐大的規模和穩定的內部治理克服了市場的無秩序，使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發展出壟斷型資本主義。而在社會主義國家，他認為就算實存的社會主義國家透過計畫經濟試圖避免市場的無秩序，但計畫分配的原料和產銷量隨著計劃始終，工廠為了爭取更多的產量 (為了官僚升等或其他因素)，工廠間依然會囤積貨物並彼此競爭產量，社會主義國家的計畫經濟和意識型態雖然避免勞工直接面對失業，但計畫的不確定性卻不能讓勞工避免被去技術化，同時為了鼓勵勞工學習新技術 (製造「甘願」)，塑立工人模範便相當重要，否則在計劃體系下的工人缺乏自主性，除非政治體制改變，任何形式的動員都不會改善工人的勞動能力。²⁴⁰

雖然毛澤東主導的工業化與東歐蘇聯式的工業化有理念上的差異 (如鞍鋼憲法和蘇聯馬鋼憲法的差異)²⁴¹，但 Burawoy 的研究成果對於本研究有許多啟發，當工業中的計劃經濟進入原本不負責生產的學校時，校際、廠際，甚至廠校間的「市場競爭」就隨之展開，如第二節所討論的，廠校的供需關係導致勞工 (學生) 地位下降，廠校的主管單位，勞動局與教育局針對彼此生產項目衝突只能不斷的協調，最後確立以現有工廠為主，並將學校納入生產計劃的原則。教育部門面對這些衝突，在每次慶祝產量提升之餘似乎有些手足無措，直到 1961 年 6 月 19 日中共中央重新確定學校不是康生所說的工廠，而是「以教學為主」²⁴²前，教育單位只能隨著生產量起舞，接受由生產單位提出的廠校合併或計畫產量

²³⁸ Michael Burawoy, 《製造甘願：壟斷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的歷史變遷》 (臺北市：群學出版社，2005) 英文版為：Michael Burawoy, *Manufacturing Consent : Changes in the Labor Process Under Monopoly Capitalism* (Chicago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9)

²³⁹ Michael Burawoy, *The Politics of Production : Factory Regimes Under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 (London : Verso, 1985)

²⁴⁰ Michael Burawoy, *The Politics of Production : Factory Regimes Under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 (London : Verso, 1985), pp 162–164, 195–196, 200–202

²⁴¹ 毛澤東，〈關於工業戰線上的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運動開展情況的報告〉，《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第 13 卷 (北京市：中國文獻出版社，1996，第 1 版)，頁 109–124

²⁴² 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大事記 1949-1982》 (北京市：教育科學出版社，1983，第 1 版)，頁 294



移轉，並努力的追趕地方或國家規定的生產指標。²⁴³

但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到底是教育還是生產勞動，從延安時期以來的教育發展便沒有一定的說法，教育單位的主事者們和康生、陸定一等人有著不同想法，現代工業的生產勞動是高度分殊化的，如此一來學習設計專業可能可以不用離開工作室，這樣的勞動毫無疑問不符合教育單位對勞動的看法。²⁴⁴因此在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運動中，教育性獎懲遠比生產上拒絕學生繼續前往工廠工作有效，在 1957 年生產勞動政策初步進入學校時，上海市教育局就認定必須避免學生間的「生產競爭」，只能維持教育性的「生產競賽」²⁴⁵。如此雖不至於與 Burawoy 提過的「內部國家」²⁴⁶——工人在企業內部爬升並競爭，成為制度的一部分——類似，但學生在班級的獎懲制度下是平等的，如此一來唯一獨立於生產之外的只剩下不需要因為勞動效果差異而接受獎懲的教師，在反右運動剛結束的年代裡，教師在勞動中處在監督學生和參與勞動的雙重角色，反而變成「不夠積極」的對象。²⁴⁷

在獎懲與車間、農場的生產鼓勵下，教育單位向學生傳遞了政府的勞動計畫，在政治輔導員的紀錄中我們可以看到不同車間中的學生利用工人的趕工術語喊出了「現場好比戰場，輕傷不下線」、「校內好學生、廠內好工人」²⁴⁸的口號，政治輔導員也會藉機組織學生鳴放，改變教學計畫讓學生的課業表現能與生產表

²⁴³ 如交通大學與上鋼二廠增建的車間合併之後，上鋼二廠便將 1958 年鋼產量移轉交通大學，其他較小規模的合併也有榆林區的銅仁合金工廠與長陽中學、上海電焊機廠與江浦中學，也是配合工廠生產計畫擴充人力，參見：上海市檔案館，〈A23-2-344-20〉（上海市：交通大學，1958）；上海市檔案館，〈A23-2-344-126〉（上海市：公私合營上海電焊機廠，1958）；上海市檔案館，〈A23-2-344-124〉（上海市：公私合營銅仁合金工廠，1958）而一些研究者把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過程中行政單位的混亂導致教育計畫混亂歸咎於大躍進時期的教育錯誤的「依賴群眾」，參見：李慶剛，《「大躍進」時期「教育革命」研究》（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0，第 1 版），頁 165-172, 373

²⁴⁴ 上海市檔案館，〈A29-2-51-152〉（上海市：上海建築工程學校，1958）

²⁴⁵ 上海市檔案館，〈B105-1-1745-8〉（上海市：上海市教育局，1957）

²⁴⁶ Michael Burawoy，《製造甘願：壟斷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的歷史變遷》（臺北市：群學出版社，2005），頁 279

²⁴⁷ 上海市檔案館，〈A29-2-51-167〉（上海市：上海船舶製造學校，1958）由於勞動成為一種教育方式，此時老師和學生都受到生產小組管理，乃至於有些學生看老師上工太辛苦，還會高喊「我以小組長的名義，命令你休息！」，參見：上海市檔案館，〈A23-2-370-30〉（上海市：中共上海市委教育衛生部，1958）

²⁴⁸ 上海市檔案館，〈A23-2-344-165〉（上海市：上海水產學院，1958）

現一致。²⁴⁹小學的社會主義課程也透過實際參訪人民公社，透過訪問、調查讓學生認識在上海郊區設立的人民公社如何改變城市生活，如此，教育結合生產勞動的課程便有了一種職業參訪、實作的性質。²⁵⁰

Andrew G. Walder 在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 延伸了 Burawoy 的觀點，他認為在毛澤東時代的車間管理除依賴政策宣示，其特色在於因配給有限，工廠管理幹部以各種方式解讀、繞過規章，提供職工更多福利的軟性管理方式比西方工廠更加明顯。²⁵¹而生產勞動轉以教育中的軟性獎勵，對學生具有一定程度的吸引力，並且由於中國的工廠體系隨著計畫經濟覆蓋了整個社會，這類獎懲最終強化了學生對計畫體系的信心，如農業中學的學生認為「下放（生產）是光榮的事」²⁵²，1963年編纂的《上海市初中生作文選》中就收錄了南匯縣的一位初中生在三夏勞動中透過同學的鼓勵，學會打麥並立志日後當個農民的文章，這類「自願者」往往被地方教育單位視為模範，在後來的回顧中，地方教育單位進一步認為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有效的讓畢業生服從分配，甚至還能支援外地建設。²⁵³

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從最初要解決就業、生產問題到最後成為週期性改變教學計畫的校外活動，學生在不同職業、勞動現場的教學經驗對其傳達了一種觀看城市的方式。政治課、社會主義課中不斷的彼此鳴放、檢討和評分也讓他們得以勞動為標準凝視（gaze）²⁵⁴自己的同學與生產現場的其他人。與紙本上的學習

²⁴⁹ 上海市檔案館，〈A23-2-344-165〉（上海市：上海水產學院，1958）類似的教學方式在沒有配置政治輔導員的中等學校中則是由老師進行，老師跟著學生在實習工廠和外面的工廠中勞動，同時調整上課規劃，參見：上海市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展覽會編，《大膽革新中學教學》（上海市：上海教育出版社，1958，第1版），頁33

²⁵⁰ 上海市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展覽會編，《紅旗引導少年兒童前進》（上海市：上海教育出版社，1958，第1版），頁12-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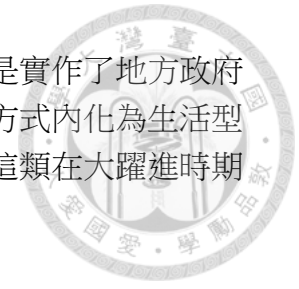
²⁵¹ Andrew G Walder，《共產黨社會的新傳統主義：中國工業中的工作環境和權力結構》，龔小夏譯（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6，第1版），頁6-8,276-279

²⁵² 學生們抱怨松江縣城北農業中學下放超齡學生時把背景不好但沒超齡的學生也放下了，公社黨委陳朝貴本意為「為何不培養工農子弟」，但學生卻對下放背景不佳者能到第一線不滿 上海市檔案館，〈A72-2-863-7〉（上海市：共青團上海市委辦公室，1961）

²⁵³ 施振洪，〈我在勞動，我在鍛鍊〉，《上海市初中生作文選》，上海市中小學生作文評選選委會編（上海市：上海教育出版社，1964，第1版），頁41-43；呂型偉，《上海普通教育史》，呂型偉編（上海市：上海教育出版社，1994，第1版），頁221

²⁵⁴ John Urry 在 *The Tourist gaze* 中將 Foucault 提過的現代醫學的凝視（gaze）概念運用在旅行上，他認為旅行手冊提供了觀光客觀看景物的角度，而且觀光客只會按照其指定的角度拍攝照

不同，這次進入生產現場的機會除了凝視自己所在的區域，更是實作了地方政府與國家的計畫，並藉由勞動和一系列與之配合的課程，將生產方式內化為生活型態，直至今日我們仍可看到中國大陸的各級教育部門延續部分這類在大躍進時期誕生的政策。²⁵⁵



片，在此將 Urry 的概念延伸到教育上，與旅行手冊不同，教育文本透過評分、班級經營讓其提供的凝視更有效力，Urry 原始的說法參見：John Urry, *The Tourist Gaze* (Thousand Oaks: Sage, 2002)

²⁵⁵ 在就學過程中接受政府分配進入生產單位勞動這一種計畫經濟時期的產物在今日依然存在，只是換了面目，2003 年 3 月的《南方周末》指出大陸學生習於畢業前一年或甚至更早開始在企業實習，勞力供給過剩讓企業乾脆不支付實習生薪水，此一怪象和計畫經濟時期人們的就學經驗有關，由於學長姐、家長在計畫經濟下的經驗造成的壓力，新一代的學生只好不斷地壓低自己在「實習」市場上的薪資，以祈早日就業，而這類現象在今日依然存在，並更加嚴峻，參見：楊支柱，〈取消實習，放棄計畫經濟就業觀〉，《南方周末》（2003/03/28），

<http://www.people.com.cn/GB/kejiao/41/20030328/956470.html> 而協助勞動對於學生尊重勞動成果的道德教育迄今仍為人看中，陝西省教育廳於 2013 年 4 月還指示轄下城市學生參與農村勞動（但和大躍進時期講究學校負責的生產量不同）參見：劉振，〈省教育廳要求城市學生要參加農業生產勞動〉，《西安日報》（2013/04/01），[http://news.xiancn.com/content/2013-](http://news.xiancn.com/content/2013-04/01/content_2735544.htm)

[04/01/content_2735544.htm](http://news.xiancn.com/content/2013-04/01/content_2735544.htm) 而校辦產業在 1980 年代雖然被譏為「學校辦社會」，但校辦產業在市場化深入之後也有了新的面貌（上海部分參見：圖 19 2000 年時上海市各級學校校辦產業產值與比例分配），例如知名的北大方正、清華紫光集團，而國務院為了避免產校間的衝突，2003 年成立的清華控股公司也就是在政策不允許學校全資企業和校辦企業下的中介單位，參見：龐瑞鋒，〈高校企業：光環下的意外〉，《南方周末》（2003/09/11），

<http://www.southcn.com/weekend/economic/200309110027.htm>；丁偉，〈清華大學：只做股東，不當“父母”〉，《人民日報》（2003/10/22），<http://www.people.com.cn/GB/it/1065/2146358.html>

結論：「進步」的鄉土

「城鄉對立逐步消滅」²⁵⁶



《共產黨宣言》

「一切已死的先輩們的傳統，向夢魘一樣糾纏著活人的頭腦」²⁵⁷

〈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

本文試圖以三個面向還原大躍進時期上海市教育政策發展與城市形象塑造的關係，以了解地方政府如何透過教材與教學活動將區域計畫折射到教育領域中，形成一種讓學生習得對自身所屬的空間（區域或國家）的知識框架，而這一種知識框架不只讓學生認識所處的空間，更配合著空間敘事參與了空間的改造。

在本文的第一章中，我們可以看到「帝國主義」成為上海市編鄉土教材中最鮮明的敘事框架，辛亥以來革命黨與舊社會的鬥爭滲透到學生周遭的土地。此時革命、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侵略不再只是課本上的名詞，或是遙遠省分的故事，透過鄉土教材和市內參訪，帝國主義成為學生觀看自己所處的城市的方式，在這個視角下的上海也就成為帝國主義進入中國的代表，翻轉區域內不同人群的過往。接著地方政府透過教材重構區域內人群的討論，第二章討論的是鄉土教材中的城市空間論述，在這個章節中可以看到教材明確界定了「鄉土」的範圍，這和現代教育行政的科層體系的建立有明確關係，人們對鄉土的認知不再只是根據個人生活或鄉紳間的親疏，行政區劃影響著人們對自己「鄉土」的認知。在鄉土地理教材中，市政府將外灘和「勞動人民居住地」的棚戶區在教材中描述成兩種對立的地景，透過都市更新，政府幫助勞動人民重新「站起來」，住到新蓋好的工業住宅裡，區域計畫成為串起「鄉土」中不同人群的方式。第三章則進一步的討論區域計畫在實際的教學活動中的展現，大躍進中新生的「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運動成為探索地方政府的生產計劃進入學校的入口，在前面的章節中我們可以看到建設被賦予改造區域歷史與空間布局的意義，而教育場域中施行的生產勞動則讓學生成為建設的參與者。另外，不同型態與區域的勞動各自代表著觀看城市的不同方式，學生基於生涯、分數等各種考量參與勞動時，他們如何應對生產勞動也就反映了學生對地方政府計畫的學習。由於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所具有的社

²⁵⁶ 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第4卷（北京市：人民出版社，1958，第1版），頁490

²⁵⁷ 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第8卷（北京市：人民出版社，1961，第1版），頁121

會主義意識形態背景，第三章也讓本文討論的「書寫」社會主義城市不只有教育主管單位參與，學生也參與其中。

本文由大躍進期間鄉土教材編輯運動進入上海市政府的區域形象重塑過程，過去對鄉土教材這類地方性教材的研究往往將其歸入地方性知識，洪長泰的研究將毛澤東在 1950 年代發動的知識份子下鄉運動與大躍進以後的「四史」（社史、村史、廠史、家史）賦予時代縱深。由李大釗開始的新村運動討論中國知識分子在民粹派思想影響下展開的民間文學蒐集運動，知識份子們透過鄉間的話語或都市流行的白話改寫民間故事，他認為新式知識分子企圖將民眾放回中國歷史的核心，摒棄將民間故事視為粗鄙不文的傳統，此計畫最後由中國共產黨人完成（雖然毛時期的下鄉不如李大釗等人企圖鼓勵學生自願參與，上層人物的民粹派想像使得這些政策帶有強制性）。²⁵⁸但在本研究所關注的鄉土教材中，雖然人民的故事置於上海鄉土史的核心，該教材編纂過程卻看不到同時期《上海民歌選》和《上海民間故事選》中的逐層「海選」民間作品的徵文方式，如第二章所述，上海的教材係教育局命令各區中學負責撰寫。洪長泰認為這類地方史的編輯帶有一種知識份子對鄉村知識民粹式的渴求和愧疚，這一點在上海的鄉土教材中就僅見其形。

洪長泰進一步認為近代知識份子「到民間去」的動力與知識份子們想與西方文化與都市生活決裂有關，「到民間去」也就是為回到純潔的農村中過著「有益的」勞動生活。²⁵⁹若以這一點考察大躍進時期的鄉土教材運動便相當有趣，毛澤東原始的看法是以省、市一級的行政區為單位編輯鄉土教材，如此一來，省、市這級跨越農村、城市行政區的鄉土教材便不能迴避城市生活。²⁶⁰在知識份子對「鄉土」的想像下，本文所關注的上海（做為當時兩個直轄市之一）的鄉土歷史分裂成了「進步的」鄉土和「反動的」鄉土的鬥爭，帝國主義成為上海市教育單位描述自己的鄉土歷史時最好的論述工具，過去被認為代表上海灘繁華的高樓大廈在文字中殞落為帝國主義野蠻的象徵，而在滿布淤泥的河道邊的棚戶區清汙則成為與「進步的群眾」站在一起。透過創造對立的地景，學生在大躍進時期由市教育局主導的勞動活動中習得了「進步的」鄉土。

城市、工業化和「到民間去」思潮中一些難以調和的部分影響著當時教育行

²⁵⁸ 洪長泰，《到民間去：1918-1937 年的中國知識分子與民間文學運動》（上海市：上海文藝出版社，1993，第 1 版），頁 279 - 299

²⁵⁹ 李大釗，〈青年與農村〉，《李大釗文集》，第 2 卷（北京市：人民出版社，1999，第 1 版），頁 287 - 291

²⁶⁰ 毛澤東，〈在普通教育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毛澤東文集》，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第 7 卷（北京市：人民出版社，1957，第 1 版），頁 245 - 249

政單位對政策的規劃，更具體的是「普及教育」（將教育擴張到偏鄉）和「教育與生產結合」（動員學生參與勞動）兩者難以調和，結合生產單位的辦學降低了辦學成本，但學生的課時便受到非教育單位能掌控的改變。思想上的矛盾讓研究者們對大躍進時期教育改革有了不同看法，Macfarquhar 曾提及大躍進中的教育改革造就了一批農業科學家，而對民間科學創造力的信仰也成為文化大革命的遠因。²⁶¹在教育史研究上，對大躍進時期各式改革，人們的評價向來不一，對於「群眾式掃盲」、江西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和各地的農業中學可能認為是在充實農村地區教育資源，但在都市地區與一般性的「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運動就為人批評以群眾運動辦學路線破壞了教育該有的規律性。²⁶²但如同本文針對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研究顯示，這些彼此衝突的討論奠基於前述「進步的鄉土」的問題，當區域內的不同單位成為「進步」的象徵（如國家計畫的大工廠、做為政治榜樣的人民公社），其他單位只能盡力追趕和配合，過去的教育史研究者認為這段時期教育政策的混亂源於「群眾運動式辦學」，但實際問題應該是官僚機構無法解決現代性與鄉土生活間的矛盾，例如當群眾改善機器與生活條件可能讓農村人口流失時，官僚機構只能採取強制的戶口管制措施，1950 年代開始，「中央—地方」關係的多變圍繞著新生的共和國，楊奎松便曾關注 50 年代初廣東地方黨組織的「地方主義」鬥爭。²⁶³1958 年政治鬆綁給了地方政府許多新的權限，但在中央的政治要求變得較為寬鬆時，為了同時契合中央與地方兩者間的矛盾，進退失據的地方教育單位使得大躍進時期的地方教育出現許多混亂，或許我們可以進一步探討大躍進初期地方政府具有多大的權限，但無論如何政治措施的混亂都不應認為是群眾所造成。

在「到民間去」的想法下，創造新鄉土，培植社會主義新人的政策也就是大躍進時期教育政策的主要特色，學生在地方教育單位提供的教材和活動中認知自己所在區域的願景與自己可以擔負的使命。這類教育過程和過去對現代中國公民教育的研究有許多類似之處，Robert Culp 在 *Articulating Citizenship: Civic Education and Student Politics in Southeastern China, 1912-1940* 一書中曾關注現代中國公民教育對型塑公民思想的影響，認為晚清以來出現的公民教育夾雜晚清

²⁶¹ Roderick. MacFarquhar,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 2 卷（石家莊市：河北人民，1992，第 1 版），頁 440-443； John King Fairbank、Roderick MacFarquhar,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1949-1965)》（上海市：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第 1 版），頁 435-449

²⁶² 李慶剛，《「大躍進」時期「教育革命」研究》（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0，第 1 版），頁 322-374；張禮永、郭軍，《共和國教育 60 年》，杜成憲編，第 1 卷（廣州市：廣東教育出版社，2009，第 1 版），頁 140-177

²⁶³ 楊奎松，〈建國初期中共幹部任用政策之考察〉，《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史研究》（南昌市：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第 1 版），頁 364 - 411

仕紳的儒學關懷和西方傳入的法西斯主義、斯大林主義的公民養成課程。透過公民教材和童子軍、朝會等教育活動，學生學會規律的新時空感（如教室安排、上下課時間）和參與政治的方式，從原本從晚清仕紳發動的公民運動中被領導的角色轉變為積極參與國家活動的「國民」。²⁶⁴不斷的「國恥」將胡適等人提倡的「人權」和「自由」轉變為讓個人奉獻於更大的集體利益，國民黨人已在新生活運動中試圖培養更富有紀律的公民，藉此發達國家經濟。在討論社會主義下的公民教育時，Robert Culp 引述陳永發的 *Making Revolution*，提到共產黨提供農民一種更大的承諾與責任感，讓農民願意投身革命，因此 Culp 認為共產黨讓農民以為加入革命組織才代表自己具有「積極的公民」資格（這類組織在 1950 年代後覆蓋了整個中國），在公民教育發展的過程，學生習得了自己的公民身分，也認識了國家。²⁶⁵

Robert Culp 的研究將本研究可以放入中國現代性的背景，中國的現代教育制度逐漸萌芽，最早大約可追溯到晚清的最後十年，而在教育行政的科層體系建立後，地方政府掌握教材編輯權又是更晚的事情。由於當代的鄉土教育是在科層化的政府體制中運作，在五四運動之後「積極的公民」觀念逐漸發展，地方政府在進行其教育活動時，也要求其區域的群眾積極參與其所編纂的教材和各式教育活動。「積極的公民」與「進步的鄉土」共同運作下，學生認識的「鄉土」雖然有所限制，但仍被賦予積極的參與認識「鄉土」的責任，為區域政策的目標獻身，而這也是大躍進期間鄉土教材與教育運動不同於其他時期的區域形象文本之處，在全國通行教材中的普遍革命理想在地方政府所編纂的教材中化為地方政府的區域規劃藍圖，但不變的是群眾依然得為此「藍圖」獻身。Robert Culp 提供的現代性框架提供本研究一個可以繼續擴充的方向：在現代中國的不同時期，人們怎麼建構他們自己的地方教育，其中的教育活動與地方政府的關係為何？上海的民族歷史上且單純，內陸的口岸城市（如雲南、東北或西北邊境）的敘事又是什麼？

最後，大躍進時期的上海教育變化或許不比大躍進時期其他層次或地方的變革來的波瀾壯闊，但其和大躍進時期各項建築在毛澤東「一窮二白」和「落後的優勢」思想上的政策有類似之處，具有思想衝突的政策擘劃讓教育單位疲於奔命，原先發達的城市則想方設法將自己打扮成符合「落後的優勢」中所想像的空

²⁶⁴ Robert Joseph Culp, *Articulating Citizenship: Civic Education and Student Politics in Southeastern China, 1912-1940* (Cambridge, MA: Distribut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279-282

²⁶⁵ Robert Joseph Culp, *Articulating Citizenship: Civic Education and Student Politics in Southeastern China, 1912-1940* (Cambridge, MA: Distribut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284-295

間。在教育政策不斷的調整中，城市的教育單位動員了新生代，讓他們學習地方政府的區域擘劃，也參與生產計畫，改變一代人對上海這個過去東亞商業中心的認知。²⁶⁶但這些形象不是憑空創造，而是透過新的知識框架凝視而來，就像是本文最初引用 **Sharon Zukin** 的說法，新的城市形象繼承了城市中原有的純正性（**Authentic**），但透過計畫體系的凝視和群眾運動的實作下，純正性儼然改變，社會主義的城市課程也就折射了一個社會主義城市的軌跡。

²⁶⁶ Maurice Meisner，〈毛主席的誕生：中國共產革命之路〉（台北市：衛城出版社，2012，第1版），頁 235 - 237 Meisner 進一步的認為毛主席最大的特色就是其「落後的優勢」和「農民的革命積極性」思想和馬克斯、列寧等人的社會主義想法截然不同。

附錄

第一章



表格 1 目前所見大躍進時期上海市各類鄉土教材出版情況

教材名稱	適用學校	版次	出版年	印刷量
上海市地理鄉土教材	中學	1 版 1 刷	1961	225000
上海市地理鄉土教材	中學	2 版 2 刷	1961	113000
上海市地理鄉土教材（第一分冊）	中學	1 版 1 刷	1958	86245
上海市地理鄉土教材（第二分冊）	中學	1 版 1 刷	1959	78245
上海市地理鄉土教材（第三分冊）	中學	2 版 1 刷	1960	87005
初級中學中國歷史第三冊鄉土教材	初中	1 版 1 刷	1958	108100
高級中學中國歷史第三冊鄉土教材	高中	1 版 1 刷	1958	28100
初級中學適用上海市鄉土地理教材	初中	1 版 1 刷	1960	92150
高級小學適用上海市鄉土地理教材	高小	1 版 1 刷	1958	90245
高級小學適用上海市地理鄉土教	高小	4 版 5 刷	1961	740405

材				
高級小學適用上海市鄉土地理教材	高小	5 版 6 刷	1962	934405
高級小學適用上海市鄉土地理教材	高小	5 版 7 刷	1963	不明
高級中學中國歷史第三冊鄉土教材	高中	1 版 1 刷	1958	28100
高級中學適用上海市鄉土地理教材	高中	1 版 1 刷	1959	23660

表格 2 1949-1963 年間上海市普通中學學生和專任教師人數²⁶⁷

年	普通中學在學生（萬人）	專任教師（萬人）
1949	9.73	0.52
1950	10.54	0.45
1951	11.82	0.47
1952	17.10	0.57
1953	19.17	0.63

²⁶⁷ 雖然原始資料中未區分普通中學是否包括初級中學，但該表格中，普通中學與中等專業學校並列，應可判斷為普通高級中學，資料來源：上海教育學院，《上海市中等教育發展統計指標 1949-1985》（出版者不詳，1986，第 1 版），頁 29-30



1954	23.14	0.80
1955	25.91	0.85
1956	33.26	1.20
1957	36.73	1.46
1958	39.32	1.51
1959	37.02	1.55
1960	38.85	1.66
1961	38.62	1.82
1962	44.65	2.05
1963	49.92	2.35

表格 3 1958 年上海市高小歷史鄉土教材教學進度²⁶⁸

課題	鄉土教材	附註
中國軍民反侵略鬥爭	吳淞口抗英鬥爭、陳化成英勇犧牲，城隍廟中的形象	第二課最後，加註〈吳淞口抗英鬥爭〉，進行講述

²⁶⁸ 上海市教育局教學研究室，〈高小歷史第三冊增編上海鄉土教材幾個問題的說明〉，《上海教育》第 13 卷（1958），頁 19-23

太平天國	上海小刀會起義	第五課最後，加添〈上海小刀會起義〉一節教材，進行講授
太平天國革命的失敗	李秀成的三次進攻上海	結合第七課〈李秀成和陳玉成〉一節教學，做詳細講述
中國機器工業的產生	上海最早的外商工廠及最早民族工業發生的情況	結合第九課〈洋務運動〉及〈民族工業的發展〉兩節教學，具體講述
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上海工人階級初期的罷工鬥爭	結合第廿一課〈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一節教學，具體講述

表格 4 1958 年上海市高中鄉土歷史教學進度²⁶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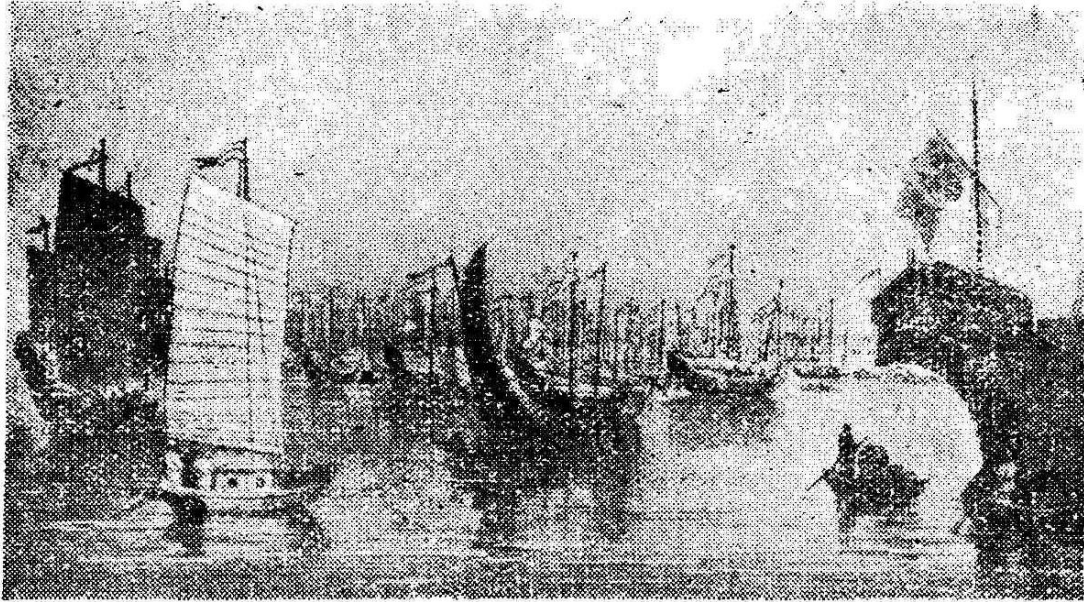
章節目錄	鄉土教材	附註
第一章 鴉片戰爭	增編〈鴉片戰爭前後的上海〉一節，內容包括〈上海所屬三縣的沿革〉、〈鴉片戰爭前夕英人對上海的窺探〉、〈租界的成立與買辦階級的出現〉	插入第三節〈鴉片戰爭的影響〉後面，原課本第四節改為第五節
第二章 太平天國的革命運動	增編〈太平天國革命運動時期上海人民的鬥爭〉一節。內容包括：〈上海小刀會起義〉、〈太平軍第三次進攻上海〉	插入第四節〈太平天國後期的鬥爭〉後面，原課本第五節改為第六節
第四章 洋務運動	增編〈上海租界的擴大與畸形	插入〈海關自主權的喪失〉一目後面。原課本

²⁶⁹ 上海市檔案館，〈B105-7-363〉（上海市：上海市教育局教學研究室，1958）

中國無產階級和資本階級的產生	發展的開始〉一目	第二目改為第三目
第五章 中法戰爭 中日戰爭	增編〈上海市民反對拆除四明公所的鬥爭〉一目	插入第三節〈改良主義思想的醞釀〉後面
第七章 義和團運動	增編〈1897年上海小車工人抗捐鬥爭〉一目	插入〈義和團運動〉一目的前面
第八章 辛亥革命	增編〈辛亥革命時期上海人民的鬥爭〉一節。內容包括：〈資產階級在上海的初步活動〉、〈1905年上海人民的反美蓋國運動〉、〈上海人民響應武昌起義〉	插入第三節〈辛亥革命〉後面
第十章 中國革命新時期的曙光	增編〈上海民族工業的發展和初期的工人罷工鬥爭〉一節，內容包括：〈上海民族工業的發展〉、〈上海人民的抵制日貨運動〉、〈上海工人階級的自發罷工鬥爭〉	插入第一節〈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進一步發展〉後面，原課本第二節改為第三節

圖 1 開埠前的上海²⁷⁰

這張高中歷史鄉土教材中採用的圖片以河岸上眾多中式傳統船隻試圖傳達給學生上海的繁榮不是因為外國租界造成的，而正是因為這些傳統船舶疏於防備，才給了帝國主義者窺探中國的機會



开埠前上海港口的繁荣

侵略的野心。他們甚至还探測了長江和黄浦江的水道，为日后的侵略战争，作好了准备工作。

²⁷⁰ 上海市教育局，《高級中學中國歷史第三冊鄉土教材》（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58），頁 4

圖 2 解放後的黃浦公園與外灘的形象²⁷¹

本圖擷取自 1961 年上海市高中適用的地理鄉土教材，在大躍進期間的鄉土教材中，外灘幾乎沒有以大篇幅圖像的方式出現過，歷史教材更是沒有相關圖像。這張圖拍攝的角度從 1949 年後上海市政府後大力整建的外灘公園往外灘拍去，下面的圖說文字則提到經過解放後對外灘的整建，外灘顯得「分外美麗、雄偉」，而這也與其過去做為帝國主義跳板的形象不同



圖 1 上海市外灘一角——黃浦江和蘇州河在上海市外灘黃浦公園附近會合。解放前，上海市外灘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跳板。解放後，經過綠化整修，現在已經是綠草如茵，鮮花似錦，顯得分外美麗、雄偉。

²⁷¹ 上海市教育局，《中等學校適用 上海市鄉土地理教材》（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61），扉頁 圖 1

圖 3 大鬧洋場²⁷²

這是高中歷史鄉土教材中一張頗為傳神的配圖，帝國主義的形象在化身為西式鐵殼船（右上角）與岸上的巡捕。〈大鬧洋場〉出自清末《點石齋畫報》報導上海小車伏罷工的情節，在圖說文字中為了平衡報導，提到罷工車夫勸阻不按秩序的鬧事者，但在圖中完全是租界巡捕與中國車夫的對立，在圖畫中車夫則把巡捕打的人仰馬翻，但是在課本引用這張圖片時，由於文字部分被縮小到無法閱讀的程度，只能作為課本描述「帝國主義被上海工人打得狼狽不堪」的配圖。帶有時代感的插圖就成了租界中帝國主義者跋扈的樣貌與中國人民的反抗，或許也能讓我們想到本文最初的引文中提到的「永恆的符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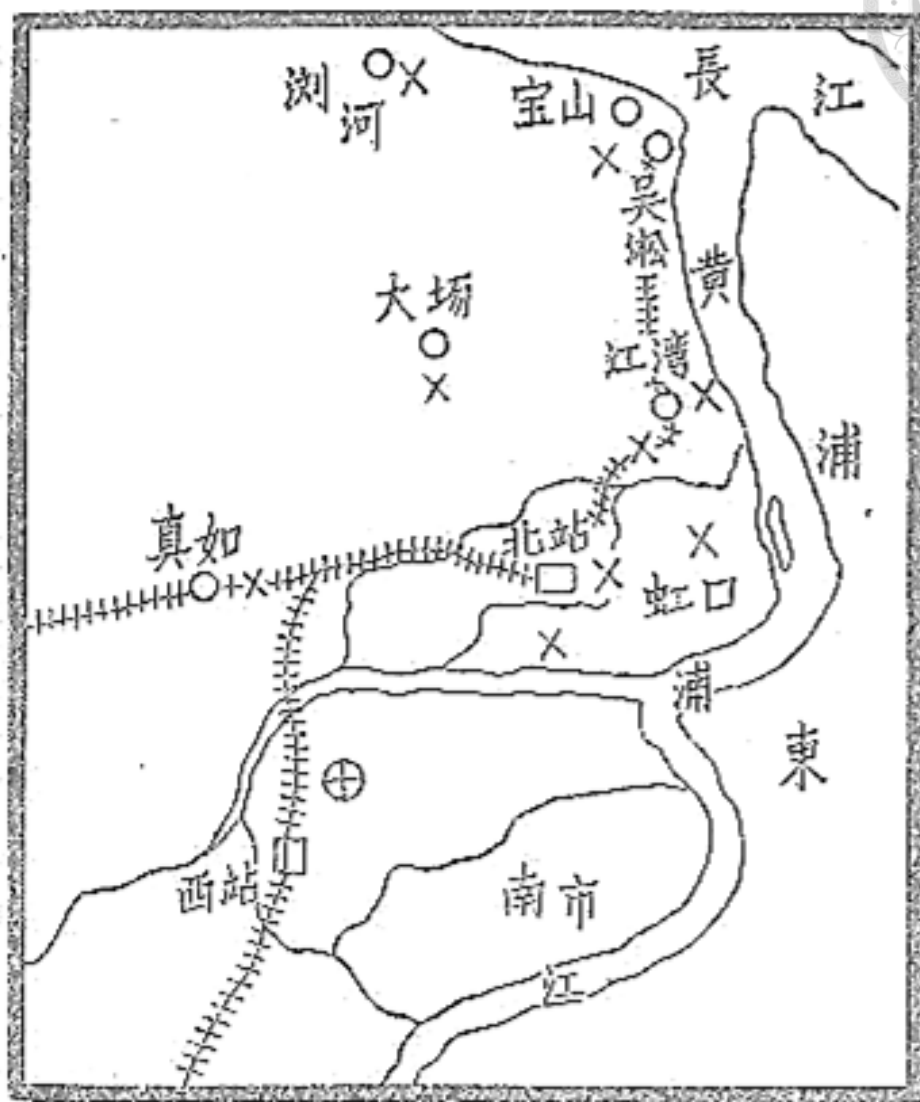


大鬧洋場

射击。帝国主义虽然凶殘，但仍然被英勇的小車工人打得人翻馬仰，狼狽不堪。帝国主义和清朝官吏懼于小車工人聲勢，不得

²⁷² 上海市教育局，《高級中學中國歷史第三冊鄉土教材》（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58），頁 16

圖 4 一二八淞滬戰爭的教學示意圖²⁷³



這張圖雖然只是簡單的表示一二八淞滬戰爭各方戰場的所在位置，但請注意圖中上海西站旁邊的十字圖示，該圖示表示正在教學此圖的該校在上海的所在位置，在引用的教學指導中提到學童看到這個「掌握了鄉土教材特色」的圖示會相當興奮的指出「這兒是我們的學校！」，如此一來學生透過這一個十字符號穿越了時空，感受自己正在參與這場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戰爭，或許我們可以回想在本文一開始引用的那段小短文中，虛構的地理學家對於地圖的看法

²⁷³ 林逸，〈歷史教學中鄉土教材的應用〉，《歷史教學問題》（1958），頁 43

第二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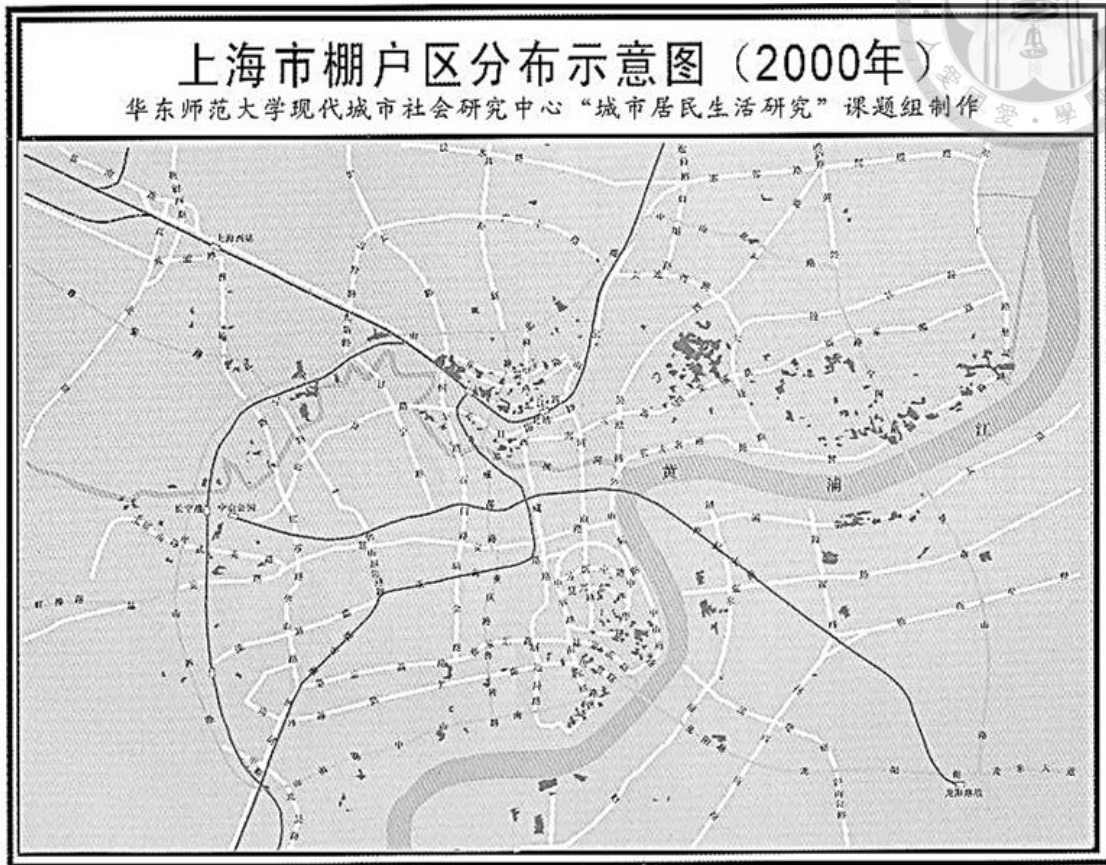
圖 5 1949 年之前上海棚戶區的分布



本圖為上海社會科學院於 1960 年代初進行棚戶區社會調查時所繪製的分布圖，可以看出棚戶區大致的位置分布在租界外圍，打點的區域即為棚戶區所在位置²⁷⁴

²⁷⁴ 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城市經濟組，《上海棚戶區的變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第 2 版），頁 8-9 間夾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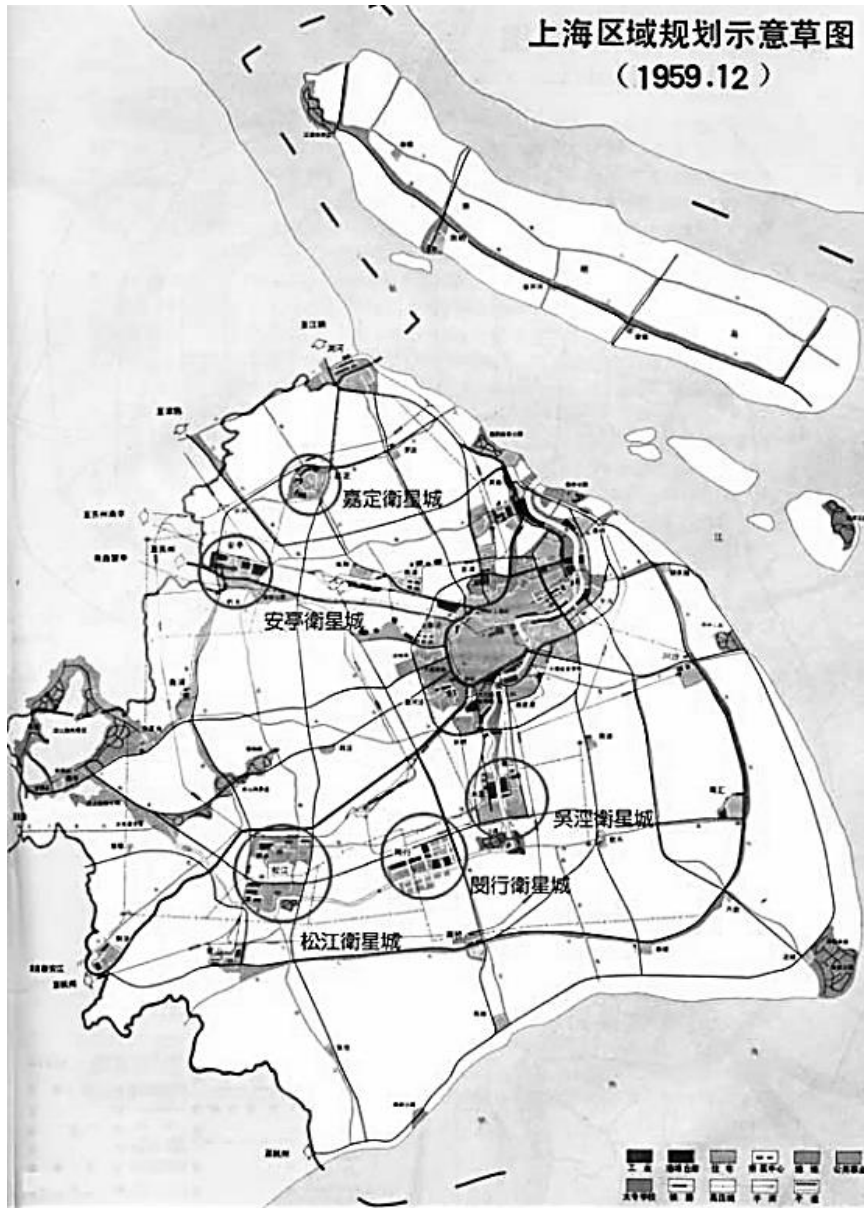
圖 6 2000 年時上海棚戶區的分布



本圖為華東師範大學近年來針對上海市棚戶區重新調查所繪製的分布情形，棚戶區的消失在實質上與改革開放後上海城市性質轉變為金融資本為主，高昂的土地租金成本與新興居民讓上海城區中的棚戶逐漸移出，不過大致上的分布點（黑點部分）仍能和過去的棚戶區位置相符²⁷⁵

²⁷⁵ 陳映芳，《棚戶區：記憶中的生活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扉頁 2

圖 7 1959 年上海市的區域規劃



本圖為上海市 1959 年區域規劃的示意圖，可以看出周邊的衛星市鎮和建成區的位置²⁷⁶

²⁷⁶ 林岳震、郭奇正，〈解放後至改革開放前上海城郊的社會主義營造過程〉（東海大學，2005），頁 20

圖 8 1960 年的蕃瓜弄棚戶區²⁷⁷



1963 年蕃瓜弄棚戶區開始整頓，居民搬遷至新的小區生活，在這期間，蕃瓜弄以居委會和黨組織重新治理的成果甚至成為上海市接待外賓時的範本。²⁷⁸此外，由於政府經費問題，蕃瓜弄在此前一直維持自接水電的模式

²⁷⁷ 上海市檔案館，〈H1-11-6-42〉（出版者不詳，1963）

²⁷⁸ 上海市檔案館，〈B105-7-1145-11〉（上海市：上海市教育局接待辦公室，1961）

圖 9 上海棚戶區的空間改造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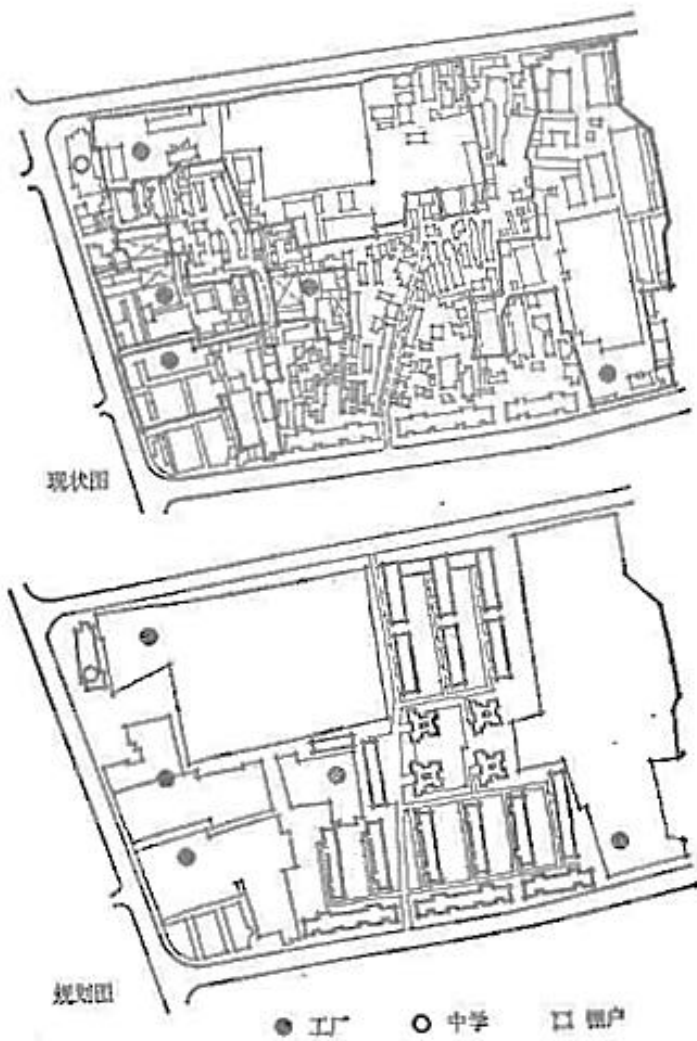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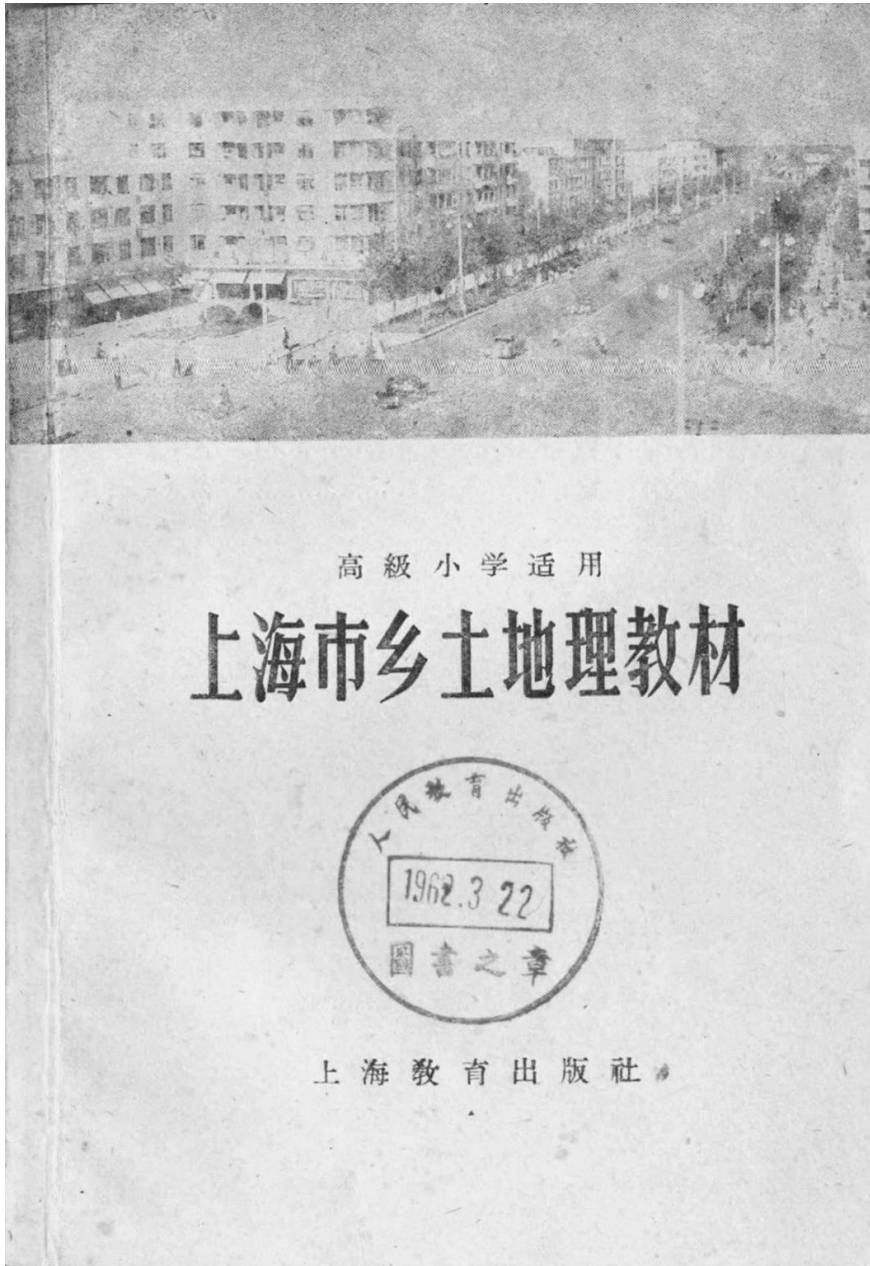
图 7-1-41 上海某旧街坊集中成片改建规划图

本圖為成片改造的示意圖，在不調整工廠位置的情況下，將原先複雜的鄰里整頓後則規劃成整齊的小區（黑點為工廠、白點為中學、第一張圖中多數的矩形區塊則為棚户）²⁷⁹

²⁷⁹ 国家城市建设总局城市规划局城市规划手册编写组，《城市规划资料集》（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2），頁 1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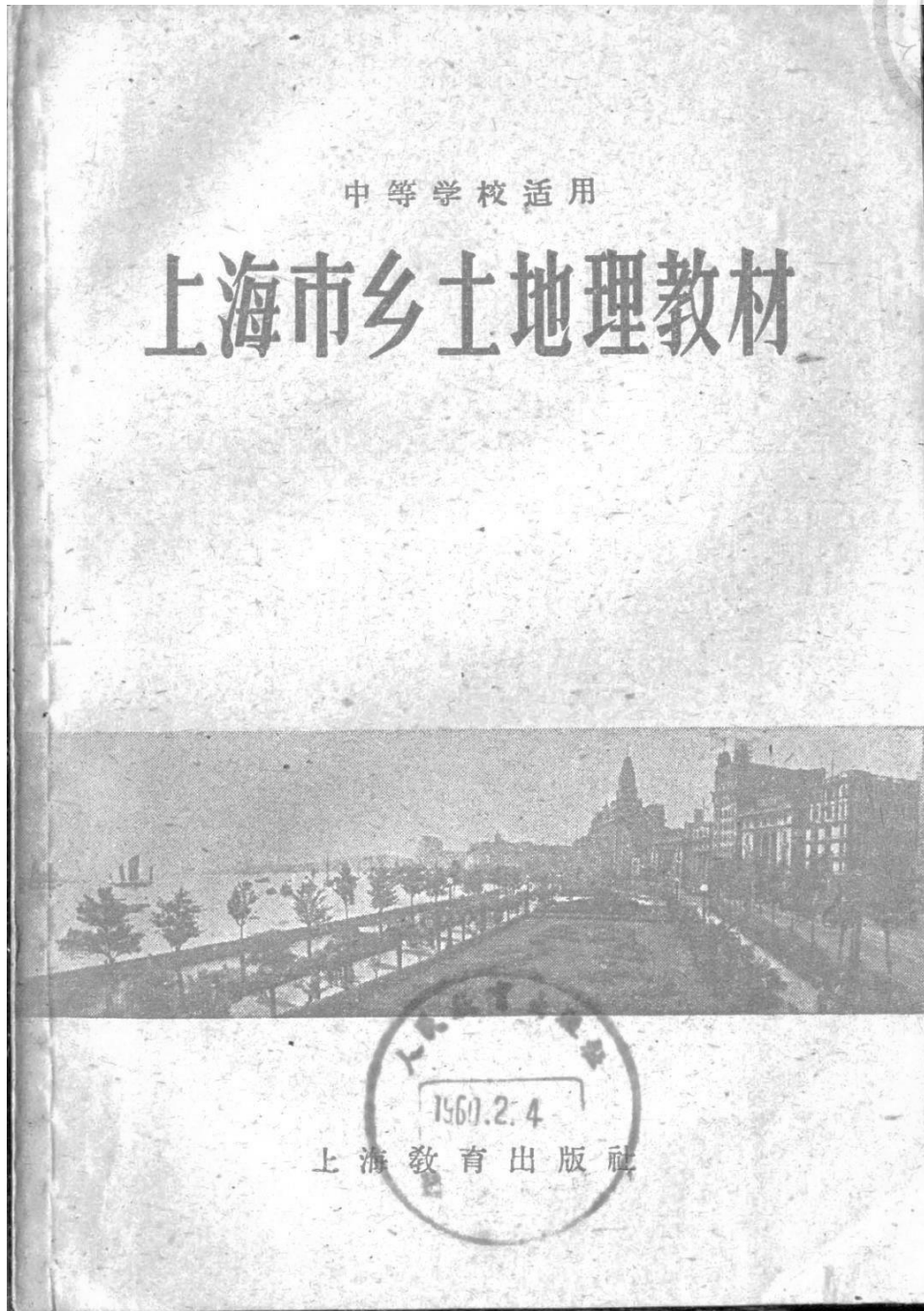
圖 10 1962 年上海市高級小學適用地理課本



1962 年上海市高小鄉土教材，封面圖為閔行一條街，是當時最新的市政建設，同樣的照片在 1961 年版中學適用的鄉土教材中也曾出現²⁸⁰

²⁸⁰ 上海市教育局，《高級小學適用 上海市鄉土地理教材》（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62），封面

圖 11 1961 年中等學校適用上海市鄉土地理教材



圖為 1961 年版中等學校適用的鄉土教材，封面圖為外灘與整頓後的綠地²⁸¹

²⁸¹ 上海市教育局，《中等學校適用 上海市鄉土地理教材》（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61），封面

圖 12 肇嘉濱的轉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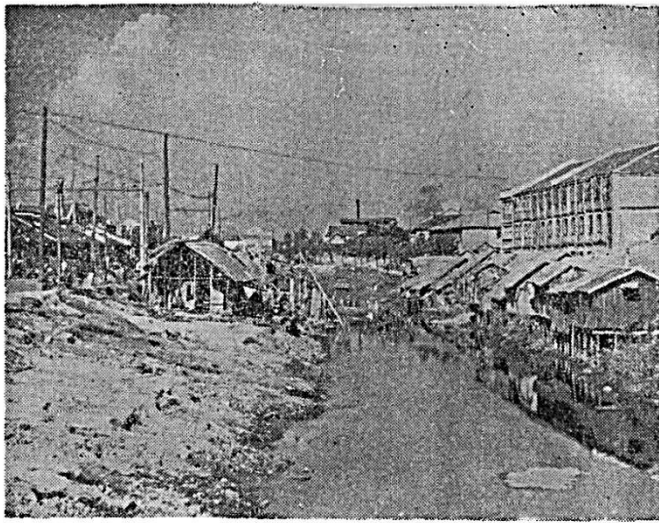


图7 未填沒以前的臭水沟——肇嘉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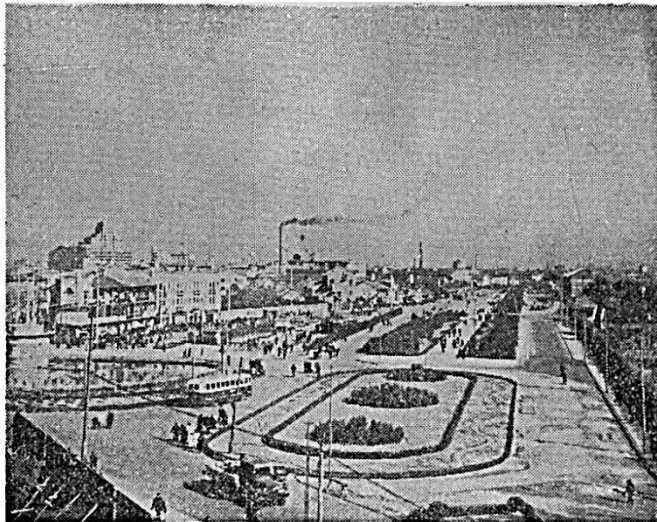


图8 今天的林蔭大道——肇嘉浜路

肇嘉浜的轉變（上圖為「整治前」，下圖為「整治後」）在各類討論棚戶與市政建設的書籍中屢見不鮮，同時也是第一個五年計畫下重要的市政工程，因此在1959年的鄉土教材中提供了轉變的影像說明²⁸²

²⁸² 上海市教育局，《高級中學適用 上海市鄉土地理教材》（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59），照片頁

圖 13 上海工人辛勤工作的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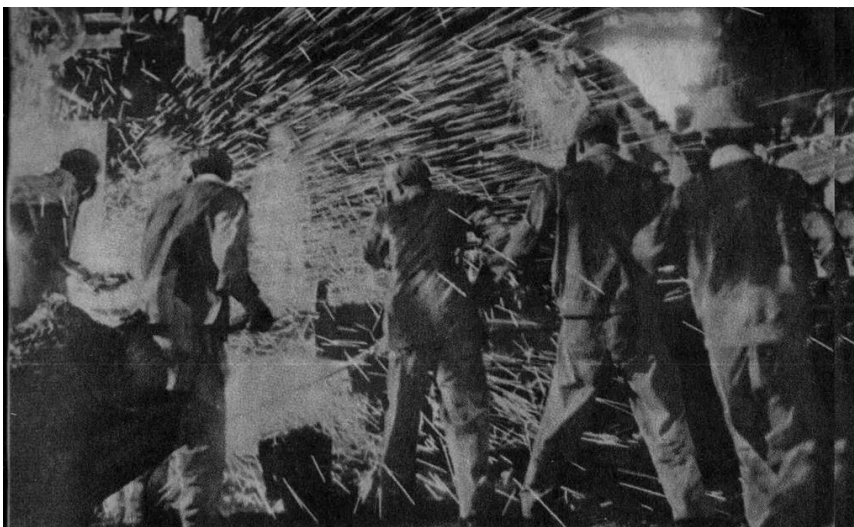


图 1 上海第一鋼鐵厂轉炉車間工人在炼鋼

图 2 上海汽輪机厂的汽輪机車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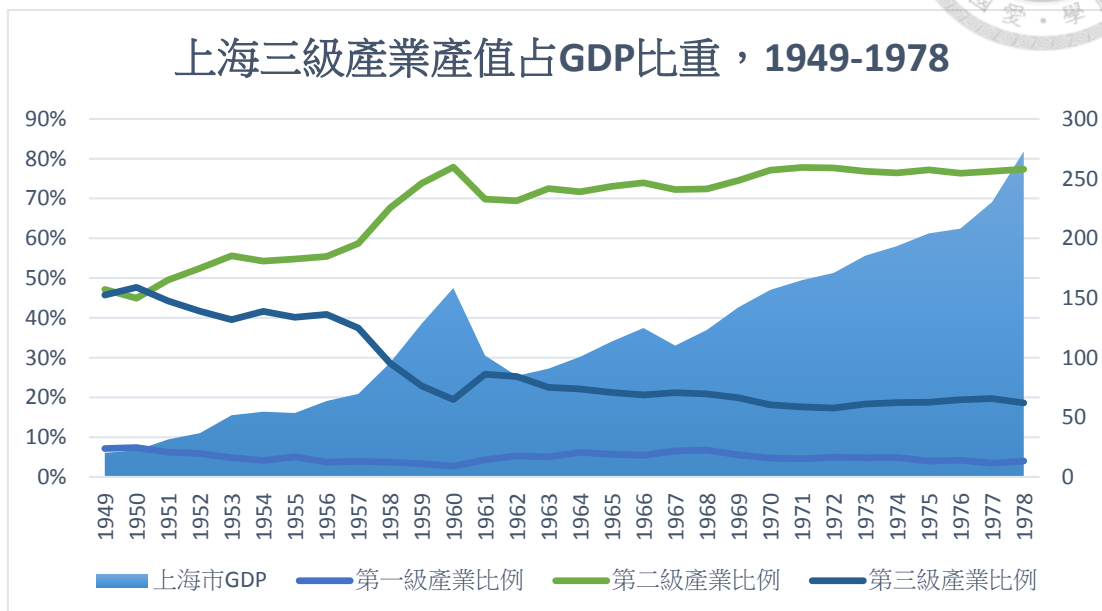
上海工人在工廠中辛勤工作的形象，下圖窗明几淨的工廠環境也符合課本中對解放後工人勞動環境的改變，上圖也說明了工人操作生產設備，成為社會的主人²⁸³

²⁸³ 上海市教育局，《高級中學適用 上海市鄉土地理教材》（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59），照片頁

第三章




圖表 1 1949-1978 間上海市三級產業占 GDP 比重²⁸⁴



1949 年之後上海的三級產業變化深受計畫經濟影響，尤其在大躍進時期上海建立了許多重工業基地，以上圖表可以看出該時期為二級產業高速擴張的時代

²⁸⁴ 資料來源：上海市統計局，《上海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歷史統計資料（1949-2000）》（上海市：中國統計出版社，2001，第1版），頁 8-11

表格 5 1958-1962 間上海市高小與初中升學率²⁸⁵



	年分	市區升學率	郊縣升學率
高小升學率	1958	97	117
	1959	98	88
	1960	91	78
	1961	91	61
	1962	87	57
初中升學率	1958	82	54
	1959	96	60
	1960	93	75
	1961	72	31
	1962	66	31

²⁸⁵ 呂型偉，〈上海普通教育史〉，呂型偉編（上海市：上海教育出版社，1994，第1版）

圖 14 老工人的形象²⁸⁶



勞動可能是為自己的，也可能是公益的，老工人在學生背後的出現展示了一種傳承，這不僅是文宣上的意義，在各校的勤工儉學紀錄中也提到學生混合編入工廠車間接受工人指導。

²⁸⁶ 上海市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展覽會編，《青年學生在勞動中躍進》（上海市：上海教育出版社，1958，第1版），頁49

圖 15 學生支援基礎建設：清汙²⁸⁷



大躍進期間正是上海市政府透過二五計畫的經費清理轄下棚戶區的時期，學生在老師的指揮下參與市政工程（並認為將棚戶區改造為公園對人民以及學生有利的），除了形諸於文字上的棚戶區外，學生也在勞動中認識了社會底層。

²⁸⁷ 上海市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展覽會編，《青年學生在勞動中躍進》（上海市：上海教育出版社，1958，第1版），頁43

圖 16 學生參與建築工地生產勞動²⁸⁸



這張可能拍攝於 1959 年解放台灣宣傳工作展覽會（1959-1962 間上海舉辦過多次這類活動）的照片中，風起雲湧的學生參與生產勞動也入鏡，顯示學生在地方政府的教育下支援國家計畫的形象。

²⁸⁸ 上海市檔案館，〈H1-15-10-5〉（出版者不詳，1959）

表格 6 1959-1963 間上海市區與郊區學生人數與勞動力折算²⁸⁹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16 歲以上 (萬人)	學生折合勞動力比例 (%)	16 歲以上 (萬人)	學生折合勞動力比例 (%)	16 歲以上 (萬人)	學生折合勞動力比例 (%)	16 歲以上 (萬人)	學生折合勞動力比例 (%)	16 歲以上 (萬人)	學生折合勞動力比例 (%)
中小學	7.38	1.50%	8.5	1.60%	10.14	2%	12	2.70%	13.15	3%
中專	3.97	0.30%	1.4	0.50%	6.2	0.55%	6.6	0.60%	6.8	0.60%
高校	5.59	0.40%	6.4	0.40%	7.04	0.45%	7.5	0.50%	8	0.50%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16 歲以上 (萬人)	學生折合勞動力比例 (%)	16 歲以上 (萬人)	學生折合勞動力比例 (%)	16 歲以上 (萬人)	學生折合勞動力比例 (%)	16 歲以上 (萬人)	學生折合勞動力比例 (%)	16 歲以上 (萬人)	學生折合勞動力比例 (%)
小學	0.72	2.96%	0.32	3.30%	0.5	4.12%	0.74	5.13%	0.78	5.61%
初中	2.81	3.45%	3.25	4.10%	3.63	5.35%	4.42	6.68%	5.32	8.17%
農中	0.94	1.39%	1.15	1.70%	1.01	1.99%	1.51	2.94%	2.05	4%
高中	1.67	0.52%	1.78	0.60%	2.04	0.66%	2.12	0.69%	2.17	0.70%
中專	0.5	0.16%	1.04	0.30%	1.06	0.40%	1.26	0.48%	1.45	0.55%

在這份 1960 年底上海市教育局的檔案中我們可以看到上海市區與郊區的學生人數，以其中可以充當勞動力的 16 歲以上學生比例來看的話，郊區學校，尤其是農業中學能提供的勞動力遠勝於市區學校數倍
 上表為市區學校，下表為郊區學校。

²⁸⁹ 上海市檔案館，〈B105-2-268-2〉（上海市：上海市教育局，1960）



圖 17 學生下鄉勞動²⁹⁰



這張拍攝時間不詳的照片是常見的學生支援農村形象，在教師的帶領下，學生接受老農的指導協助農作，並與老農晤談了解農村的實際情況，在大躍進時期尤其重要的是認識農村生產合作化的重要性，這類照片構圖的方式和前面幾張學生支援工業都有類似的手法：學生一定得接受工農領導進行勞動。

²⁹⁰ 秦風老照片館編，《上海製造：1950-1960年代》（桂林市：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第1版），頁98



圖 18 農民中學的形象²⁹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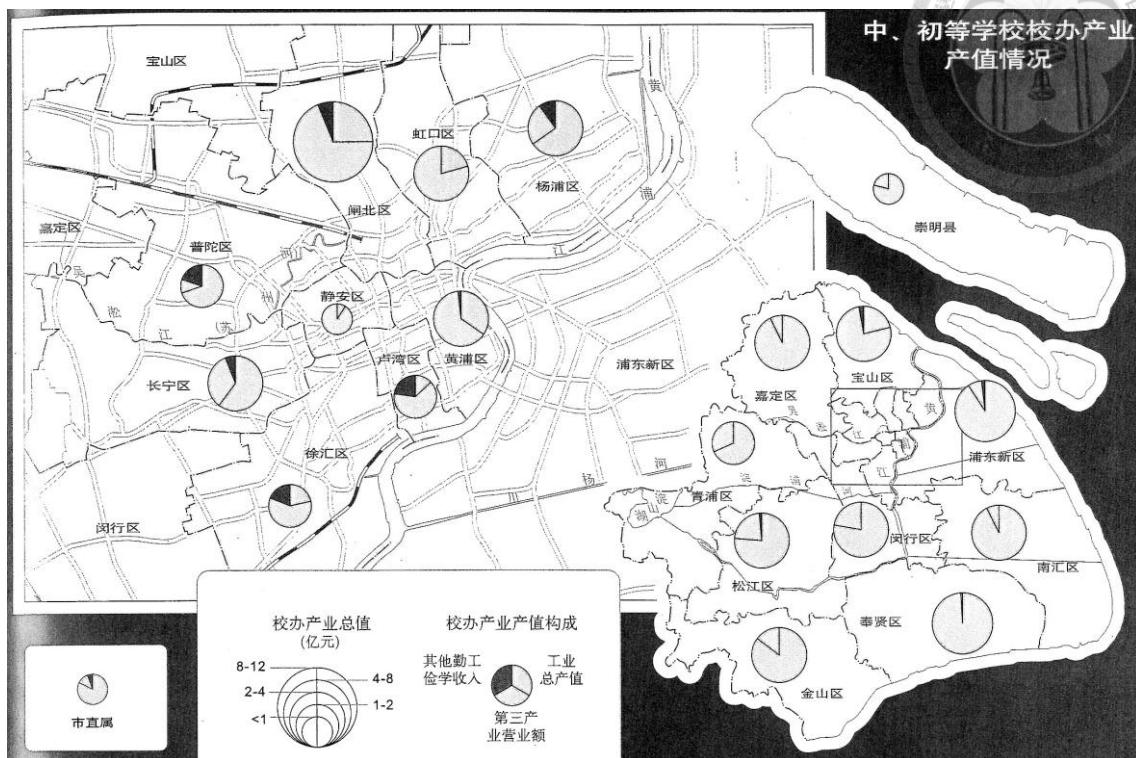


大躍進期間農業中學負擔多項任務，除教育農村子弟外，以教師的名義下放城市幹部，並且鼓勵學生到城市學習新技術再帶入農村都是政府賦予它的生產任務，上圖為學生參觀新作物，下圖為下放幹部擔任教師傳達農業知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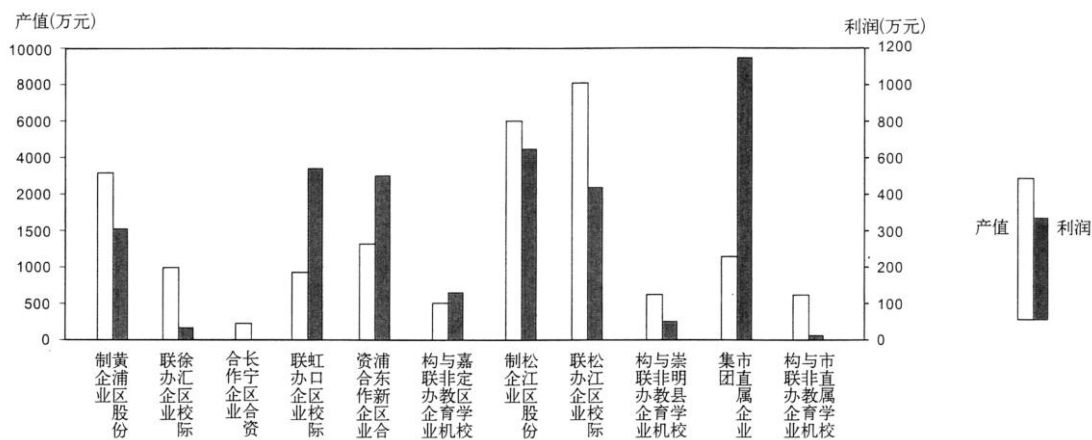
²⁹¹ 上圖：陳根寶，〈上海市農業中學一年級學生在上海農業試驗站辣椒田裡參觀，了解新品種的生長情況〉，《文匯報》（1958/08/15）下圖：尚凡，〈下放幹部，農業中學的骨幹〉，《文匯報》（1958/06/22）



圖 19 2000 年時上海市各級學校校辦產業產值與比例分配²⁹²



中、初等學校各性質校辦產業產值與利潤



在 1950 年代勤工儉學運動之後，各校都保有大量的工廠，加上 1980 年代開始的市場化風潮，學校育成、技術或人力移轉蔚為風行，這也就形成當代中國學校中龐大的校辦企業體系，不過與 1950 年代的情況類似，這類企業首先得面對的就是校企間的經費劃分或人事任命問題

²⁹² 《上海市教育地圖集》編纂委員會編，《上海市教育地圖集》（上海市：中國地圖出版社，2003，第 1 版），頁 33-34

授權條款




本授權條款係依據 CC 3.0 台灣授權條款之規定，可參考：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3.0/tw/legalcode>

本著作（定義如下）係依據本「創用 CC 公眾授權條款」（Creative Commons Public License, 簡稱 CCPL 或「授權條款」）提供。本著作受到著作權法以及（或）其他相關法律的保護。禁止任何未經本條款授權或著作權法許可對本著作的使用。

當行使本授權條款就本著作所提供之任何權利時，您承諾並同意受本授權條款之拘束。如本授權條款被認為是契約時，您對這些條款及條件的承諾，是授權人授與您此處所定權利的前提。

1. 定義

- A. 「改用作品」指基於本著作，或基於本著作與其他先前存在之創作而來的著作，例如翻譯、修改、衍生著作、編曲或其他文學或藝術創作的變更、或錄音物或表演及視聽的修改，或以任何其他形式對本著作的角色變更、變形、修改，包含任何可辨認為源自原件的修改形式；但該著作如構成彙編時，則不屬於本授權條款目的下之改用作品。為避免疑義，為本授權條款之目的，當本著作是音樂著作、表演或錄音物時，將本著作依時間序列關係附著於動態影像之創作，視為改用作品。
- B. 「彙編」指文學或藝術創作的合集，例如百科全書及詩文選集，表演、錄音物或廣播，或除列舉於後述第 1 條第(h)項所列之著作以外的其他著作或保護標的。由於其內容之選擇與編排具有智慧創作性，且本著作於其中是以未經修改的完整形式，與一個或更多的作品，彼此間成為分離且獨立之著作，而共同彙集成的完整合集。為本授權條款之目的，構成彙編的著作，不會被視為改用作品（定義如上）。
- C. 「Creative Commons 相容授權條款」指
<http://creativecommons.org/compatiblelicenses> 所列經 Creative Commons 認可、實質上與本授權條款相當的授權條款，此乃因為該授權條款至少：(i) 包含和本授權條款之授權要素具有相同之目的、意義及效力之條款；及(ii)明示其所提供之衍生著作，依據本授權條款或與本授權條款具有相同授權要素的尚未本地化(unported)或其他司法管轄領域之創用 CC 授權條款，可再為授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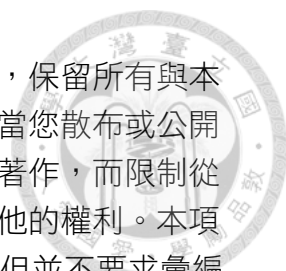
- 
- D. 「散布」指在適當情況下，藉銷售或其他移轉所有權的方法，向公眾提供本著作或改用作品之原件及重製物。
- E. 「授權要素」指下列由授權人所選擇並標示在本授權條款標題的高層次授權屬性：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 F. 「授權人」指依據本授權條款提供本著作之個人或單位。
- G. 「原始著作人」指就文學或藝術創作而言，創作本著作之個人或單位；若無法辨識創作本著作之個人或單位，則指發行人；此外，(i)就表演而言，指演員、歌唱家、音樂家、舞蹈家以及表演、唱歌、演說、朗誦、演奏、表現、或以其他方式表演文學或藝術創作或民俗創作作品的其他人員；(ii)就錄音物而言，指製作人，即首次將表演的聲音或其他聲音固著於錄音物之自然人或法人。
- H. 「本著作」指依據本授權條款提供的文學及（或）藝術創作，包含但不限於以任何方式或形式（包含以數位形式）表達之文學、科學及藝術範圍之製作物，例如：書籍、小手冊及其他撰著；演講、演說、佈道及其他類似同性質之著作；戲劇著作或歌劇著作；舞蹈著作或默劇；含歌詞或不含歌詞之音樂作曲；電影著作及其他藉由與電影攝影技術類似之程序表達之同類著作；素描、繪畫、建築、雕塑、雕刻或版畫之著作；攝影著作及其他藉由與攝影技術類似之程序表達之同類著作；應用藝術著作；插圖、地圖、設計圖、草圖及地理、地形、建築或科學相關立體著作；表演；廣播；錄音物；和可受著作權保護的資料編輯；或不屬於文學或藝術創作的各式表演人或馬戲團表演人所表演的創作。
- I. 「您」指先前並未就本著作違反本授權條款，或曾違反本授權條款但已獲得授權人明示之許可得依據本授權條款行使權利，而依據本授權條款行使權利之個人或單位。
- J. 「公開演播」指公開口述本著作，及以任何方法或程序，包含以有線電、無線電或公開數位演播之方式，向公眾傳達上述公開口述內容；或以使公眾得從其各自選定之地點接收本著作之方式，向公眾提供本著作；或以任何方法或程序，包含公開數位演播之方式，對公眾演播本著作，及向公眾傳達上述演播內；或藉任何包含符號、聲音或影像之方式公開播送及再公開播送本著作。上述定義，包含但不限於我國著作權法所定義之「公開展示」、「公開演出」、「公開上映」、「公開播送」、「公開傳輸」及「公開口述」等。
- K. 「重製」指以印刷、複印、錄音、錄影、攝影、筆錄或其他方法直

接、間接、永久或暫時之重複製作。於劇本、音樂著作或其他類似著作演出或播送時予以錄音或錄影；或依建築設計或建築模型建造建築物者，亦屬之。

2. 合理使用權。本授權條款無意減少、限制或約束任何和著作權無關的使用或依據著作權法或其他相關法律，得主張著作權保護限制或例外之權利。
3. 授權。根據本授權條款之條款及條件，授權人授與您全球、免權利金、非專屬、永久的（在著作權存續期間內）許可，就本著作行使如下述之權利：
 - A. 重製本著作、將本著作收錄於一個或多個彙編之中、以及當收錄於彙編時重製本著作；
 - B. 創作及重製改用作品，惟任何這類改用作品，包含任何媒介中的譯本，需採取合理方式清楚標示、區分或以其他方法指明本著作之原始版本已被變更。例如，翻譯時可標記「原著作已由英文翻譯成西班牙文」，或修改的地方可以標示「原著作已被修改」；
 - C. 散布及公開演播本著作（包含收錄於彙編中之本著作）；及
 - D. 散布及公開演播改用作品。
 - E. 為避免疑義：
授權人拋棄由個人，或當授權人是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或稱為「著作權仲介團體」）的會員的情況下，透過該集體管理團體，向您收取權利金的權利。但是，在前述授權人是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的會員的情況下，授權人能否拋棄上述權利，須視授權人與該集體管理團體所訂立的管理契約而定。

上述權利可以在所有不論已知或將來被發明出來之媒體以及格式上行使。上述權利包含為了在其他媒體以及格式上行使權利而作技術上必要修改的權利。所有未經授權人明示授與的權利，於此加以保留。

4. 限制。第 3 條所授與之權利，需受到下述條款明確的限制及拘束：
 - A. 唯有在遵守本授權條款的情況下，您方得散布或公開演播本著作。您必須在您散布或公開演播的每份重製物上，附上本授權條款複本或「統一資源識別符」(Uniform Resource Identifier)。您不得就本著作提出或加入任何條款，而限制本授權條款、或限制本著作的接受者行使依本授權條款所授與他的權利。您不得對本著作再授權。您



必須在您散布或公開演播的每份本著作的重製物上，保留所有與本授權條款有關的注意事項以及免除保證責任聲明。當您散布或公開演播本著作，您不得使用任何有效的科技措施於本著作，而限制從您取得本著作的接受者，行使依本授權條款所授與他的權利。本項（第 4 條第(a)項）適用於被收錄在彙編的本著作，但並不要求彙編在本著作以外的部分也適用本授權條款。若您創作彙編，則應在收到任一授權人通知時，於實際可行的範圍內，依其要求移除彙編中，如第 4 條第(c)項所定對於原始著作人及／或其指定第三人的表彰。若您創作改用作品，則應在收到任一授權人通知時，於實際可行的範圍內，依其要求移除改用作品中，如第 4 條第(c)項所定對於原始著作人及／或其指定第三人的表彰。

- B. 您唯有遵守以下各款，方得散布或公開演播改用作品：(i) 本授權條款；(ii) 與本授權條款具有相同授權要素的後續版本；(iii) 與本授權條款具有相同授權要素（的此版本或後續版本）之尚未本地化 (unported) 或任一司法管轄領域之創用 CC 公眾授權條款（例如「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3.0 美國」版）；您必須在您散布或公開演播的每份改用作品的重製物上，附上「可適用的授權條款」複本或統一資源識別符 (Uniform Resource Identifier)。您不得就改用作品提出或加入任何條款，而限制「可適用的授權條款」、或限制改用作品的接受者行使依「可適用的授權條款」所授與他的權利。您必須在您散布或公開演播的包含於改用作品中的每份本著作的重製物上，保留所有與「可適用的授權條款」有關的注意事項以及免除保證責任聲明。當您散布或公開演播改用作品，您不得使用任何有效的科技措施於改用作品，而限制從您取得改用作品的接受者，行使依「可適用的授權條款」所授與他的權利。本項（第 4 條第(b)項）適用於被收錄在彙編的改用作品，但並不要求彙編在改用作品以外的部分也適用「可適用的授權條款」。
- C. 若您散布或公開演播本著作、改用作品或彙編，除非有依據第 4 條第(a)項之要求，否則您必須保留本著作所有的著作權聲明，且依您所使用的媒介或工具適當地提供下列資訊：(i) 若有提供原始著作人姓名（或筆名），則您應提供之，且（或）若原始著作人及（或）授權人，在授權人的著作權聲明、使用條款或藉由其他合理方式指定第三人（例如，贊助機構、出版者、期刊）為姓名標示的對象（「姓名標示對象」），則您應提供該第三人的姓名；(ii) 本著作名稱；(iii) 在合理實際可行的範圍內，授權人所指定與本著作相關之統一資源識別符，除非該統一資源識別符並非連結至本著作的著作權聲明或

與關於本著作之授權資訊；及(iv) 若為改用作品，則比照第 3 條第 (b)項，必須註明在改用作品中使用了本著作（例如「原始著作人之本著作的法文譯本」、「依據原始著作人之原著作而改編的電影劇本」等）。本項（第 4 條第(c)項）所要求的表彰方式，可以任何合理的方法為之；但是在改用作品或彙編之情況，對改用作品或彙編全部有貢獻之作者若使用單一的表彰時，則本項所要求的表彰，最低程度應作為前述表彰之一部分，並至少與其他具有貢獻之作者的表彰方式同等明顯。當您依據本授權條款行使權利時，為避免疑義，除非另取得原始著作人、授權人及（或）姓名標示對象事前的書面同意，不然您僅得依本條上述所定之散布的目的來使用表彰，您不得默示或明示地主張或暗示，您本人或您對本著作之使用，與原始著作人、授權人及（或）姓名標示對象間有任何關聯、贊助或背書關係。

D. 「著作人格權」在相關法律認可的範圍內不受影響且係不可拋棄的。

5. 保證條款與免除責任聲明

除非由本授權條款之當事人相互以書面表示同意，且在準據法所允許之最大範圍內，否則授權人是以現狀之基礎提供本著作，授權人未聲明或提供關於本著作之任何保證，無論明示或默示，無論是否為法律所規定，包含但不限於任何有關本著作權利之擔保、可商業性、是否符合某特定之目的、未侵害他人權利、不具有潛在或其他之缺陷、正確性、或不論能否被發現之錯誤。有些司法管轄領域並不允許排除前述隱含保證，在此情況之下，前述之排除可能不適用於您。

6. 責任限制條款

除在相關法律所要求的範圍內，任何因本授權條款或本著作之使用所生之特殊的、附隨的、連帶的、懲罰性的、警告性的損害，授權人在法理上對您不負任何責任。縱授權人已經被告知發生此類損害的可能性時，亦同。

7. 終止條款

A. 若您違反本授權條款，本授權條款及其所授與之權利將自動終止。但依據本授權條款，而向您取得改用作品或彙編之個人或單位，若仍完全遵守該授權條款，則其取得之授權不會隨之終止。本授權條款第 1、2、5、6、7 及 8 條，不因本授權條款之終止而失效。

B. 除前述條款及條件另有規定外，在本著作著作權存續期間內，此處之授權係屬永久。但授權人保留依不同授權條款釋出本著作或隨時停止散布

本著作之權利，惟授權人的這類選擇，不得撤銷本授權條款（或任何其他依據本授權條款已授與或必須授與之授權），且本授權條款將會全部繼續有效，除非本授權條款依據上述規定而終止。



8. 其他事項

- A. 當您散布或公開演播本著作或彙編時，授權人以相同於本授權條款所授與您的條款及條件，授權予接受者對本著作的權利。
- B. 當您散布或公開演播本著作之改用作品時，授權人以相同於本授權條款所授與您的條款及條件，授權予接受者對本著作的權利。
- C. 若本授權條款之任何條文依相關法律係屬無效或無法執行，其餘條款之有效性或可執行性不受影響，此類條文應在使其有效及可執行最小必要範圍內自動修改，不需當事人採取其他作為。
- D. 除非系爭當事人書面同意並簽名，本授權條款之任何條款或條文，皆不得被視為拋棄，及被視為是不違反的協議。
- E. 本授權條款構成當事人關於授權本著作之全部協議。除此之外，並不存在任何有關本著作之認知、協議或表示。授權人不受任何出現在與您通訊間的附加條文所拘束。本授權條款未經授權人及您相互的書面同意，不得修改。

引用書目

英文書目



- Buck David D , “Policies Favoring the Growth of Smaller Urban Places in the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1949-1979” *Urban Development in Modern China* , Laurence J C Ma, Edward W Hanten ed. , pp. 114 – 146 Boulder,Colorado : Westview Press Inc. , 1981 1 ed.
- Burawoy Michael , *Manufacturing Consent : Changes in the Labor Process Under Monopoly Capitalism* Chicago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79
- , *The Politics of Production : Factory Regimes Under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 London : Verso , 1985
- Castells Manuel , “The New Histor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Space and Society” *Designing Cities: Critical Readings in Urban Design* , Alexander R Cuthbert ed. Oxford : Blackwell , 2003
- De Certeau Michel , “Walking in the City”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 pp. 91 – 110 Berkele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1984
- Ching May-bo , “Classifying Peoples: Ethnic Politics in Late Qing Native-Place Textbook and Gazetteers” *The Politics of Historical Production in Late Qing and Republican China* , Robert J Culp, Tze-ki Hon ed. , pp. 55 – 79 Boston : Leiden , 2007
- Cohen Paul A , *Speaking to History : the Story of King Goujian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Berkele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2009
- Cresswell Tim , *Place : A Short Introduction* Malden, MA : Blackwell Pub. , 2004
- Culp Robert Joseph , *Articulating Citizenship : Civic Education and Student Politics in Southeastern China, 1912-1940* Cambridge, MA : Distribut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2007
- Enyedi Gyorgy , “Urbanization Under Socialism” *Cities After Socialism* , Gregory Andrusz, Michael Harloe, Lvan Szelenyi ed. , pp. 100 – 119 Oxford : Blackwell , 1996

- 
- Evans Robin , “Rookeries and Model Dwellings” *Translations from Drawing to Building* , pp. 93 – 118 Cambridge, Mass. : MIT Press , 1997
- GueZarrow Peter , *After Empire : the Conceptu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State, 1885-1924* Stanford, California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12
- , “The New Schools and National Identity: Chinese History Textbooks in Late Qing” *The Politics of Historical Production in Late Qing and Republican China* , Robert J Culp, Tze-ki Hon ed. , pp. 21 – 55 Leiden,Boston : Brill , 2007
- Hall Peter , *Cities of Tomorrow: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Urban Planning and Desig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Oxford : Wiley-Blackwell , 2002 3 ed.
- Harvey David , *Paris, Capital of Modernity* New York : Routledge , 2003 第 1 版
- , *Rebel Cities: From the Right to the City to the Urban Revolution* New York : Verso , 2012 1ed.
- Hevia James Louis , *English Lessons : the Pedagogy of Imperialism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Hong Kong :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 2003
- Jacobs Jane , *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 New York : Vintage Books , 1963
- John Wylie , *Landscape* New York : Routledge , 2007 第 1 版
- Kwok R Yin-Wang , “Trends of Urban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in China” Laurence J C Ma, Edward W Hanten *Urban Development in Modern China* Boulder,Colorado : Westview PressInc , 1981
- Mittler Barbara , *A Newspaper for China?: Power, Identity, and Change in Shanghai’ s News Media, 1872-1912*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2004
- Murphey Rhoads , “Chinese Urbanization Under Mao” *Urbanization and Counterurbanization* , Brian J L Berry ed. , vol. 11 , pp. 311 – 334 London : Saga Publication Inc. , 1976 1 ed.
- Pannell Clifton W , “Recent Growth and Change in China’ s Urban System” Laurence J C Ma, Edward W Hanten *Urban Development in Modern China* Boulder,Colorado : Westview Press Inc. , 1981

Rodden John , *Textbook Reds: Schoolbooks, Ideology, and Eastern German Identity*
University Park, PA : Pennsylvania State Univ Press , 2006

Tuan Yi-fu , *Space and Place :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 London : Edward Arnold ,
1977

Urry John , *The Tourist Gaze* Thousand Oaks : Sage , 2002

Zukin Sharon , 《Landscapes of Power : From Detroit to Disney World》 Berkele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1993

——— , 《Naked City: The Death and Life of Authentic Urban Places》 Oxford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11 1ed.

中文書目

《上海市教育地圖集》編纂委員會編，《上海市教育地圖集》 上海市：中國地
圖出版社，2003 第1版

Burawoy Michael , 《製造甘願：壟斷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的歷史變遷》 臺北市：群
學出版社，2005

Dewey John , 《民主與教育》 台北市：網路與書，2006 第1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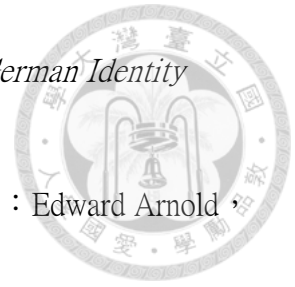
Fairbank John King、Roderick MacFarquhar ,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
上海市：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第1版


Fucault Michel , 《臨床醫學的誕生》 《近代思想圖書館系列》 臺北市：時報文
化，1994


Hall Peter Geoffrey. , 《明日之城：一部关于 20 世纪城市规划与设计的思想史》
童明 上海市：同濟大學出版社，2009

Harvey David , 《新自由主義化的空間 邁向不均地理發展理論》 《空間與都市研
究譯叢》 臺北市：群學，2008

——— , 《新帝國主義》 王志弘, 王玥民, 徐苔玲 台北市：群學出版社，2008



- 
- MacFarquhar Roderick,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石家莊市：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2 第 1 版
- Meisner Maurice, 《毛主義的誕生：中國共產革命之路》 台北市：衛城出版社, 2012 第 1 版
- Saiot-Exupery Antoine de, 《小王子》 陳建偉 上海市：東華大學出版社, 2006 第 1 版
- Urry John, 《觀光客的凝視》 國立編譯館, 葉浩 台北市：書林, 2010 第 1 版
- Walder Andrew G, 《共產黨社會的新傳統主義：中國工業中的工作環境和權力結構》 龔小夏 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1996 第 1 版
- Wood Denis, 《地圖權力學》 王志弘 台北：時報文化, 1996 第 1 版
- 丁云亮, 《阶级话语的叙述与表象：1950 年代上海工人之文化经验》 《博士文丛》 合肥市：安徽人民出版社, 2009
- 王志弘, 《文化治理與空間政治》 臺北市：群學出版社, 2011
- , 〈台北市文化治理的性質與轉變, 1967-2002〉 《臺灣社會研究》 第 52 期 (2003), 頁 121 - 186
- , 〈記憶再現體制的構作：臺北市官方城市書寫之分析〉 《中外文學》 第 393 期 (2005), 頁 9 - 52
- 吳海勇, 〈上海解放後都市空間重構進程中史蹟與紀念場所建設〉 《上海城市的發展與轉型》, 頁 325 - 335 上海市：上海書店出版社, 2009 第 1 版
- 呂型偉, 《上海普通教育史》 呂型偉 上海市：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4 第 1 版
- 李素梅、滕星, 〈中国百年乡土教材演变述评〉 《廣西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第 30, 第 1 期 (2008), 頁 49 - 55
- , 〈中國鄉土教材的百年嬗變及其文化功能考察〉 《教育學院》 中央民族大學, 2008
- 李進編, 《上海教育發展 60 年重大事件紀實》 上海市：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0 第 1 版

- 
- 李慶剛，《「大躍進」時期「教育革命」研究》 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0 第 1 版
- 卓情君、李仲漢，《中小學教育史》 《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專題史叢書》 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 第 1 版
- 周全華，《「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 廣州市：廣東教育出版社，1999 第 1 版
- 孟眉軍、林拓；〈上海市棚戶區空間變遷研究（1927 年一至今）〉 《城市與區域經濟系》 華東師範大學，2006
- 林岳震、郭奇正，〈解放後至改革開放前上海城郊的社會主義營造過程〉 東海大學，2005
- 林蘊暉，《向社會主義過渡：中國經濟與社會的轉型》 《中華人民共和國史》 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9 第 2 冊
- ，《烏托邦運動：從大躍進到大饑荒(1958-1961)》 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8 第 1 版
- 罗苏文，〈高郎桥：1914-1949 年沪东一个棉纺织工人生活区的形成（上）〉 《社會科學》 第 2005，第 12 期期（2005），頁 5 - 11
- ，〈高郎桥：1914-1949 年沪东一个棉纺织工人生活区的形成（下）〉 《社會科學》 第 2006，第 1 期期（2006），頁 41 - 49
- 洪長泰，《地標：北京的空間政治》 香港：牛津大學，2012 第 1 版
- ，《到民間去：1918-1937 年的中國知識分子與民間文學運動》 上海市：上海文藝出版社，1993 第 1 版
- ，《新文化史與中國政治》 臺北市：一方出版，2003 第 1 版
- 班紅娟、滕星，〈文化變遷中的河南鄉土教材研究〉 《教育學院》 中央民族大學，2010
- 秦風老照片館編，《上海製造：1950-1960 年代》 桂林市：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 第 1 版



高奇，《中国教育史研究》 陳學恂 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 第6冊
第1版

張禮永、郭軍，《共和国教育60年》 杜成憲 廣州市：廣東教育出版社，2009
第1冊 第1版

許紀霖、羅崗，《城市的記憶：上海文化的多元歷史傳統》 上海：上海書店出
版社，2011

郭奇正，〈城市危機與國家干預－上海公共租界集合住宅委員會設立的社會意義
初探〉 《都市與計劃》 第37，第2期期（2010），頁233－262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修訂版)》 《最近兩百年中國史》 台北市：聯
經，2001

陳映芳，《棚戶區：記憶中的生活史》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華攬洪，《重建中國：城市規劃三十年(1949-1979)》 北京市：生活·讀書·新知三
聯書店，2006

楊奎松，〈1952年上海「五反」運動之經過〉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史研
究》，第1冊，頁308－363 南昌市：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 第1版

———，〈上海鎮反運動的歷史考察〉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史研究》，第1
冊，頁218－259 南昌市：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 第1版

———，〈建國初期中共幹部任用政策之考察〉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史研
究》，第1冊， 南昌市：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 第1版

熊月之、周武、爾冬強，《上海 一座現代化都市的編年史》 上海：上海書店，
2009

羅崗、許紀霖，〈城市空間再生產與社會主義新傳統〉 《城市的記憶：上海文
化的多元歷史傳統》，頁230－281 上海市：上海書店出版社，2011 第1版

蘇渭昌、雷克嘯、章炳良，《中国教育制度通史》 李國鈞, 王炳照 濟南市：山
東教育出版社，2004 第8卷 第1版

史料文獻



丁偉，〈清華大學：只做股東，不當“父母”〉 《人民日報》 2003/10/22
<http://www.people.com.cn/GB/it/1065/2146358.html>

人民教育出版社，《初級中學課本 歷史第三冊》 濟南市：人民教育出版社，
1964 第 6 版

上海市中小學教材編寫組，《上海鄉土歷史》 上海市：上海教育出版社，1989
第 1 版

上海市光明中學初一語文備課小組，〈到外灘上課去〉 《上海教育》 第 20,21
期（1958），頁 8 - 9

上海市教育局，《中等學校適用 上海市鄉土地理教材》 《第一分冊》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1958

———，《中等學校適用 上海市鄉土地理教材》 《第二分冊》 上海：上海教
育出版社，1959

———，《中等學校適用 上海市鄉土地理教材》 《第二分冊》 上海：上海教
育出版社，1960

———，《中等學校適用 上海市鄉土地理教材》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61

———，《中等學校適用 上海市鄉土地理教材》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61

———，《初級中學中國歷史第三冊鄉土教材》 上海市：上海教育出版社，1958
第 1 版

———，《初級中學適用 上海市鄉土地理教材》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60

———，《高級小學適用 上海市鄉土地理教材》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58

———，《高級小學適用 上海市鄉土地理教材》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61

———，《高級小學適用 上海市鄉土地理教材》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62

———，《高級中學中國歷史第三冊鄉土教材》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58

———，《高級中學中國歷史第三冊鄉土教材》 上海市：上海教育出版社，1958
第1版

———，《高級中學適用 上海市鄉土地理教材》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59

上海市教育局教學研究室，〈高小歷史第三冊增編上海鄉土教材幾個問題的說明〉《上海教育》第13期（1958），頁19-23

———，《高級中學課本世界近代現代史下冊課堂教學參考書》 上海市：新知識出版社，1958 第1版

上海市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展覽會編，《大膽革新中學教學》 上海市：上海教育出版社，1958 第1版

———，〈小學農業常識教學經驗〉 上海市：上海教育出版社，1958 第1版

———，〈青年學生在勞動中躍進〉 上海市：上海教育出版社，1958 第1版

———，〈紅旗引導少年兒童前進〉 上海市：上海教育出版社，1958 第1版

———，〈紅領巾的社會活動〉 上海市：上海教育出版社，1958 第1版

———，〈勤工儉學在市東中學〉 上海市：上海教育出版社，1958 第1版

上海市統計局，《上海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歷史統計資料（1949-2000）》 上海市：中國統計出版社，2001 第1版

上海市檔案館，〈A23-1-326〉 上海市：上海市委教育衛生辦公室，1961

———，〈A23-1-326-1〉 上海市：上海市委衛生教育部，1961

———，〈A23-2-1536-18〉 上海市：嘉定縣教育局，1959

———，〈A23-2-1536-33〉 上海市：南匯縣委員會宣傳部，1959

———，〈A23-2-317-40〉 上海市：上海市高等教育局，1958

———，〈A23-2-317-7〉 上海市：上海市高等教育局，1958

———，〈A23-2-344-1〉 上海市：交通大學，1958



- ，〈A23-2-344-124〉 上海市：公私合營銅仁合金工廠，1958
- ，〈A23-2-344-126〉 上海市：公私合營上海電焊機廠，1958
- ，〈A23-2-344-165〉 上海市：上海水產學院，1958
- ，〈A23-2-344-20〉 上海市：交通大學，1958
- ，〈A23-2-370-11〉 上海市：上海市政府高等教育局，1958
- ，〈A23-2-370-21〉 上海市：上海市委教育衛生部，1958
- ，〈A23-2-370-22〉 上海市：上海市委教育衛生部，1958
- ，〈A23-2-370-30〉 上海市：中共上海市委教育衛生部，1958
- ，〈A23-2-489-1〉 上海市：上海市委教育衛生部，1959
- ，〈A23-2-489-177〉 上海市：上海市委教育衛生部，1959
- ，〈A23-2-489-182〉 上海市：上海市委教育衛生部，1959
- ，〈A23-2-492-93〉 上海市：上海市委教育衛生部，1960
- ，〈A23-2-51-60〉 上海市：上海市委教育衛生部，1958
- ，〈A23-2-549-1〉 上海市：上海市委教育衛生部，1960
- ，〈A23-2-549-57〉 上海市：上海市委教育衛生部，1960
- ，〈A23-2-633-1〉 上海市：上海市教育局黨組，1960
- ，〈A23-2-633-147〉 上海市：上海市委教育衛生部，1960
- ，〈A23-2-633-73〉 上海市：上海市委教育衛生部普教處，1960
- ，〈A23-2-809〉 上海市：上海市委衛生教育部，1961
- ，〈A29-2-51-1〉 上海市：中共上海市中等專業學校委員會，1958
- ，〈A29-2-51-132〉 上海市：上海機械製造學校，1958



- ，〈A29-2-51-152〉 上海市：上海建築工程學校，1958
- ，〈A29-2-51-167〉 上海市：上海船舶製造學校，1958
- ，〈A29-2-51-224〉 上海市：上海鐵道電信信號學校，1958
- ，〈A29-2-51-49〉 上海市：上海市人民委員會，1958
- ，〈A29-2-51-49〉 上海市：上海市人民委員會，1958
- ，〈A29-2-51-64〉 上海市：上海電機製造學校，1958
- ，〈A29-2-51-69〉 上海市：電機製造工業部上海電機製造學校，1958
- ，〈A29-2-53-164〉 上海市：上海建築材料工業學校，1958
- ，〈A29-2-69-211〉 上海市：共青團上海鐵路電信信號學校委員會，1958
- ，〈A54-2-1463〉 上海市：上海市基本建設委員會城建處，1961
- ，〈A54-2-175-12〉 上海市：上海市徐匯區人民委員會，1957
- ，〈A72-2-23-5〉 上海市：嘉定縣「三秋」義務勞動辦公室，1959
- ，〈A72-2-416-6〉 上海市：上海市委農村工作委員會，1960
- ，〈A72-2-863-7〉 上海市：共青團上海市委辦公室，1961
- ，〈B105-1-1745-4〉 上海市：國務院，1957
- ，〈B105-1-1745-8〉 上海市：上海市教育局，1957
- ，〈B105-2-177〉 上海市：上海市教育局教學研究室，1959
- ，〈B105-2-268-2〉 上海市：上海市教育局，1960
- ，〈B105-2-3-17〉 上海市：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1958
- ，〈B105-2-3-3〉 上海市：上海市教育局，1958
- ，〈B105-2-3-7〉 上海市：上海市教育局，1958





- ，〈B105-2-449〉 上海市：上海市教育局，1961
- ，〈B105-7-1092〉 上海市：國務院，1960
- ，〈B105-7-1145-11〉 上海市：上海市教育局接待辦公室，1961
- ，〈B105-7-328-13〉 上海市：上海市教育局，1958
- ，〈B105-7-328-13〉 上海市：上海市教育局，1958
- ，〈B105-7-328-30〉 上海市：上海市教育局，1958
- ，〈B105-7-328-50〉 上海市：上海市教育局，1958
- ，〈B105-7-328-68〉 上海市：共青團上海市委員會學校工作部，1958
- ，〈B105-7-351〉 上海市：上海市教育局，1958
- ，〈B105-7-363〉 上海市：上海市教育局教學研究室，1958
- ，〈B105-7-620〉 上海市：上海市教育局，1959
- ，〈B105-7-686〉 上海市：上海市教育局，1959
- ，〈B105-7-690〉 上海市：上海市教育局，1959
- ，〈B105-8-805-1〉 上海市：上海市教育局，1965
- ，〈B11-2-106-32〉 上海市：上海市城市建設局，1965
- ，〈B11-2-36-1〉 上海市：上海市閘北區人民委員會，1963
- ，〈B11-2-81-1〉 上海市：上海市城市建設局，1964
- ，〈B1-2-490-1〉 上海市檔案館：中國人民救濟總會上海市分會，1952
- ，〈B127-2-212〉 上海市：中共上海市勞動局黨組，1958
- ，〈B127-2-212-35〉 上海市：上海市高等教育局，1958
- ，〈B127-2-87-33〉 上海市：上海市勞動局，1960



- ，〈B163-2-651-13〉 上海市：上海市輕工業學校，1958
- ，〈B243-1-142-1〉 上海市：中共上海市委教育衛生工作部，1958
- ，〈B243-1-142-106〉 上海市：上海市高等教育管理局節約工作組，1958
- ，〈B243-2-124-57〉 上海市：上海市高等教育局，1958
- ，〈B243-2-136〉 上海市：上海市高等教育局，1958
- ，〈B243-2-136-1〉 上海市：上海市高等教育局，1958
- ，〈B243-2-136-126〉 上海市：上海市高等教育局，1958
- ，〈B243-2-136-126〉 1958：上海市高等教育管理局，1958
- ，〈B243-2-176〉 上海市：上海市高等教育局，1959
- ，〈C21-2-1036-171〉 上海市：共青團上海市委辦公室，1957
- ，〈C21-2-1036-221〉 上海市：共青團上海市委辦公室，1957
- ，〈C21-2-1036-62〉 上海市：上海市委，1957
- ，〈C43-1-451-10〉 上海市：上海市經濟學會，1961
- ，〈H1-11-6-42〉 1963
- ，〈H1-15-10-5〉 1959
- ，〈Q109-1-328〉 上海市：上海市參議會，1946
- ，〈Q248-1-344〉 上海市：私立上海法政學院，1945
- ，〈R48-1-79〉 上海市：上海特別市教育局，1942
- 上海民間故事編委會編，《上海民間故事選》 上海市：上海文藝出版社，1960
第1版
- 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城市經濟組，《上海棚戶區的變遷》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 第2版

上海城市規劃志編纂委員會編，《上海城市規劃志》 上海市：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9 第 1 版

上海教育學院，《上海市中等教育發展統計指標 1949-1985》 出版者不詳，1986 第 1 版

山東省教育廳編，《初級中學適用 山東鄉土歷史教材》 濟南市：山東人民出版社，1959 第 1 版

———，《初級中學適用 山東鄉土歷史教材》 濟南市：山東人民出版社，1959 第 1 版

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論新中國經濟建設》 北京市：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 第 1 版

中央訓練團義務勞動高級人員訓練班編，《蔣主席義務勞動言論集》 出版地不詳：中央訓練團義務勞動高級人員訓練班，1946 第 1 版

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大事記 1949-1982》 北京市：教育科學出版社，1983 第 1 版

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上海民歌選》 上海市：上海文藝出版社，1959 第 1 版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中共中央轉發中央教育部黨組《關於解決高小和初中畢業生學習與從事生產勞動問題的請示報告》的批語〉《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 北京市：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 第 5 冊

———，〈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1，頁 598 - 523 北京市：中國文獻出版社，1995 第 1 版

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列寧主義教研室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論教育與生產相結合》 北京市：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58 第 1 版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編，《中國教育年鑒：1949-1981》 北京市：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4


內蒙古自治區教育廳教研室編，《內蒙古自治區中學歷史鄉土教材 代用課本》 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60 第 1 版

文匯報，〈上海中小學生暑假生活豐富多彩〉《文匯報》 1958/7/27





- ，〈上海中等學校師生三萬人 寒假期間下鄉義務勞動〉 《文匯報》
1958/01/25
- ，〈上海建築學會連續召開座談會：討論有關建築風格苦幹問題〉 《文
匯報》 1961/07/22
- ，〈上海郊區大辦農業學校〉 《文匯報》 1958/08/18
- ，〈上海郊區辦起 420 所中學〉 《文匯報》 1958/04/04
- ，〈上海群眾文藝躍進再躍進〉 《文匯報》 1958/09/26
- ，〈不毛之地變成了文化樂園〉 《文匯報》 1958/09/28
- ，〈以階級教育與革命傳統教育為紅線，組織少年兒童訪問調查工廠、里
弄〉 《文匯報》 1963/11/28
- ，〈用勤工儉學的辦法 上海三師創建附中〉 《文匯報》 1958/03/12
- ，〈向明中學全面安排三秋勞動和生活〉 《文匯報》 1960/10/12
- ，〈兩個星期內成為「四無村」〉 《文匯報》 1958/01/07
- ，〈將青春獻給壯麗的農村教育事業〉 《文匯報》 1960/11/14
- ，〈普通中學改成農業中學〉 《文匯報》 1958/03/28
- ，〈勤工儉學有什麼好處〉 《文匯報》 1958/02/16
- ，〈勤工儉學的又一重要形式〉 《文匯報》 1958/08/14
- 毛仲磐，〈勤工儉學的小故事〉 《文匯報》 1958/07/17
- 毛澤東，〈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 《毛澤東選集》，頁 621 - 656 北京市：人
民出版社，1939 第 2 版
- ，〈必須維持上海，統籌全局〉 《毛澤東文集》，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編，第 5 冊，頁 335 - 336 北京市：人民出版社，1949
- ，〈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 《毛澤
東選集》，第 4 冊，頁 1424 - 1439 北京市：人民出版社，1949

- 
- ，〈在普通教育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 《毛澤東文集》，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第7冊，頁245-249 北京市：人民出版社，1957 第1版
- ，〈抗戰勝利後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 《毛澤東選集》，頁1123-1136 北京市：人民出版社，1945 第2版
- ，〈愚公移山〉 《毛澤東選集》，頁1101-1104 北京市：人民出版社，1945 第2版
- ，〈整頓黨的作風〉 《毛澤東選集》，第3冊，頁811-829 北京市：人民出版社，1942 第1版
- ，〈關於工業戰線上的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運動開展情況的報告〉 《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第13冊，頁109-124 北京市：中國文獻出版社，1996 第1版
- 王治範、黃質夫，《中等學校勞動生產訓練》 上海市：正中書局，1946 第1版
- 王智慧，〈以真人真事編繪廠史工人家史，為階級教育活動增添形象教材〉 《文匯報》 1963/12/03
- 史曉明，〈“二十世紀中期”兩種教育制度，兩種勞動制度”探析〉 河南師範大學，2011
- 甘肅省教育廳編，《甘肅省初級中學鄉土教材 中國歷史》 蘭州市：甘肅人民出版社，1959 第1版
- 白砥民，《歷史課中鄉土教材的教學》 上海市：上海教育出版社，1958 第1版
- 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 北京市：人民出版社，2001 第3版
- 吉林省教育廳編，《中學鄉土歷史試用教材》 長春市：吉林人民出版社，1959 第1版
- 安徽省教育廳編，《高級小學試用課本 史地鄉土教材》 合肥市：安徽人民出版社，1958 第1版
- 江西省教育廳教學研究室編，《中學鄉土教材 可愛的江西（第三輯）》 南昌市：江西人民出版社，1957 第1版

李大釗，〈青年與農村〉 《李大釗文集》，第2冊，頁287-291 北京市：人民出版社，1999 第1版

李國才、繆詠禾，〈小學高年級作文教學經驗〉 上海市：上海教育出版社，1960 第1版

辛安亭，〈回顧在延安十一年的教材編寫與生活〉 《中國教育大系》，顧明遠編 武漢市：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第3冊 第1版

国家城市建设总局城市规划局城市规划手冊编写組，〈城市规划資料集〉 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1982

尚凡，〈下放幹部，農業中學的骨幹〉 《文匯報》 1958/06/22

林逸，〈歷史教學中鄉土教材的應用〉 《歷史教學問題》（1958），頁40-43

河南省教育廳編，〈河南省歷史鄉土教材〉 鄭州市：河南人民出版社，1959 第1版

姚士良，〈蘇聯同行來信祝賀〉 《文匯報》 1958/11/10

施振洪，〈我在勞動，我在鍛鍊〉 《上海市初中生作文選》，上海市中小學生作文評選選委會編，頁41-43 上海市：上海教育出版社，1964 第1版

孫璐如，〈我最喜愛的「六一」節〉 《上海市初中學生作文選》，上海市中小學作文評選選委會編，頁61-65 上海市：上海教育出版社，1963 第1版

庫恩，〈共產國際文件匯編〉 北京市：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65

徐峰，〈第九女中三秋勞動善始善終〉 《文匯報》 1960/11/08

徐特立，〈對牛頓應有的認識〉 《徐特立教育文集》，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編 北京市：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 第1版

———，〈對於邊區兒童的我見〉 《徐特立教育文集》，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編 北京市：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 第1版

———，〈關於教育與生產結合的幾個問題〉 《中國教育大系》，顧明遠編 武漢市：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第2冊 第1版



課程教材研究所編，《20 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自然 社会
常识 卫生卷》北京市：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第 1 版

陝西省教育廳, 西安師範學院編，《陝西省中學鄉土教材 初中歷史》 西安市：
陝西人民出版社，1958 第 1 版

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
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 北京市：人民出版社，1975 第 3 冊 第 1 版

———，〈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共中央馬克思
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 北京市：人民出版社，1961 第 8 冊 第 1 版

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共中央馬克思恩
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 北京市：人民出版社，1958 第 4 冊 第 1 版

張回、包村，《上海近百年革命史話》 上海市：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 第 1 版

張家駿、陳家熾，〈群策群力〉 《文匯報》 1959/08/25

梁思成、林徽因，〈平郊建築雜錄〉 《梁思成 林徽因講建築》，頁 97 - 110 長
沙：湖南大學出版社，2009

許滌新編，《政治經濟學辭典（上）》 北京市：人民出版社，1984 第 1 版

———，《政治經濟學辭典（中）》 許滌新 北京市：人民出版社，1984 第 1 版

陳光，〈農業中學的新階段和新任務〉 《人民教育》 第 2 期（1960），頁
10 - 14

陳根寶，〈上海市農業中學一年級學生在上海農業試驗站辣椒田裡參觀，了解新
品種的生長情況〉 《文匯報》 1958/08/15

陳煒、蔣子誠，〈如何在校外活動中向少年兒童進行階級教育〉 《文匯報》 出
1963/08/17

陳毅，〈入城紀律是給新區城市人民的見面禮〉 《陳毅軍事論文選》，頁 345 -
501 北京市：解放軍出版社，1996 第 1 版

陸定一，〈農業中學創辦二周年〉 《人民教育》 第 2 期（1960），頁 1 - 3





- 喬永潔，〈運用鄉土教材教育學生〉 《文匯報》 1957/12/06
- 湖南省教育廳編，《湖南近代現代革命史簡編》 長沙市：湖南人民出版社，1958
第1版
- 程今吾，《延安一學校》 上海市：新華書店華東總分店，1950 第2版
- ，《新教育體系》 上海市：上海書店，1948 第1版
- 程永寧、許學習、周自進，〈大學生到農村義務勞動〉 《文匯報》 1957/08/05
- 黃茂林，〈一所機耕化的農業中學〉 《人民教育》 第2期（1960）
- 楊支柱，〈取消實習，放棄計畫經濟就業觀〉 《南方周末》 2003/03/28
<http://www.people.com.cn/GB/kejiao/41/20030328/956470.html>
- 楊修，〈“滾地龍”〉 《文匯報》 1962/11/13
- 葉颯，〈高考命題改革者〉 《南方周末》 2013/06/06
<http://www.infzm.com/content/91228>
- 解放日報，〈根據地普通教育的改革問題〉 《中國教育大系》，顧明遠編 武漢
市：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第3冊 第1版
- 鄒瘦懿，〈上海桃源新村〉 《建築學報》 第1期（1964），頁27 - 33
- 劉秀峰，〈創造中國的社會主義的建築新風格〉 《建築學報》 第9 - 10期
（1959），頁3 - 12
- 劉振，〈省教育廳要求城市學生要參加農業生產勞動〉 《西安日報》 2013/04/01
http://news.xiancn.com/content/2013-04/01/content_2735544.htm
- 歐陽惠林，〈江蘇省農業中學的第二年〉 《人民教育》 第2期（1960）
- 鄧述平、李錚生、司馬銓，〈居民小區規劃用地的經濟性與合理性〉 《建築學
報》 第7期（1964），頁21 - 24
- 鄭祖安，《上海地名小志》 上海市：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8 第1版
- 蕭東，《作文講話》 上海市：上海教育出版社，1959 第1版

戴月琳，〈上海禮讚〉 《上海市初中學生作文選》，上海市中小學生作文評選選委會編，頁 53 - 55 上海市：上海教育出版社，1963 第 1 版

戴輝，〈金色的童年，幸福的十歲〉 《上海教育》 第 12 期（1959）

繆振鵬，〈一堂課內外活動相結合的歷史課〉 《歷史教學問題》 第 3 期（1959），頁 41 - 42

龐瑞鋒，〈高校企業：光環下的意外〉 《南方周末》 2003/09/11
<http://www.southcn.com/weekend/economic/200309110027.htm>

蘇壽桐編，《初級中學課本 中國歷史第三冊》 北京市：人民教育出版社，1958 第 3 版

顧明遠編，《中國教育大系(修訂版)》 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作者不詳，〈以更大的成就來歡慶偉大的建國十周年〉 《建築學報》 第 9 - 10 期（1959），頁 1 - 2

作者不詳，〈教育部關於編寫中小學、師範學校鄉土教材的通知〉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報》，1958

作者不詳，〈農業中學大抓鞏固提高,為 1960 年繼續大發展準備條件〉 《人民教育》 第 1 期（1960），頁 54 - 55

作者不詳，《嘉定地理鄉土教材參考材料》 出版者不詳，1958

